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2026/05

第42卷 第5期（总第240期）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梅景辉

副 主 任　王　曦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坚勤　冯保善　孙爱军

李洪天　张　莉　张　勤

姚苏平　黄光耀　蒋　波

路　明　潘　文

主　　编　梅景辉

副 主 编　王　曦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

…… 齐明明　戚如强(1)

中华民族精神上独立自主的三重意蕴

…… 梁汉昭(10)

数字消费主义的理性审视:历史出场、风险表征及其治理路径

…… 韩　敏(18)

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对策制定

…… 许　斌(27)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价值、内涵及路径

…… 孙建华　何硕涵(35)

元宇宙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的基本特征及实践路径

…… 林　峰(42)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的三重维度

…… 王　萌(49)

红色工业文化涵育大学生家国情怀:逻辑、困境与进路

…… 冯灵芝　谢宗旺(57)

期刊基本参数:CN32-1860/G4 * 1985 * b * A4 * 124 * zh * P * ¥12 * 1000 * 15 * 2026-5

双月刊

第 42 卷（总第 240 期）
2026 年 第 5 期 目 录

【教育家精神研究】 栏目主持人/刘黎明

霍懋征教育家精神:源起、构成及启示
…… 魏宏聚(66)

论陈鹤琴教育家精神及对涵养幼教大先生的启示
…… 田景正(73)

教育家精神的生成机理与实践传播
——基于“教育家精神万里行”语料的扎根理论研究
…… 高晓文(80)

【课程与教学研究】

哲学教育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的价值、困境与对策
…… 李 骏 郑晓瑞(92)

儒家君子人格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学段目标体系的转化逻辑与实践路径
…… 王萍萍 马平平(100)

【编辑出版与传播】

泛终端时代学术期刊品牌传播力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
…… 杨雅婕(108)

学术期刊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 徐楷森(116)

封面设计 路 明 执行编辑 刘敏慧 英文翻译 刘 娟

JOURNAL OF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Vol.42 No.5(Serial No.240) Oct.2026

Main Contents

Generation Logic, Value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ollowing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 QI Mingming QI Ruqiang(1)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SpiritualIndepen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 LIANG Hanzhao(10)

A RationalReflection on Digital Consumerism: Historical Generation, Risk Manifestations and Governance Pathways ····· HAN Min(18)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 for Constructing Network Discourse Power at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he All-media Era ····· XU Bin(27)

Building 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that Consolidates the Foundation and Forges the Soul: Value, Connotation, and Pathways ····· SUN Jianhua HE Shuohan(35)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the Metaverse-Driven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 LIN Feng(42)

Three Dimensions of Enhancingthe Teaching Quality of AI-enabl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t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 WANG Meng(49)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Patriotism via Red Industrial Culture: Logic, Challenges and Approaches ····· FENG Lingzhi XIE Zongwang(57)

Huo Maozheng's Educator Spirit: Origins, Constitution and Implications ····· WEI Hongju(66)

Chen Heqin's Educator Spiri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ultivating Great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 TIAN Jingzheng(73)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Dissemination of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A Grounded Theory Study Based on the Corpus of "Educator Spirit Nationwide Tour" Campaign ····· GAO Xiaowen(80)

Value, Dilemmas and Countermeasuresfor Philosophy Education in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t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Levels ····· LI Jun ZHENG Xiaorui(92)

Transformation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s of Integrating Noble Character of Confucianism into the Integrated Curriculu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t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Levels ····· WANG Pingping MA Pingping(100)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andImprovement Pathways of Academic Journal Brand Communication Power in the Pan-Terminal Era ····· YANG Yajie(108)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l Logic and Optimization Paths for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Academic Journals ····· XU Kaisen(116)

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

齐明明　戚如强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　要]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智慧源泉，以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和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追梦道路为实践基础，以当今世界各国探索现代化过程中的兴衰成败为历史镜鉴。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得民心的道路，能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争取有利的条件，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一条展形象的道路，有利于打破“中国威胁论”，展现新时代大国担当，并为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范式。为此，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提升维护和平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统筹解决国内主要矛盾和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使和平发展道路获得更持久的保障。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和平发展道路；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5-0001-09

近代以来，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双重盘剥下，中国被迫卷入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体系，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以后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不断探索，从“实业救国”到“建国方略”，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具备了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条件。此后几十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逐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23 经历过被殖民掠夺深重苦难的中国没有走西方国家充满血腥暴力和殖民掠夺的现代化的老路，而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这让不少人感到困惑，甚至怀疑。事实上，中国通过和平发展道路走向现代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经过慎重思量和实践论证的结果。因此，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有助于系统阐释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层动机，有效回应并消解学界及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困惑与现实疑虑，对更坚定地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国际传播广度与理论建构深度具有重大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特质，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主动抉择，是一种历史必然。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靠发展，没有发展就不会有现代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标识性概念视域下思政引领力的逻辑结构与系统集成研究”（项目编号：25YJA710037）。

[收稿日期]　2025-12-17

[作者简介]　齐明明，男，河南项城人，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戚如强，男，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化,这一点已不容置疑。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说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说要不要和平地发展、怎样和平地发展的问题,主要是和平的问题。也就是说,发展的方式多种多样,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意在强调中国发展的方式将是和平的方式,而不是其他什么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2]265。因此,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蕴含深刻理论基础与文化基因,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史的经验总结,也是对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不懈追梦道路的理性升华,更是对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路径的系统性批判与创造性发展。

(一)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论证看,和平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必然结果

人类历史伴随着血腥和战争,对于战争的本质、起源,很多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写道:"战法必本于政胜。"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更明确地说:"战争不仅是一种政策行为,还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依靠另一种手段进行。"[3]119但因为时代的制约和阶级的局限,他们无法也不可能正确解释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了人类社会的战争形态,揭示人类社会的战争是自然界中生物斗争的延续,但又表现为更为高级的特征和复杂的情形。自然界中的斗争无外乎是争夺资源,人类在原始社会也是如此,但是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人们发现掠夺"比劳动获得更容易甚至更光荣""以前打仗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当"[4]181。在这一阶段,人类社会的战争可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具有进步意义、体现革命精神、旨在抵抗侵略和解放民众的防御性质的战争;另一类则是反动的、带有掠夺目的、旨在侵略别国和剥削他人的进攻性质的战争。很明显,前一类战争不可能独立出现,它是由后一类战争而引发的。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战争是私有制的直接、必然产物,"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5]196。也就是说,战争本身就是解决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近现代社会的战争都无法摆脱其阶级性。特别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剥削本国无产阶级,通过暴力方式镇压工人运动;资产阶级想要控制全球,寻求对外扩张,发动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侵略战争。这些战争都是因资产阶级的剥削和掠夺而产生的。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一步科学论证了现代战争的起源,他指出:"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因此,"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在上述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6]577-578。

和平就是反对战争,实现和平就是要消除战争的根源,这个根源在经济上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政治上就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因此,一旦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彻底铲除、剥削阶级被完全消灭,战争便丧失了其赖以存在的根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5]419。当前,中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强调人人平等、消灭剥削、反对阶级压迫。虽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的形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计,在中国国内已经消灭了挑起战争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追求和平也就顺理成章。

(二)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看,和平是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基因

"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周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7]6中华民族的"和"文化总体上是由其

所处的地理环境和采用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从地理环境看，作为古代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生活范围相对比较封闭，东边是大海，北边是极寒之地和戈壁荒漠，西边是荒漠和足以阻碍当时的人们通行的高山，南边是大海和中原人避之不及的热带地区。从生产方式看，传统的中华文明主要是农耕文明，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发展农业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多，需要肥沃的土壤、适宜的温度、充沛的降水。在中华民族能够活动的范围内，只有中原及周边地区才适合耕种。因此，中华民族从来都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没有对外扩张的原始欲望，即便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也是如此。另外，农作物生长周期较长，需要不违农时才能保证农作物的生产和收获，这就需要和平稳定的生产环境；农作物生长过程中的不可移动性也造就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民族品格，中华民族不喜欢“颠沛流离”，这就更强化了对和平的追求。中华民族向来深谙“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哲理，也透彻领悟“兵者，不祥之器”的内涵，将“化干戈为玉帛”和“不战而屈人之兵”奉为战争的至高追求。即便处于汉唐这般鼎盛的时代，中华民族也未曾踏上侵略他国和殖民扩张的歧途。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在远航途中从未凭借武力强行输出自身的文化与价值观念，更未使用暴力去开拓殖民地。在对外交流交往的漫长历程中，中华民族始终坚守“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处世理念，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8]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崇尚和谐的中华文化决定着中华民族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坚持维系人际关系的和睦有序，在处理国家与民族之间的问题上倡导和平共处的交往准则。这种崇尚和平、和谐、和睦的基因深深刻在中华民族的骨子里，已经成为现在全体中华儿女的集体无意识和日用而不觉的行事风格。

（三）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看，和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让中国取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让中国人民摆脱被压迫、被剥削、被征服的命运，免受刀兵之灾。中国共产党虽然通过战争的方式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打败了国内的剥削阶级和国外的侵略势力，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好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起便谋求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打击当时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抗战力量。抗战胜利后，为争取国内民主统一、和平发展，中国共产党派毛泽东等同志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秉持以退让求和平、以斗争促团结方针，推动签订“双十协定”。解放战争时，中国共产党秉持“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促成新疆、湖南、北平、西藏等多地和平解放，减少战争破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率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此来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营造和平环境。1950 年，面对外部威胁，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保家卫国出兵朝鲜，在作战中贯彻边打边谈、以打促和方针，维护了地区和平与国家安全。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我们不愿打仗”[9]365，“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10]229。因此，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进行了朝鲜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但是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过战争。甚至在拥有核武器之后，中国还第一时间向世界宣布对任何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准确判断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1]127，及时改变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传统观点，并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及“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为中国和国际社会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论。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与前瞻视野，在构建和谐世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和平发展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高度。

（四）从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复兴之路看，和平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和平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尤其是近代以来饱受一百多年战火蹂躏之苦的中国，更懂得和平的珍贵，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的国内外环境。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在持续不断的炮火中不但没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没能使人民过上好日子，甚至连人民的安全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都得不到保障。直到新中国成立，具备了维护国内和平的根本条件，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建立完整的工业基础，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四十多年的长期和平与稳定，中国才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短短的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过战火摧残的痛苦和倒退，也感受过和平稳定带来的发展与繁荣，更是深深懂得战争的残酷、和平的宝贵。现在，中国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但仍然需要至少几十年的和平环境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中国不仅会与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梦想失之交臂，甚至会使之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毁于一旦。因此，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与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五）从发达国家走上现代化的兴衰成败看，和平是国富民强的最优选择

战争不仅对贫穷落后的国家有着极大的危害，而且对发达国家也百害而无一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德国想要通过武力的方式争夺霸权而引发的帝国主义战争。战争历时4年3个多月，导致直接死于战争的军人高达900万人，另有2 000多万人受伤，350万人成为终身残疾。因战争的爆发间接导致疫情和饥荒的蔓延，使1 000多万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战争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1 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约1 516亿美元，整个欧洲的工业发展倒退了8年[12]345。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法国、德国经过两次工业革命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战争给这三国带来了几乎毁灭性的影响。曾经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在战争中被严重削弱，英联邦分崩离析，海上霸权一去不复返；德国不但没能实现霸权的梦想，而且需要支付沉重的战争赔款，国家险些被瓜分；在法国，人们对曾经引以为傲的西方民主、自由等制度产生怀疑，现代主义颓废思潮、精神危机由此兴起。列宁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物质财富遭到巨大破坏，使生产力消耗殆尽，使军事工业蓬勃发展，以致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无法进行。因此，这次战争使人类陷入了绝境，使人类濒于毁灭”[13]441。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也妄图通过战争征服亚太，建立霸权，经过十几年的战争，日本给周边国家，特别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中国军民伤亡3 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 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 000亿美元[14]。日本自己也没有因此实现强国梦，反而使明治维新之后积累的成果毁于一旦。据统计，日本在二战中死伤人数超过500万[15]322，经济损失不计其数，成年人日均粮食配给量降至330克[16]90，国民经济体系全面瓦解，多个城市被夷为平地，本土也被美军占领。二战后，德国和日本被迫不再军事扩张，转向专注经济发展、融入国际秩序，最终实现国家重建与国际地位的提升。现在，德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第三和第四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因此，从发达国家走上现代化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来看，走和平发展道路才是实现国

富民强的最优选择。

二、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价值意蕴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在把握本国国情和顺应世界大势的基础上做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伟大决策必将有利于统筹好“两个大局”,对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国内而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能为中国的发展赢得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使中国能够聚精会神搞经济建设,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放眼世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能够打破别国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质疑,展示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也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从而壮大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增强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主动。

(一)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中国实现现代化赢得有利条件

不管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都会造成人员伤亡,使经济发展陷入停滞。战争本身“不仅会完全破坏现代文明和文化的成就,而且也必然会摧毁人类社会存在的条件”[17]369。人类历史与其说是一部战争史,不如说是一部逐步减少和消除战争的历史。没有和平就没有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不会有现代化,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条铁律。对于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一种于己于人都大有裨益的事情。一方面,中国维护好国内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将更多精力和资源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也有利于为国内外投资提供良好的环境。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倡导国际和平有利于更好地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多地与他国开展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更有效地破解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这也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秘诀。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不断探索成功路径并积极付诸实践,众多国家日益认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观念。在此影响下,和平合作的基石愈发稳固,不断夯实壮大,这为全球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筑牢了安全屏障,营造出稳定有序的环境。而各国文明在交流互鉴过程中,能够有效破除“文明冲突”的对抗思维定式,增进彼此的理解与包容,催生积极的价值认同,构建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文明生态,有力推动全球走向和平发展。同时,全球的和平发展态势也会为中国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个和平发展的良性互动循环。

(二)走和平发展道路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18]65马克思主义讲究抓主要矛盾,当前中国所有的工作重点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让人民群众切切实实从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得到实惠。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19]61,一个基础性的现实条件在于,唯有借助和平稳定的环境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可持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首先,和平环境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中国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才能摆脱战争的干扰,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实力的快速增强,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财富,使人民有稳定收入的来源,得以改善物质生活。其次,和平有助于提升民生保障水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把足够多的资源和财富用到发展教育、医疗、文化等事业上,让人民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完善的医疗服务,减少生活后顾之忧。最后,和平带来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在和平发展的氛围中,

人民无需担忧战乱威胁，能够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追求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但能增强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而且能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多智力支持。

（三）走和平发展道路打破了西方某些政客污蔑中国的图谋

在西方世界有混淆视听的两种论调：一种是“文明冲突”理论。这种论调基于前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虽然后来亨廷顿一定程度上修正过自己的观点，但是这种民族对立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认识在西方有广泛的基础。他们认为，中华文明是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形式，中国强大了不但不会遵守现有的国际秩序，还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另一种值得警惕的论调是“修昔底德陷阱”。从西方国家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法英之间的战争、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还是美苏之间漫长的争霸历程，都似乎在印证“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难以打破的“铁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大做文章。他们打着“维护正义”“捍卫和平”的幌子，实则秉持着霸权逻辑和冷战思维来对中国进行恶意解读和揣测。他们大肆宣扬中国强大后也会像美国和苏联一样搞霸权主义，甚至会通过武力或者意识形态输出去侵略别国，威胁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这些“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等不实言论，将中国恶意描绘成威胁世界和平、破坏自由与平等的“墨菲斯托”，试图通过这种危言耸听的方式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两种论调事实上都是一种西方中心论，他们只是站在西方的视角以西方的局部思维来看待中国，他们对中华文化和历史一无所知，对中国的发展抱有一种主观的偏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让所有别有用心污蔑中国的言论都不攻自破。正如 2015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所说：“中国繁荣昌盛是趋势所在，但国强必霸不是历史定律。”[20]320

（四）走和平发展道路展现了新时代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因为文化和理念的不同，西方有些学者对中国强大后能否承担起大国责任表示怀疑，他们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该理论认为，由于中国的崛起导致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领导能力的减弱，但中国崛起后可能会颠覆现行的国际秩序，重新制定国际规则，并且不愿承担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21]。这样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首先，随着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中国并没有像某些西方大国一样，在崛起的过程中给别国带来战争和灾难，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塑造全球和平稳定大环境，实现自身与世界发展的良性互动，为人类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其次，中国提出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不是另起炉灶和完全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本着公平和正义的原则革新和完善国际秩序和国际准则，更加坚定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再次，中国在和平合作的基础上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在推进经济全球化、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维和等领域表现出大国应有的担当。最后，中国积极为世界各国提供公共产品供给，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使世界各国普遍受益，已经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五）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提供新范式

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已成功走上现代化，他们的道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他们通过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和殖民掠夺最先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并且通过殖民掠夺和

商品倾销把现代化理念带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度，垄断了现代化的话语权，以至于长期以来，现代化似乎就是西方化的代名词，想要走上现代化道路就要进行西方化，从政治体制、发展道路到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西化得越彻底，越能摆脱落后的面貌，越容易实现现代化。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出现了第二种现代化的道路，就是除欧美外其他一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主要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国，这些国家通过让渡自身的部分主权和资源，以此获得西方大国在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的庇护，妄图通过寄生在西方大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上，实现自身所谓的“发展”。一些拉美、东南亚、南亚等国也曾经或者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现代化，但这种道路存在一定风险。比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就倒在了成为发达国家的门槛上，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即便是成功的国家，他们允许西方大国或军事联盟在其本国境内驻扎军队，这一行为给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安全格局增添了不稳定变量。事实上，这两种道路的实质都是“西方中心”道路。

与上述两种道路不同，中国秉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不仅使本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实力大幅提高，而且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促进了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了一种包容性与互鉴性的发展思维。可见，“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22]367。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殖民老路”与“依附歪路”，“打破了‘现代化 = 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23]。

三、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践进路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局势瞬息万变，国内分裂势力、国际上的霸权主义和敌对势力等威胁和平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时刻存在，虽然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但是地区和民族间的局部武装冲突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中国能不能在复杂而且不确定的环境中保持和平发展的定力，怎样才能将和平发展道路走得更远；怎样才能创造条件壮大世界和平发展的力量，让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更有保障，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大课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根本保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走向、发展前景以及最终结局。历史实践充分表明，中国现在的发展成果，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漫长岁月中历经重重艰难险阻、付出巨大牺牲后才取得的。未来，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顺利进行。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信仰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制度保证和精神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其次，中国共产党以其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能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汇集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力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最后，中国共产党以其无比坚强的领导力，能够在动荡变革和风云变幻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从而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应对重大挑战，使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二）必备力量：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防战斗力

和平与战争是一对矛盾，两者存在辩证统

一的关系。争取和平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战争的准备,不意味着毫无底线地妥协。争取和平必须要具备争取胜利、维护和平的能力。中国不去侵略别国,但如果别国想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中国需要有足够的力量去打败他们。毛泽东在纪念朝鲜战争胜利时指出:“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24]356邓小平也说,争取和平应该两条腿走路,既要准备斗争,又要准备谈判[25]4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进行的自卫反击战都是以斗争求和平的表现。为了维护持久的和平,保障和平发展的顺利进行,中国一刻都不能放松警惕。中国要致力于发展经济和科技,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具备能打硬仗和持久战争的底气和实力;在此基础上要保障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全面加强练军备战,用核心科技武装军队,用创新战略指导军队,并保持一定的核威慑力,具备遏制战争的军事能力;此外,还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让人民群众对战争与和平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要时刻准备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具备打赢战争的群众基础。当然,中国的国防建设绝不是为了威胁他国,中国永远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三)内部条件:着力解决当前国内主要问题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26]302。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办好自己的事情才会使和平发展具有坚实的根基和基本的保障。办好自己的事情最紧迫的是需要解决好民生问题,“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8]63。人心向背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因此必须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人民收入水平;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兜牢民生底线;通过推进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国内分裂势力和犯罪活动是威胁和平发展与公共安全的重要因素,办好自己的事情需要贯彻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帮扶民族地区发展,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严厉打击民族分裂活动;需要在“一国两制”下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创造条件发展与台湾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与台湾人民一道共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但对分裂国家的行径绝不姑息;还需要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上严厉打击危害人民生命安全和公共安全的犯罪活动,提高全社会的守法意识和安全意识,消除和平发展的潜在威胁。

(四)外部条件:深入参与积极引领全球治理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2]331世界的和平发展不能只靠某一个国家来维护,只有和平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每个国家的和平发展才能得以实现。中国要在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基础上主动承担大国责任,深入参与和积极引领全球治理,坚定弘扬全人类共同的价值,为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一是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带动全球经济发展,与他国分享发展机遇。二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要坚决维护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开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发挥好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三是要坚持多边主义立场,反对霸权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致力于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一个基于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原则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扩大“朋友圈”,壮大维护和平的国际力量。四是要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事

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当好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的表率，在创新全球治理和处理国际事务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要继续深化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智慧，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解决全球面临的共性问题，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推进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基于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客观审视而做出的科学论断，是思想层面高度自信与实践层面高度自觉的有机融合，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顺应时代潮流。实践证明，走和平发展道路使中国克服内忧外困，从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综合实力位居世界前列的大国，使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使中国人民从吃不饱穿不暖到过上了小康的生活。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普世模式”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它的国际贡献与世界意义也正不断彰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正逐渐认同通过和平发展方式走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在新时代馈赠给世界的又一份珍贵的礼物。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3]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册[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11.

[8]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16(2).

[9]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周明博.全球通史[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

[13]列宁.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4]朱成山.真实的历史具有时光穿透力[N].人民日报，2025-08-06(3).

[15]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2.

[16]王捷，杨玉文，杨玉生，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Z].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17]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0]习近平.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21]约瑟夫·奈.警惕中美关系中的两大陷阱[J].中国经济报告，2017(3)：109.

[22]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3]习近平.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2-08(1).

[24]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5]邓小平.邓小平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光　翟）

中华民族精神上独立自主的三重意蕴*

梁 汉 昭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　要］　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彰显精神优势、强化精神主动和增强精神力量的先决条件。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过程中，在不断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是能够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重要基点，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自立自强的坚实脊梁，更是实现文化强国的精神基础。从去伪存真、固本培元、塑形铸魂三个角度科学理解这个重要命题，对于我们对内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对外加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华民族；　精神上独立自主；　文明交流互鉴；　“两个结合”；　文化形态

［中图分类号］　C9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5-0010-08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1]1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起学界对“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概念的高度关注。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源远流长的历史实践积淀和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民族精神的独特性、自主性，源于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独特的价值观念、历史传承与文化底蕴以及坚定文化自信等，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独立自主的丰富内涵。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需要我们在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中、在“两个结合”中、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始终坚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提振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

一、去伪存真：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保持清醒

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形成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道德价值的现实呼唤，是辩证对待西方道德价值观念的精神指引。深刻理解把握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就能够在纷然杂陈的各种思潮中去伪存真，破除对西方国家的话语依赖和崇拜。因此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仅是国家主权地位的一种特殊象征和衡量标尺，也是实现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独立性的重要手段，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一）西方中心论的虚伪性与欺骗性

自工业革命以来，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内核的西方文明浪潮在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先进的科技水平的加持下，伴随着资本主义在全

*［基金项目］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技术观下算法推荐与主流价值传播的冲突与调适研究”（项目编号：ZDXM2026019）。

［收稿日期］2025-10-10

［作者简介］梁汉昭，男，吉林辽源人，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球的扩张,将全世界各个民族、国家裹挟其中,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着先发优势和话语主动权,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民族精神的独立性与文明创造的自主性,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造成严重的精神束缚和实践上的消极影响。虽然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中心论”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只是瓦解了“西方中心论”直接的外在形式——殖民统治,并未彻底否定其意识形态上的持续渗透。西方国家通过世界银行、布雷顿森林体系等更隐秘、更高级形式的精神武器,对落后的非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殖民从而实现对落后国家经济政治的“全盘操纵”,以企图实现对外殖民扩张的政治目的。这种更具遮蔽性的文明叙事,不仅延续了西方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结构性优势,也对非西方社会构成了深层的精神规训,进而影响其经济与政治发展的自主路径。西方文明中心论是西方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见证,它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更新、发展,促进了西方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引领了人类文明向前迈进。然而从根本上看,其本质仍然是一种植根于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的意识形态建构。它通过抽象化、普遍化的论述策略,在为西方现代化成就赋予光环的同时,遮蔽了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与局限,进而使其成为实现文化霸权和维护跨国资本利益的工具。

受制于避讳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现实需要,西方文明中心论往往有意无意地放大西方经验的正面效应,常常掩盖了西方社会的真实矛盾,夸大渲染西方社会的某些成就,构建了一个虚假繁荣的西方“海市蜃楼”,以欺骗人们对本国文明模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迫使其他非西方国家不得不走上“西化”的发展道路,最终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的真实目的。这种论调扭曲了历史真相,削弱了多元文明的交流与共生,更加深了文化上的失衡和世界发展的不平等。在中国等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一段时间内曾出现过度推崇西方理念、忽视本土文化传承的现象,反映在高等教育与公共舆论中,即为一种对西方制度与思维模式的盲目推崇,从而在精神层面弱化了文化主体性与价值认同。从苏联解体到一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西方中心论常与所谓“普世价值观”相结合,以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干预他国内政与发展路径,试图促成非西方国家的“西方化转型”,以实现符合西方战略需求的政治效果。因此,深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揭露其精神殖民与文化操纵的实质,推动民族精神的重建与文明自觉的复苏,已成为广大非西方社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精神独立自主的迫切课题。唯有打破对西方叙事的盲从与依附,才能在多元文明并存的时代中确立自身文化身份,实现真正可持续的自主发展。

(二)文明多样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228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繁荣发展,离不开各种文明的共存、共融、共进发展。西方文明中心主义一方面漠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诋毁、抹杀、摧毁一切与西方现代文明价值倡导相悖的文明,使得非西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民俗、文化、宗教等文明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和伤害。另一方面,它披上“民主化”和“数字化”的“隐形外衣”,试图将全球文明纳入统一叙事框架,使之沦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逻辑的附庸。在这一过程中,许多被迫接受“西化”路径的国家,不仅丧失了政治与经济的主导权,更在文化层面陷入失语状态,付出精神自主性衰退的沉重代价。当今世界局势瞬息万变,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具体表现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强势崛起,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然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活跃力量,在更多的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使得世界格局从“单一西方化”发展路径走向“真正的多元现代化”发展阶段。在过去的全球运转格局中,先发展起来的国家予取予求,而后发展起来的国家则要处处看人脸色,甚至连发展权都无法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随着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扩容,“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觉醒不仅仅是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独立自主,也体现出发展中国家精神上的独立自主。2023年11月,加纳首都阿克拉,来自非盟和加勒比共同体的代表一致同意,建立一个全球赔偿基金,以推动欧洲国家对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期间被奴役的非洲人正式道歉及赔偿。这一行动具有标志性意义,表明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文明主体正在重新争取历史解释权与道德话语权。丝路精神、金砖合作理念、乌班图精神等非西方价值范式也逐渐在国际共识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全球南方国家携手推进公平治理提供了精神纽带。

当前,非西方国家进入了自立反驳的新时期,曾经对西方文明盲从和畏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他们致力于弘扬自身文化价值观,坚决抵制西方价值观的强势压迫。然而,发展中国家整体性崛起必然冲击现有国际秩序,西方长期垄断的话语权与文明阐释权也随之面临松动。由于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各种社会思潮展示出多元性、多样性、多变性的特点,极易受到外部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干扰。面对西方文明中心论带来的时代难题,必须始终保持精神层面的高度警惕,树立清晰的文化主体意识,从理论上澄清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历史局限性与现实误导性,筑牢思想防线。尤其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性问题上,要坚定不移地立足本国实际,拒绝任何形式的文化依附与价值盲从,这样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中站稳立场,真正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三)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有效路径

“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1]20精神独立自主是一种精神自觉和内在能力,使我们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以辩证批判的角度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同时敏锐识别其话语体系背后潜藏的物欲导向、虚幻叙事与镜像建构。因此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新的逻辑起点。文化的现代化作为人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就蕴含新的文明形态的生成和创造,孕育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破茧而出。从中国历史的生发演进来看,自秦统一六国以来,历经十数个朝代的更迭,中华文明依托强大的国力,其影响力辐射至许多国家。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长盛不衰源自中华文明的稳定性、连续性、独立性。虽然鸦片战争后中华文明曾一度蒙尘,但是中华文明所蕴含的特质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创新性的运用中,在同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实践中,一次次地展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新的文化生命体更是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自觉能动性、民族主体性、时代创新性。从世界文明的生发演进历史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成功解构了工业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关于世界文明的话语范式,解构了与西方式现代化相配套的意识形态叙事。

作为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承载民族文化复兴的使命,更致力于探索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历时态”与“共时态”交织语境下实现文明互鉴、融合共生的普遍路径。它以其包容性与生成性,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成为一种超越地域与时空界限的文明成果。同时,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诞生代表着中华文明内在生命的强化更新和时代转型。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要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坚守自身的精神阵地,建立清晰的精神边界感,自主构筑精神高地,这也是新时代加强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明更好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

二、固本培元:以“两个结合”涵养文化生命体的根基

“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1]7“两个结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坚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立足中国国情、打破各种束缚,提振伟大创造精神,固本培元,在实现“两个结合”的道路上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一)筑牢新的文化生命体创新的魂脉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这个

魂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证明,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意味着作为历史的实践者,能够拥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具体而言就是能够立足中国本土实践、总结中国本土经验、创新创造中国理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实现“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只有本土化才能发挥其对特定国家的科学的指导作用。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3]477的历史困境,无论是清政府的割地赔款,还是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无论是旧式的农民战争,还是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都没有实现涅槃重生,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统治阶级通过政治压迫、宗教渗透、媒介传播、奴化教育、思想“洗脑”、价值输出等途径对中国人民进行沉重的精神奴役,企图窒息中国人民的精神自主性,使中华民族丢弃民族根基、丧失奋发图强的意志。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不仅扭转了中华民族遭受政治压迫的命运,还促使中国人民逐渐摆脱精神被动的局面,从根本上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政治制度、价值主张、发展道路方面的独立自主问题。走自己的路,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在摆脱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束缚、反思苏联模式等发展道路的优势与弊端的基础上,在不断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这个“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魂脉,这个“时”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不丢“老祖宗”,又要“讲新话”,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正是这种对魂脉的坚守与时代的呼应,催生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时代气息的文化新生命,也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上的独立自主[4]。

(二)夯实新的文化生命体生成的“根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5]16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远厚重且内涵历久弥新,在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引导与精神支撑作用。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意味着作为历史的实践者,能够将民族自身特有的文化资源转化为不断前行的动力,具体而言就是中国人民在坚守自身文化根脉的同时还能够充分、持续利用历史悠久的优势,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新的文化生命体以深厚底蕴。如梁漱溟所说,中国文化“个性殊强”“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且“自具特征,自成体系”[6]7。应该说,近代以前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创造和精神品格的铸就都是自主有为的结果。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数千年而不绝,正在于其始终守护着自身的精神根脉。历史和现实表明,只有立足本土本国本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焕发时代的光芒,马克思主义才能回答好中国之问、人民之问,才能在中国大地深深扎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不能“丢魂失根”: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理论容易迷失方向;脱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理论也将丧失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了当代中国思想建构的“根”与“魂”。

纵观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演进历程,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无数次历史考验中保持文明延续性,其深层根基在于始终秉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种精神自觉使中华民族在面临外来文化冲击和内部变革时,既避免了文化迷失的困境,又实现了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共产党作为这一文明传统的当代传承者,在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始终坚持文化主体意识,在多元文化对话中保持精神定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要素的辩证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具有显著的历史延续性和当代适应性。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我们既需要坚守文化根脉,维护文化安全,又需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上下功夫。这种“两创”过程不是简单的文化复制,而是通过注入新的

时代内涵、创新传播方式，使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具体而言，就是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创新表达形式，增强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渗透力、影响力和感召力，筑牢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和发展的“根脉”，赋予中华文明以新的力量、新的观念，从而推动中华文明实现真正的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

（三）焕发中华文明新的生机与活力

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融汇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在回答时代问题中焕发了中华文明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如何看待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如何理解古今中西之争，是贯穿中国近代到现代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要回答“世界怎么了，中国怎么办”的问题。同时，人类面临的很多重大挑战要求我们必须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寻求世界范围内的对话和合作。这就决定了中华文化不仅是扎根中国的，也是面向世界的。中华文化在确立自己文化主体性、做自己的同时，也要明确我们看待世界的态度，明确和世界在一起的基础。事实证明，只有“两个结合”才能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明底蕴，给予中国式现代化持久的力量支撑。正是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力量，让传统和现代贯通起来，让历史与未来连接起来，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两个结合”是对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特色的深刻把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向的科学指引。坚持“两个结合”，才能通过铸就新的文化形态的行为方式，为解决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现实难题提供文化支撑，建设面向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运用，从中凝练出解决世界难题、促进世界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建设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促进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更新和成长，焕发出与时俱进的生机与活力，不断引领人类文明发展、引领世界未来走向，建设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成果。这一文明形态的确立，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实现的历史性飞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诸多具有永恒价值的核心理念，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者爱人”的伦理观、“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等，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当代社会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这些经过时代淬炼的文化精髓，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滋养，成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宝贵文化资源。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对自身历史文化的高度自信，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建立在五千年文明积淀基础上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标志着中华文明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跨越。这一文化生命体既保持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格，又展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蕴含的独特的价值观念彰显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彰显了中华民族在现代文明建构中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焕发出中华文明的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塑形铸魂：培育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价值内核

中华民族文化价值内涵丰富，不论经历了多少次的更迭，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始终是中华民族最独特的文化灵魂。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在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基础上，通过吸收传统文化精华、借鉴外来文化优点，并结合当代社会实践而创造出来的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新文化生命体不仅承载着核心价值观，还通过创新性的发展和转化，使核心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活力和时代价值。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价值内核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价值内核，不仅是国家层面的精神旗帜，更是全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基础。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不仅致力于实现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而且重视精神生活的富足,把文化建设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尤其注重把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社会发展的要求,鼓励人民参与精神文化财富的创造,让人民的精神生活得到有效满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体现人的思想突破传统观念束缚向现代化转化的过程,是与现代文明生活相适应的文化演进过程,使人从本能生活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社会实践理性的高度发展。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强调的是实践主体能够自觉自主地站在与自身理念相契合的价值立场上,并持之以恒地坚守这一价值立场,不受他者价值观的支配,不因他者价值观的影响而转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主要指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为价值载体,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重要精神内核。

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不是僵化固守,更不是一刀切地保留传统文化的所有内容,而是要精挑细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发展。传统文化在历史的洪流中不断形成演进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认知水平、时代背景、社会制度的限制和影响,因此难免会包含陈旧或已经失效的元素。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塑造社会风尚,必须坚持辩证取舍,保留精华,去除糟粕,解决好“留”与“舍”的关系。在“舍”的方面,要减去过时的部分,根据新时代的特点和需求,传承和发展符合当代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果断抛弃过时的陈腐观念和实践;在“留”的方面,要增添新的内容,根据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对那些仍然有启示意义的内涵和形式进行改进,赋予其新的内涵和现代表达方式,使之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满足人民的需要。要通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内化与个体践行有机统一起来,树立时代楷模,引领社会风尚,通过主体精神的塑造凝聚价值共识,增强文化生命体的感召力,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二)人的现代化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目的所指

人是文化现代化的主体,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建构的本体论基础与价值旨归,它将文化创造与发展的核心重新锚定于现实的、实践的、社会的人。这一立场超越了将文化视为外在于人的客观结构或被动产物的片面认知,强调文化形态的生成、演变与价值实现,本质上是人类主体性在精神领域的对象化过程。因此,人的现代化不仅是文化现代化追求的目标,更是其得以展开的逻辑前提与不竭动力。文化的本质是自然的人化,即人类通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将自在自然打上主体意志的烙印,从而构建起属人的世界。文化现代化作为这一过程的当代形态,其根本目的并非仅仅满足于物质生产效率的提升,而在于通过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制度规范与生活方式,全方位地提升人的生存状态与发展潜能,推动人的需求层次从基本的物质满足向更高阶的精神充盈、自我实现跃迁。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化范式的根本所在。从现代化理论来看,现代化的内涵包括国家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但二者的逻辑关系并非平行并列,而是以人的现代化为终极归宿和最高标准。无论是经济结构的优化、科技的创新,还是政治制度的完善,最终都必须服务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在此过程中,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一个缺乏精神脊梁的民族,即便在物质层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其现代化也是残缺和脆弱的,容易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陷阱,丧失自我前行的方向与动力。因此,推动文化现代化并非现代化进程的附加选项,而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从初级现代化迈向高级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核心标志。它标志着现代化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向价值层面的深度挺进,意味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开始自觉地思考并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这一终极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推进文化现代化,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促进人的精神富足、塑造健全的现

代人格、培育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最坚实的精神根基。

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导向，构建新的文化生命体也必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文化使命，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人的精神生活置于前所未有的地位，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开启了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构建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形态，彰显了文化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摆在第一位的就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可以说，以人民至上为价值旨归的社会观，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生命体建设的必然要求。

（三）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华民族最独特的文化灵魂

文化形态的灵魂是指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理想人格中最核心的要素，集中体现了该社会的思想导向、伦理秩序与文明特质，不仅决定文化的基本性质与发展方向，也从根本上塑造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与世界观念。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体现人的思想突破传统观念束缚向现代化转化的过程，是与现代文明生活相适应的文化演进过程，使人从本能生活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社会实践理性的高度发展。因为有了核心价值观的不同，也必然会产生不一样的文化。在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宏大而庞杂的画卷。从中华民族古代农耕文明的发展，到工业文明的崛起，再到现代化文明的迅速崭露头角，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体一直在不断演化和壮大。中华民族的古代农耕文明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核心价值观，并以勤劳智慧的农耕生活为基础。这种文明形态凝聚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活的尊重，体现一种谦卑而自豪的态度。农耕文明赋予中华民族深厚的耐力和吃苦精神，奠定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随着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冲击与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体进入新的转型阶段。这一时期，文化发展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的进步，而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建构与表达。文学、艺术、思想、教育等领域蓬勃发展，众多文化精英以各自的创造实践，推动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的传承与创新，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与表达形式。

进入新时代，全球格局深度调整，文明范式面临重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各国精神文化建设提出了历史性考验。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坚守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种独立自主绝非狭隘的排外保守，而是建立在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体现为在开放中保持定力、在交流中坚守本位的文化自觉。历史经验表明，盲从他国发展模式的“跟人脚迹，学人言语”注定难以持续。不同文明体具有独特的历史基因、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任何成功的现代化道路都必须扎根于本土文明土壤。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构建，本质上是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塑过程，其核心要义在于培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价值取向，塑造具有文化自觉、价值判断力和创新能力的现代人格。唯有坚持走适合自身文明传统与现实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才能构建具有凝聚力和感召力的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也才能以自信而开放的姿态、以富有创造力的文化实践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属于中国的独特贡献。

结语

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个重大命题是深刻理解和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范畴，是彰显精神优势、强化精神主动和增强精神力量的先决条件。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唯物史观中精神生产、精神相对独立性等思想揭示了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条件和图景，为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提供深厚的理论基础[7]。纵观中国百年党史，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开拓前进取得的现实成就就是精神上独立自主的现实表征和精彩演绎[8]。在理论层面，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归旨。习近平文化思想有着鲜明的文化自强追求和国家文化主权意识，体现了以中国式

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所应有的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文化尊严和坚定的文化自信[9]。在实践层面,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为推进“两个结合”提供鲜明的行动指导。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仅是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命题的升华,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10]。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内形势,精神上实现了独立自主,就能在文化传承发展中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彰显民族文明的突出优势;就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在文化交流和文化互鉴中自信扬弃,为我所用,生发出中华文明的现代性要素和新人文精神特质[11]。立足文明频繁交流交锋的国际局势,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有助于提高整合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能力,在不忘本来中加强守正创新、在吸收外来中抵制文化侵略、在面向未来中推动文明进步[12]。

从去伪存真、固本培元、塑形铸魂三个方面理解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一命题首先体现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保持文化主体性,通过批判性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揭示其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工具的本质,同时在文明多样化进程中确立多元现代性的历史必然性,进而以辩证吸收与自主超越的姿态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其次,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依托“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既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形成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自觉,又夯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激活文明基因,最终塑造出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气息的新文化生命体。最后,在文化形态建构层面,精神独立自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内核,以人的现代化为终极指向,通过主体性文化实践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使中华民族在现代文明转型中既保持文化主权,又贡献世界性智慧。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帮助中华民族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识别并摒弃那些不符合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伪装与虚假,保留真正的民族精神内核,确保中华民族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能够坚守自己的文化本源,不断为民族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既维系了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又塑造了独特的文化形态和铸造了坚韧的民族之魂。可以说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理论基石,而且在全球化语境下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主体自觉与世界意义,是实现文化自强与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石。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4]李梦云,余其安.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J].中共党史研究,2025(3):40-49.

[5]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讲故事:第2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7]田旭明.精神独立自主:思想内涵、生成逻辑与实践要求[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6):57-64.

[8]曲青山.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J].党史文汇,2023(11):4-10.

[9]肖贵清.实现精神自信自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旨归[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25-29.

[10]陈金龙,吴智楠.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内涵、价值与实现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23(9):4-11.

[11]廖小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逻辑维度[J].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2(2):41-48.

[12]秦宣.以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夯实文化强国之基[N].光明日报,2024-04-12(11).

(责任编辑　光　翟)

数字消费主义的理性审视：历史出场、风险表征及其治理路径*

韩　敏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94）

［摘　要］　数字消费已成为数字经济发展、扩大内需的重要推动力。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数字资本衍生出以资本与技术的深度合谋、畸形消费的多元呈现、系列化消费装置的场域统治、意识形态的隐性规训、数字消费的生态代价等为表征的数字消费主义。要重新审思“人”“社会”“自然”等基本范畴在数字消费主义框架中的存在方式，探索规制数字资本的恶性增殖、匡正数字技术的发展轨道、加强对消费主体的全面引领等治理路径，助推数字消费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需要和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　数字消费主义；　数字资本；　数字技术；　消费异化

［中图分类号］　F1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5-0018-09

数字消费是以数字产品或服务为消费对象的消费活动，表现为消费行为、消费对象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1]。2025 年《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消费”。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依托全球最大的数字消费市场与最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消费迅猛发展。由数字资本、数字技术和消费异化融合而生的数字消费主义也随之兴起，极大地扩张了资本增殖的传统物理边界，人们不得不成为数字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者。面对数字消费主义浪潮，必须回应时代重大课题赋予数字消费的历史使命，以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以消费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让更多人通过数字之美享受消费之便。

一、从消费主义到数字消费主义的历史出场

消费主义是二战后资本逻辑建构的意识形态产物。进入数字时代，消费主义依托数字资本的增殖动力与数字算法的精密操控，扩展为更隐蔽、更精准、更具渗透性的数字消费主义。从消费主义的历史生成到数字消费主义的当代演变，资本逻辑在技术变革中的自我更新与深化，实现了消费向“数字生活商品化”的全方位蔓延，系统性重构了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乃至人的存在方式。

（一）追根溯源：消费主义何以生成的历史性考察

消费主义缘起二战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3BKS112），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内在逻辑与实践向度研究”（项目编号：KYCX25_0842）。

［收稿日期］　2026-04-18

［作者简介］　韩　敏，男，安徽潜山人，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家,其“实质是资本逻辑刻意制造出来的、服务于资本逻辑的附属性意识”[2]。由于资本的分裂属性,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重重,催生出相对消费能力不足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对抗的社会统治危机[3]。为了维持社会再生产运动和维系社会“总体控制”,消费主义就此生成。

从经济维度看,消费主义是维持社会再生产运动的内在要求。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运动的起点和终点,能够缓解以过剩生产为实际内容的经济危机,推动生产主导型社会转变为消费驱动型社会。一方面,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马克思认为:“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4]16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通过消费这个“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才能从物质形态转变为价值形态,才能实现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增殖和资本积累,“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4]15。另一方面,消费是生产的动力,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4]15。因此,在生产发达的丰盛社会中,消费已经取代生产而成为社会首要领域,对于生产的反作用愈加凸显,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愈加成为延续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运动的内在要求。

从伦理维度看,消费主义是维系社会“总体控制”的思想基石。生产的问题导致消费出现问题,需要的异化使得消费发生异化。消费主义本质上是生产领域的不平等、不公正传递到消费领域,致使经济危机蔓延为统治危机,不得不以更隐蔽、更具欺骗性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弥补政治暴力统治的不足,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控制”[5]。一方面,消费主义的异化自有其流变脉络,以异化劳动为起点,以异化需要为中介,最终流变为异化消费。人们为了逃避异化劳动的痛苦,在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中追求自由和幸福。在这里,“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6]223。这种对真实需要的抹杀和对虚假需要的人为制造,刻意诱导他人沉溺在对不可得之物和诱导者的依赖中,使得“需求瞄准的不是物,而是价值。需求的满足首先具有附着这些价值的意义”[7]59,消费也因此不单单指向肉体感官的自我消费,还更多指向商品符号的意义消费,显现出劳动者商品化到消费者商品化的异化流变。可以说,消费异化就是“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8]494。因此,消费什么都无所谓,只需要消费行为本身。另一方面,“消费领域是一个富有结构的社会领域”[7]50,一个极其不平等、不对称的社会领域。在表层,以琳琅满目的货架商品、五花八门的时尚符号、自由随意的购物选择营造社会包容和经济繁荣的丰盛假象;在中间层,大工厂生产大量商品、批量制造虚假需要、煽动大众情绪,广告、商品、观念、等级被某种符号编码体系组织串联起来,构成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的经济基础,让“消费、信息、通讯、文化和丰盛,所有这一切今天都由体制本身安排、发现并组织成新的生产力,以达成最大的荣耀”[7]43。在核心层,消费领域的控制与被控制实质上是大工业时代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关系的现代投射,包括资本家在内的所有人都被“物化”为片面的、抽象的、孤立的、纯粹的客体,让人一步步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符号拜物教滑向资本拜物教的深渊,不断淡化人们的主体意识、革命意识、阶级意识。

(二)时兴缘由:数字消费主义何以扩展的当代演变

当代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数字消费市场和拥有最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的国家,在“数字中国”与“人工智能+”等国家战略的顶层驱动

下,数字消费获得了空前的渗透力与塑造力。作为数字消费的孪生物,数字消费主义也随之兴起。究其本质来说,数字消费主义是在数字资本逻辑下,商品消费通过数字技术手段支配人与社会的现象,本质上是传统消费异化的升级[9],体现为数字资本、数字技术与消费异化的深度融合。因此,要理解数字消费主义,首先要理解其背后的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可以说是“运用数字技术,通过发现、利用、创造差异来获取利润、追求持续不断积累资本的体系”[10]35。数字资本并未颠覆传统的资本运行逻辑,而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将其核心逻辑即资本增殖及其对人的控制推向更隐蔽、更深入的数字阶段,由此实现传统消费异化的数字升级。

一是价值核心的迁移,实现从“商品拜物教”到“数据崇拜”的升级。数字资本主义的根本改造在于,把消费的价值形态追求从对实体“物”的崇拜转向对虚拟“数据”的绝对信奉。在工业资本主义中,价值凝聚于可触摸的实体商品,社会关系被物化的交换逻辑所掩盖。进入数字时代,价值的核心载体不再是物质实体,而是由个体行为实时生成的可计量、可预测的数据流。用户在数字平台上的每一次互动,无论是搜索、观看、点赞还是停留,都不仅是简单的行为,而是定义、评估乃至预测个体价值的数据原材料。资本增殖的基础由此发生位移:从主要依赖对物质生产过程剩余价值的占有,部分转向对生活、社交、娱乐等日常生命活动所持续产生的数据流的无限攫取与商品化。所有消费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数字资本增殖,具体表现为消费需求数字化、消费思维数字化及消费数据商品化[11],完成拜物教在数字维度的重建。

二是控制机制的进化,实现从宏观叙事到颗粒化算法治理的升级。数字消费主义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体现在其从宏观、单向的意识形态灌输,转变为微观、双向反馈的算法环境塑造。传统消费社会通过大众媒体广告构建普遍性的欲望叙事和集体认同,数字消费主义则借助算法实现权力的弥散化与运行自动化。算法将个体解构为无数行为数据点,并以此为基础,为每个人动态构建一个高度个性化、看似自主的“信息宇宙”。这种控制不再是外在的、有形的强制,而是内嵌于互动过程的环境性引导:它在你觉察之前预判你的需求,在你决策之时优化你的选项,在你满足之后激发新的欲望。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超级平台”作为这一机制的“操作系统”,将社交、支付、政务、信息、出行等功能无缝整合,构建高粘性、全场景的“数字生活世界”,将基于算法的、颗粒化的行为引导渗透至每一个生活瞬间,使消费者在不自觉中遵循由算法参数所设定的行为路径,实现从“被说服”到“被计算”的统治形式升级。

三是异化范围的扩张,实现从劳动领域到生命全域的升级。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根本性颠覆,是将“生产”的边界无限扩大,直至吞噬整个“生活”领域。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异化形式主要是劳动异化,发生于明确的劳动时间和固定的工厂空间。如今,异化已溢出传统的工作场所,弥散到个体的人所存在的所有时空。在数字生态中,生活本身即成为生产车间:社交互动生产人际关系数据与流量,休闲娱乐生产注意力与内容,身体活动生产生物信息与行为日志。过去“工作”与“生活”的清晰分野被“生产消费一体化”的模糊状态取代。这意味着,异化不再仅仅是劳动者与特定劳动产品的分离,而是人与自身最广泛的生命体验、社会关系乃至生物性存在的普遍分离。人的最私密的情感、最随性的行为、最本能的反应,都被持续转化为可分析、可利用、可交易的外部对象。生命活动被系统地“外部化”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数据资源,从而实现异化从局部劳动过程向整体生命过程的全面殖民。

二、数字消费主义的当代表征及其风险

伴随数字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数字消费主义已渗透到当代中国的方方面面,以隐蔽而日常的方式使消费从单纯的经济活动演变为意识形态权力与自然生态变迁的核心场域。

（一）驱动引擎：资本与技术的深度合谋

数字时代资本和技术的合谋日益紧密，营造了从欲望生成到满足的全链条数字环境，驱动着消费经济。大数据、云计算、移动支付、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加速融合需求端与生产端，把前端的生产商、中端的广告商和终端的消费者聚合到所有人共存的数字平台，而资本也在数字技术催化下以更快、更隐蔽的方式逐渐完成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所有领域的消费主义化，使消费成为数字化生存中无可回避的“自然”法则，最终走向流量至上、算法操纵的数字消费主义。

就制造消费需求来说，各大平台通过构建数字消费矩阵对消费者进行狂轰滥炸般的注意力抓取，运用粉丝量、点击率、转化率、排行榜等流量数据实时监测消费者心理并及时进行大数据分析，以虚拟场景、定向投放、信息茧房等手段精准捕捉并创造新的消费需求，这些便捷智能的“指尖生活”极大地增强了消费者个体与外界消费品的连接度，使自主选择异化为对算法推荐的条件反射。

就完成消费行为来说，花呗、零首付、分期付款、小额贷款等互联网信贷工具极大增强了消费者个体的支付意愿，减轻了支付痛感。这些由平台把持、数据加持的消费方式呈现出年轻化、低门槛、寡头垄断的特点，实质上将消费者纳入“消费—负债—偿还”的长期恶性循环，带来了更高效的数字剥削。

就满足消费需求来说，数字平台大幅缩短了需求制造、订单响应与商品生产之间的距离，通过对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整合进一步优化生产消费方案，既因降低生产成本而增加“生产者剩余”，又因引导社会消费而增加“消费者剩余”，从而通过增加总剩余（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总和）来持续累积资本[10]44。可以说，“今天的生产一般已经被数字技术套上了一般数据的羁轭，让数字资本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控制着全球的生产”[12]。

（二）形式异化：畸形消费的多元呈现

在数字资本驱动下，消费行为进一步异化，不仅背离真实的消费需求，更构建了一个由算法定义需求、由符号标识身份、由信贷预支未来、由社交激励竞赛的数字消费主义生态，衍生出虚假消费、超前消费、符号消费与攀比消费等相互交织的新形式。

虚假消费体现为被制造的数字幸福。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13]6虚假消费的核心，在于数字技术空前高效地将“虚假需要”植入日常生活。平台算法不仅能识别用户既有偏好，更能主动预测，甚至创造新的欲望，并将这些消费欲望与幸福、个性、社会认同等终极价值精准绑定。当个体在短视频中追寻“说走就走的旅行”，或在社交平台上模仿“精致生活”时，其消费决策已非源于内在需求，而是对算法所编排的“美好生活模板”的被动响应。

符号消费源自数字身份的系统编码。“在这种符号价值经济中，优势阶级控制了符号化的过程。因此，看似是人们选择着商品，商品给人们带来愉悦，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服从着一种集体的社会逻辑，人并不是真的因为内在需求而消费，他们是被符号牵着鼻子走。”[14]56-57国潮风范、科技极客、网红同款等系列消费符号共同构成数字身份编码系统。个体通过购买特定品牌、打卡特定地点、使用特定滤镜，向算法和社群宣告自己的阶层归属、审美品位与文化立场。然而，符号的定义权与阐释权，高度集中于平台资本、头部品牌与关键意见领袖手中，以至于复杂多维的社会认同被简化为可量化、可购买、可展示的数据标签，让人在追逐符号的过程中逐渐疏远真实的自我及深度的社会情感。

超前消费显现为算法助推的时间殖民。花呗、白条等消费信贷产品被无缝嵌入支付流程，配合限时优惠、先用后付、默认开通、关闭复杂等产品设计，鼓励个体以未来劳动为抵押换取当下消费资本和即时欲望满足，共同营造“现在拥有，未来支付”的消费幻觉，形成“预支—快感—负债—再劳动”的循环：人们为偿

还消费债务而不得不持续劳动，而劳动所得又迅速流入新的消费循环，借此实现对人的生命时间的深度殖民。

攀比消费彰显了可见性竞赛的算法放大。从朋友圈的精心展示到名媛圈的拼单炫富，从粉丝群体的集资打榜到社交媒体上的精致表演，饥饿营销、网红效应、饭圈文化、猎奇心理、节日优惠等外界刺激不断将“我想要”扭曲为“我需要”，迫使人们陷入商家所制造的容貌焦虑、社交焦虑、学历焦虑圈套而不得不竞相追逐其所提供的化妆品、高端聚会、课程提升等消费型解决方案。消费由此变成一场被流量支配、永无止境的可见性竞争。

（三）空间重构：系列化消费装置的场域统治

数字消费主义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系统性地重构空间，将其转化为一个庞大精密的“系列化消费装置”网络，进而通过空间的总体性驯服和算法化区隔，将消费逻辑植入从城市景观到个人屏幕的每一个角落，形成对生活世界的全面渗透与殖民统治。

从空间的总体性驯服来看，数字消费主义消解了消费与生活其他领域之间的明确边界。一方面，实体空间被深度智能化、场景化。购物中心通过分析客流数据优化动线设计，博物馆、公园和传统街区被植入 AR 互动点，其核心功能从实地文化体验转向线上打卡分享。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统治发生在数字空间。在以微信、抖音、淘宝为代表的超级应用里，消费不再是需要专门前往的“事件”，而成为弥漫在数字日常中的持续性背景行为与默认交互习惯。例如，刷朋友圈时被种草，看视频时直接下单，聊天时即刻分享购物链接，生活本身被重构为以数据生产和消费循环为核心的数字化存在。

从空间的算法化区隔来看，数字消费主义不仅复制了物理空间的阶层区隔，更通过算法发展出一种更高效而隐蔽的“微粒化”社会分层与固化机制。一方面是偏好隔离与信息茧房。算法根据消费能力、浏览习惯、社交圈层等用户数据画像，针对性推送千人千面的商品、内容与广告。高端用户沉浸于奢侈品与海外旅行的信息流，而下沉市场用户则被包围在性价比与砍价游戏中。这种基于数据的个性化过滤，在数字空间筑起无形的“阶层气泡”，让不同群体生活在被算法定制化的平行世界里，强化了社会认知的分化与固化。另一方面是符号准入与数字身份。一些社群、直播房间或付费知识圈子，需要特定的消费记录、会员身份或虚拟道具才能进入，消费能力直接兑换为数字空间的访问权限与社群地位。个人通过展示消费品牌、旅行目的地、娱乐方式，在社交媒体上精心经营“数字人设”，构成其社会阶层最直观的可见性标识，使得数字空间的阶层表演成为获取社会认可的必修课。

（四）文化驯服：意识形态的隐性规训

数字消费主义对当代文化的改造已远超传统商品推销层面，正演变为一场系统性、智能化的文化驯服。它通过算法和平台，将消费逻辑更深地植入文化意义生产系统，使资本增殖法则内化为个体无意识的日常准则，在自主选择和娱乐享受的表象下完成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度规训。

在文化意义的算法消解上，表现为“娱乐至死”。由于消费主义文化“契合了商业文化中的生产机制，生成了诸多反文化、反历史、反价值的新因素”[15]288，数字消费主义借此将泛娱乐化推向极致，并与算法推荐机制深度绑定。平台算法优先推广那些能够最大化用户停留时长与互动率的内容，而这通常是轻松、直白、富有情绪冲击力的娱乐化、碎片化信息。严肃的历史被简化为“几分钟说电影”的戏说桥段，复杂的社会议题被转化为立场先行的煽情表演或简单的二元对立，深刻的文艺作品被解构成仅供传播的“金句”和“梗”。其结果是系统性的文化祛魅：思想深度与理性思辨让位于即时快感与情感宣泄，社会进行公共讨论与价值追问的能力被削弱。公众注意力被持续导向消费语境所能轻易解释和“解决”的领域，导致历史感知的浅薄化和文化认同的虚无化，从而为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全面渗透扫清了认知障碍。

在文化霸权的流量重塑上，表现为“平台定义”。传统的文化霸权常与西方中心主义绑定，而数字消费主义的霸权则体现为由平台算法和流量逻辑所主导的新型文化定义权。在审美标准定义上，什么是美、什么是潮流，不再仅由巴黎或纽约的时装周定义，而是越来越多地由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的热度榜、挑战赛数据表现来塑造和更迭。这种由大众点击量决定审美标准的模式看似民主，实则受平台规则和背后资本的隐秘操控，形成快速迭代但同样具备强制性的文化新霸权。在价值观定义上，个人主义、即时满足、颜值正义等价值观，被无缝编织进游戏机制、短视频剧本和社交互动设计中。例如，“打卡”文化将消费体验转化为可见的社交货币，“升级”和“解锁”的游戏机制将账号等级与消费直接挂钩，这些被数据强化的价值观，以技术中立的姿态，持续冲击着勤俭节约、延时满足等传统消费美德，将两种观念的意识形态之争巧妙转化为对效率至上、个性解放、消费自由的话语表达。

（五）生态压力：数字消费的生态代价

数字消费主义极大地加剧了生态压力，让生态代价的转移更隐蔽，让生态责任的追溯更困难，造成有限与无限的“匮乏”矛盾：消费欲望无限而生产能力有限，数字扩张无限而自然资源有限，人类污染无限而生态恢复有限。

一是高生产高消费高浪费周期的数字化加速。网红产品、限量发售、“双十一”等数字营销节日在算法推送下制造了一波波消费浪潮，极大地缩短了商品从“欲望”到“废弃”的周期。二是平台经济下的物流垃圾。外卖、即时零售的兴起，创造了塑料餐盒、餐具、快递袋等海量一次性包装垃圾，直播电商的冲动消费模式更是进一步推高了退货率，产生大量“反向物流”垃圾，其包装和运输过程造成额外的资源消耗与碳排放。三是数字消费“足迹”转化为实体“碳足迹”。数字消费依赖庞大的数据中心、网络基础设施和终端设备，这些数字基础设施本身是高能耗的。每一次数字端的滑动、点击、视频流和云存储背后，都是真实的能源消耗。四是虚拟体验催生实体破坏。网红打卡地的流行是算法推荐与社交炫耀结合的典型产物。数字平台的“种草”内容能瞬间吸引超量客流，对脆弱自然景观造成植被踩踏、垃圾遗留等集中式、爆发性生态破坏，这种破坏在数字时代被急剧放大。

三、防范数字消费主义风险的治理路径

数字消费主义源自数字资本、数字技术与消费异化的共同驱动。作为消费主体的我们，有必要“深刻领悟消费之‘需’与虚假之‘需’的根本性差异”[16]，通过规制数字资本、匡正数字技术、加强消费者主体引领三位一体的路径，引导数字消费从“资本的增殖工具”与“异化的实现场域”，转向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赋能力量，回归数字时代的真实消费需求。

（一）规制数字资本恶性增殖：促进数字领域的消费正义

数字消费主义的症结根植于数字资本的恶性增殖。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为数字资本设置“红绿灯”，引导数字资本真正服务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数字消费主义的本质祛魅，促进数字领域更全面、更高层次的消费正义。

一是管控数字资本规范化发展。在市场公平维度，强化数字平台的公益导向，严格监管“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恶意并购等排他性、限制性竞争行为，推动数字消费市场有序竞争；同时健全投诉、举报、仲裁、诉讼等多元维权渠道，为消费者提供便捷、公正、透明的纠纷解决路径，切实保障消费者的数据所有权、使用权、知情权、选择权等合法权益，有效化解数字消费纠纷。在数字资本生产要素维度，既要加强算法治理，优化算法技术源点，规避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渗透，评估企业算法模型是否存在消费歧视或操纵；还要深化数据治理，落实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探索建立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数据产权制度与收益分配机制；更要引入算力治理，统筹算力资源配置，推动公共算力、智能算力资源优先服务于数字消费领域的场景创新、服务升级与普惠应用。在防范金融风险维度，坚守数字资本服务

实体经济的立场，“防止数字资本的金融资本特性自我膨胀，坚决遏制数字经济活动‘虚拟经济化’过度化发展的冲动或倾向”[17]，严格规范消费、支付、信贷等业务的金融化边界，严厉打击脱实向虚、经济空转、过度加杠杆的金融乱象，从根源上斩断数字消费主义借助金融工具操控消费行为的支撑链条。

二是引导数字资本服务美好生活需要。在消费升级维度，数字消费主义以技术迭代之名制造持续的消费焦虑，应当引导数字资本流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技术创新，面向人的多样化需求增加高品质供给，使消费升级真正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非资本的无尽增殖。在消费普惠维度，数字消费主义以弥合鸿沟之名拓展资本增殖的消费版图，应引导消费普惠实践回归社会公平的本质，让数字化红利真正惠及每一个群体，而非沦为资本下沉市场的工具。在消费场景维度，数字消费主义以数字文创、国潮非遗之名将精神消费全面商品化，应引导数字场景创新服务于文化传承与人的精神丰盈，而非成为资本增殖的新场域。

三是超越数字资本逻辑，在对数字消费主义的本质祛魅中促进数字消费正义。所谓消费正义是指“从人的生命尊严及其价值的维度出发，对人的消费行为及其关系进行的经济合理性追问和价值合法性反思”[18]，数字消费自有其正义导向，而实现这一正义的前提，正在于穿透数字资本对数字消费主义的系统性操控。在生命本质维度，数字资本以符号编码与算法推荐将人降格为数字产销的数据节点，让精神丰盈让位于物化追逐，应当超越数字资本的增殖逻辑，以社会主义的人本逻辑实现从单向度消费者到多向度的人的历史性转向。在社会运行维度，数字资本以虚假需要替代真实需求，使消费行为脱离人的实际福祉而服务于无限增殖，应当超越数字资本的议程设置，复归数字消费拉动经济、改善民生的本真功能。在自然生态维度，数字资本以消费欲望的无限扩张透支地球有限资源，将生态承载力持续推向临界点，应当超越数字资本任意转嫁生态代价的生态帝国主义，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内嵌于低碳数字消费的全场景全过程全链条。

（二）匡正数字技术发展轨道：推动数字科技的良性发展

面对数字消费主义的深刻影响，数字技术并非价值无涉的中性工具，算法的权重分配、数据的采集范围、界面的交互逻辑无不内嵌着设计者的价值选择。关键在于进行积极的价值匡正与战略引导，实现数字技术的向善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使数字技术从作为满足数字资本增殖的工具转变为满足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重要手段[19]。

一是促进数字技术向善发展，化“流量至上”为“流量向上”。虚假消费、符号消费、超前消费、攀比消费等畸形数字消费正是算法之恶的具象化表现，要推动技术向善，就必须从算法这个数字消费主义的技术“总开关”入手。一方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美德、未成年人保护等作为核心算法参数，提升正能量、多样性内容的推荐权重，将用户满意度、内容信息增量、社会价值贡献纳入流量评价体系，让真正创造文化价值、知识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向善”内容获得与之匹配的流量能见度与商业回报；另一方面，建立算法伦理审查与影响评估制度，重点评估歧视性偏见、过度诱导非理性消费、损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尤其应规范消费信贷类算法，防止向年轻及低收入用户推送超出偿还能力的数字消费产品，确保算法不偏离公序良俗与公平正义。

二是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破解数字消费主义的文化霸权。数字消费主义的核心手段之一，在于将文化定义权收编于平台算法与流量榜单，使审美标准由“热度”塑造，把价值观编织进游戏机制与社交互动，让消费者在无形中遵循一套由数字资本主导的意义编码体系。打破这一新型文化霸权，须以自主技术创新提供替代性选择，从技术底层瓦解垄断。一方面，聚焦人工智能大模型、高端芯片、基础算

法、隐私计算等“卡脖子”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同时基于我国本土消费市场、丰富文化资源和独特消费习惯进行技术应用创新，促使创新焦点从单纯的话语权争夺转向解决真实的消费痛点；另一方面，构建开源开放、安全可控、产业链协同的数字消费创新生态，共建多元主体公平参与的数字消费平台，有效对接消费者需要与生产供给，促进数字消费结构性优化，破解平台垄断与数据孤岛问题。

三是促进数字技术绿色发展，突破数字消费主义的生态困局。数字消费主义以消费加速与商品迭代为增值手段，必然导致网红产品快速迭代、物流垃圾泛滥、数字基础设施高能耗等生态后果。须将生态维度嵌入数字技术治理。开发碳足迹追踪技术，以区块链溯源和大数据生成透明碳足迹，为消费者直观化呈现数字消费的生态代价。研发可降解循环包装材料，推行智能物流减少运输能耗，构建“逆向物流”回收平台，推广无害化垃圾焚烧技术，以技术手段打破数字消费主义的“生产、消费、废弃”循环。将绿色算法纳入平台评价体系，对环保产品和可持续消费给予流量支持，对高能耗高浪费模式予以算法降权，使流量分配服务于生态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消费主体全面引领：迈向自由全面的数字生存

数字消费主义彰显了文化工业时代工具理性、大众文化、阶级意识的复杂关联，要加强数字消费者的主体引领，抵制文化工业的物化效应[20]，让“消费复归为满足人的合理需要、推动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体性活动”[21]，最终迈向一种更为自主、充盈且具有人文温度的数字化生存方式。

一是思想引领，倡导劳动幸福观与科学消费观，从观念源头打破数字消费主义“消费=幸福”的迷思。一方面，人的需求满足应当指向生产活动的组织功能而非消费活动的功能[22]。人的真正满足与自我确证并非被动的、符号化的消费活动，而是源于能动的、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7]223，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另一方面，弘扬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科学消费观，让数字消费实现从“虚假需求”向“合理需求”的理性复归。以“适度需求”消费观引导数字消费，倡导“够了就好”与“质优于量”的消费智慧，引导消费者辨析“我想要”与“我需要”，瓦解“即时满足”心理机制；以“精神需求”消费观引导数字消费，鼓励在真实需求基础上进行发展型、文化型消费，超越虚假需要的虚假补偿；以“生态友好”消费观引导数字消费，将消费选择置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加以审视，加强生态型消费与高品质生活之间的关联。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俭以养德、过犹不及、天人合一等消费伦理，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消费素养和消费审美，将其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结合，为理性消费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

二是能力引领，提升数字消费者的主体数字素养。数字消费主义通过算法将个体解构为可计算、可预测的行为数据点，并构建高度个性化的“信息茧房”，使消费者在“自主选择”的幻象中不自觉地遵循数字资本预设的消费路径。一方面，要培养算法认知与批判能力，使消费者全面系统地学习数据科学、算法、模型化等知识，理解算法推荐、算法黑箱、信息茧房等运作机理，识别消费陷阱、虚假需求与数据剥削，认识到“个性化”背后存在的信息窄化与诱导性；另一方面，要强化数据权利与隐私保护意识，促使个体明确自身作为数据生产者与拥有者的权利边界，学会管理个人数据、审慎授权、定期清理数字足迹，警惕免费试用转付费等营销套路，增强抵御数字消费主义侵蚀的自我保护力。

三是话语引领，打造美好生活的数字消费文化新叙事，打破由数字资本和流量逻辑垄断的消费话语权。一方面，依托元宇宙、大模型、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数字化技术，通过短视频、微电影、AI 短剧、数字影厅等数字文化形式，鼓励和支持关于新型数字消费的文化创作、媒体传播与公共讨论，关注和颂扬知识探索、技能精进、社群互助、志愿服务与审美创造

等非消费维度的价值实现，有效消解数字消费主义的泛娱乐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塑造“美好生活”的多元价值标准，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渗透力，深度解析文学圈、学术圈、网络圈等不同圈层的话题偏好、语言特色并找到话语生成规律[23]，构建家庭和睦、身心健康、社会贡献、文化滋养等多维度的“美好生活”图景，将合理消费、深度体验、可持续发展等消费理念植入日常生活场景，对冲数字消费主义所渲染的单一焦虑型话语，让美好生活的定义权回归公众的理性共建。

[参 考 文 献]

[1]邹永红，李红亮.数字资本场域下的数字消费主义：出场、表征与祛魅[J].学习与探索，2024(7)：127-133.

[2]鲍金.揭开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面纱[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11)：108-113.

[3]邓海林，韩敏.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共同富裕的理论根基与实现路径[J].江苏社会科学，2023(4)：9-17.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王雨辰，王梦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根本性超越及其价值[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5(10)：84-93.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9]陈鹏，龙玥儿.数字消费异化：本质、影响及应对[J].消费经济，2023(3)：14-25.

[10]森健，日户浩之.数字资本主义[M].日本野村综研(大连)科技有限公司，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11]郑冬芳，秦婷.数字资本驱动下新消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释析[J].思想教育研究，2022(7)：86-93.

[12]蓝江.数字的神话与资本的魔法——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看数字资本主义[J].探索与争鸣，2023(6)：110-119.

[13]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14]安东尼·加卢佐.制造消费者 消费主义全球史[M].马雅，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

[15]陆贵山.中国当代文艺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6]张子玥.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视成域下消费主义现象的四维解析[J].思想教育研究，2022(9)：111-117.

[17]黄再胜.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分配[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3)：104-119.

[18]邹智贤.消费正义：破解现代社会消费困境的价值原则[J].求索，2017(3)：89-93.

[19]马超.数字消费主义的逻辑生成及其批判性考察[J].思想教育研究，2023(2)：76-82.

[20]梅景辉.文化工业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思想维度——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现代性反思[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67-74.

[21]孙伟平.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消费异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1)：71-80+164.

[22]王雨辰.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伦理价值观[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156-163.

[23]王海威.人工智能诱发隐性意识形态话语风险的逻辑机理及化解策略[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4)：124-133+155.

(责任编辑　王遐见)

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对策制定*

许　斌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科研处，江苏南京　211200）

[摘　要]　全媒体时代重塑了传播生态与话语格局，为厘清高校话语权建构的理论逻辑，须立足于全媒体传播生态的底层逻辑、主流话语价值认同的核心逻辑以及高校立德树人的本质逻辑三个层面，通过系统阐释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理论根基与内在机理，明晰话语建构的核心原则与底层规律，由此发现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面临主体功能性式微、主流价值尚未统一、深度认同建构壁垒三重挑战。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导致话语权去中心化，高校青年群体在圈层化传播中对主流价值进行倾向性重塑；网络传播的开放性加剧了信息混杂与认知整合困境，严肃话语面临碎片化解构风险；互联网技术即时性的量化指标与育人规律形成结构性张力，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出现深层失衡。对此，高校需遵循全媒体传播规律，从主体功能赋能、认知整合强化、深度认同建构三个维度系统发力，通过培育理性参与者、建构认知框架、确立人文温度优先导向等对策，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传播效度与认同深度得到提升。

[关键词]　全媒体；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　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5-0027-08

引言

从传统媒体时代发展到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与运作机制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并非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网络空间的简单延伸，而是在新的传播技术条件下生成的、具有独特运行规律的话语权形态。当前，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内涵的界定主要有延伸说、体系说、属性说和融合说等观点。“延伸说”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现实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延伸；“体系说”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引网民观念和行为的思想体系；“属性说”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网络中维护特定阶级、社会集团利益的思想意识；“融合说”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网民在网络社会中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念表达方式的综合[1]54，其核心体现为话语引领权、话语主导权、话语主题设置权与话语价值权的有机统一[2]。与传统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相比，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方式交互化、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效果圈层化等特点，其运作方式更加依赖网络技术平台，也更加容易受到算法逻辑与流量逻辑的干扰[3]。

在全媒体时代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

*[基金项目]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思政工作研究专项课题“全媒体时代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逻辑与实践路径”（项目编号：2526SZYB01），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推动新时代数字文化建设的现实挑战与破解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6SJYB128）。

[收稿日期]　2026-03-14

[作者简介]　许　斌，女，山东临沂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科研处助理研究员。

权建设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从风险维度看,其一,传播渠道多元,形式隐蔽,智能算法驱动易出现圈层化传播的“信息茧房”风险;其二,传播内容的碎片化导致信息分割,面临消解话语权威风险[3][4];其三,传播方式泛娱乐化进一步稀释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5]。从价值维度看,掌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不仅是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要义,更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能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任新人的必然要求。所以,掌握了高校网络空间的话语主导权,就拥有了影响青年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认同的重要场域[2]。

高校是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场域,其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其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学生,其主要目的在于培育学生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主要话语目标不仅是舆论引导,更包含价值塑造与立德树人的双重职能[6]。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既要遵循网络传播的一般规律,把握住网络的新颖形式,内容的深厚蕴含,更要凝聚多方社会教育,创造契合高等教育的育人逻辑[7]。从现有研究来看,学界围绕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针对全媒体这一特定传播形态的系统性研究仍有深化空间,特别是在话语权建构的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建构对策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探索。

基于此,本文以全媒体时代为研究背景,以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深入阐释全媒体时代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论内涵与建构逻辑,进而探索符合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网络传播规律的话语权建构对策,旨在为全媒体时代高校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与凝聚力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一、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理论逻辑

全媒体技术的迭代革新重塑了信息传播的底层规则,重构了高校意识形态的传播场域、话语形态与权力格局,使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呈现出区别于传统媒介时代的全新发展规律。高校话语权建构并非单纯的传播技术革新或宣传方式调整,而是立足时代变迁,依托媒介理论与育人规律,契合价值认同需求的系统性工程。厘清全媒体时代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理论逻辑,须立足于全媒体传播生态重构的底层机理、主流话语价值认同的核心规律和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本质。

(一)全媒体传播生态重构的底层机理

全媒体是随着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变革将媒体信息的格局整合重构的新兴形态。这些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促进了媒体格局的改变,更极大地“推动整个世界进入信息化社会和全媒体时代”[8]57,也让全媒体更加开放、多元和即时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9]317全媒体的传播特性重塑了高校网络传播生态,提升了高校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传播效度,为话语体系的创新重构提供了技术底层逻辑。

其一,全程媒体突破了传播格局,拓展了话语传播场域。全程媒体依托信息传输技术,摆脱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使媒体信息以全过程、全方位、全视角的方式传播,全媒体的传播方式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不再局限于线下课堂、主题班会等固定场景,还可依托线上网络空间平台实现随时随地传播,为话语权的常态化建构提供传播基础,使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网络空间话语场域实现了全域延伸。其二,全息媒体解构了内容形态,重塑了话语传播范式。在信息网络、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推动下,全媒体的传播途径从单一的文字传播模式向网络直播、短视频、数字图文等多元化的视听

传播形态转变,这种智能化的传播范式使信息源误差大幅减少,云端存储使得海量信息的传播数据更为精准,信息传播方式的场景化、具象化也更契合高校青年学生的媒介接触习惯。其三,全员媒体打破了主体壁垒,重构了话语权结构。智能终端的普及应用降低了进入媒体的门槛,使参与主体更加多元,让每个人都成为信息内容的生产者与传播者,从而改变了传统媒体一元主导、强力引导的传播格局。教育者不再是唯一的话语权威,高校学生、校园圈层博主、网络意见主体均可参与高校网络话语生产。传统的单向话语传播结构被颠覆,新型传播形态的出现充分调动了高校学生参与网络传播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其四,全效媒体量化传播效能,重塑了话语评价逻辑。丰富的媒体载体与技术应用可以实现传播数据的精准抓取与效果量化。全效媒体通过技术融合媒介资源、拓宽传播渠道等方式,根据用户的信息数据画像,进行算法加工处理,推荐符合用户喜好的内容,为受众提供更广泛的体验,让传播效能的精准度和功能性得到全面覆盖,释放更强大的效能。全效媒体的核心是将不同媒介之间的信息相互印证,通过协同作用营造出视听效果,为网络意识形态广泛渗透高校学生的学习生活提供更加智能的方式。

(二)主流话语价值认同的核心规律

全媒体时代不仅是一种传播媒介与融合形态,更是一种新型业态、生存场域、社会形态[10]。全媒体作为互联网、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媒介深度融合的产物已然成为当代人的生活模式,不仅为主流意识形态扩大自身影响力和增强自身吸引力提供了全新场域,也在传播载体、传播结构和传播效率等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主流意识形态既有的传播格局[11]。全媒体时代的网络传媒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全媒体时代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强调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张的主导性地位和传播媒介的整合性影响力。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和理论指导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12]153,这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方向。

高校是培育学生引导青年价值观方向的重要场域,是各类前沿思潮的聚集地,也是推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生成的现实空间。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是高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高校为主要传播场域,围绕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为载体,凭借科学性,有效地向受众传递观点,并掌握对全媒体时代高校内出现的各种不符合主流价值观念的、错误的社会思潮的批判权,最终把握高校舆论走向和掌握师生的思想动态。

深度审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论建设,更表现在价值维度。在全媒体深刻重塑传播生态的时代语境下,提升高校网络意识形态传播能力具备多层的价值意蕴,这一价值维度不仅表现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系统性、完整性建构,更体现为传播范式转型中的创新性突破与跨越式发展。

其一,在思想价值层面,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根基。高校应以理论指导推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研究,深化高校青年群体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理解,增进理论阐释的张力与范畴,引导高校青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认同,明确发展目标和行为选择。其二,在实践价值层面,马克思强调:“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13]805所以,在建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时,要将现实生活中的学生个体以及他们的实践活动作为价值逻辑,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要求,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目标紧密结合。其三,在表达价值层面,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始终与时俱进,推进变革性实践,实现突破性进展。全媒体时代的创新表达形式有助于拓展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的理论建设深度及传播吸引力的

广度，有助于引导青年群体加深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识与理解，使其明确时代需求与价值契合。

（三）高校立德树人任务的本质遵循

“立德树人”任务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尤其是人的全面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题中之义和人自由发展最高层次的追求。全媒体时代数字技术的革新与教育数字化的转型，重塑了高校育人场域与实践模式，但立德树人依旧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根本逻辑与本质遵循。坚守立德树人导向、契合青年成长规律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全媒体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守正创新的核心要义。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兼具政治属性与教育属性，是全媒体时代育人体系的核心战略环节。其一，是建构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现实需要。教育的本质在于价值传递，全媒体时代多元网络思潮交织碰撞，碎片化、功利化的网络信息极易误导青年认知，必须通过具有感染力、针对性与时效性的内容供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算法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方向，引导青年从内心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其二，是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聚焦的核心载体。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拓展了高校育人的固有思维。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育人目标是培育拥护党的领导、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青年人才，这也就要求高校网络建设始终立足青年成长需求，实现网络建设与育人协同共振。其三，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键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已成为广大青少年学习生活的重要空间，要提高网络育人能力，扎实做好互联网时代的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14]219。全媒体技术打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局限，将单向灌输式教育转化为可跨越时空的互动式、沉浸式教育，这弥补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不足、实效性不强的缺点，同时强化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代适配性。依托全媒体精准传播与深度浸润的优势，对于高校青年错误的思想认识能够及时矫正偏差，塑造其正确的三观，将创新话语与立德树人深度耦合，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二、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面临的挑战

意识形态形成的根源在于物质生产[6]。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并非抽象、机械的存在，而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直接关联，受特定时代环境制约并随时代发展而不断调整。随着全媒体时代网络媒介向纵深发展，网络技术的迭代升级不仅催生了全新的传播生态，更推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呈现出鲜明的技术驱动特征，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潜在风险挑战。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弱化了公众的言论责任意识，互联网技术的开放性赋予了广大公众更多的话语权，网络传播的即时性加速了舆情传播的速度，但这种匿名性、开放性、即时性也使得社会信息流动日益呈现扁平化趋势，削弱了高校网络舆情管理的控制力，使其难以有效遏制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扩散，为研判失真、错误思潮、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各类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易借助网络传播，对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场域形成冲击。

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互联网深刻改变了传统传播结构，参与式、互动式、融合式等方式已成为当下典型的社会传播模式，而传播方式的变革也加剧了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高校青年学生作为网络活跃群体，易受多元网络话语的影响，这就增加了高校意识形态引导的难度，因此必须清醒认识技术变革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挑战。

（一）全媒体时代主体功能性式微

在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深度渗透下，全媒体格局对网络意识形态主体功能的冲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态势。网络空间的匿名性降低了传播门槛，意味着人人都有麦克风，每个个体都可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与传播者，这一格局

直接改变了传统意识形态传播中自上而下的垂直传递结构,呈现出主体功能性式微的风险。

首先,话语权的去中心化加速了主体身份的弥散。在全媒体时代,话语权从官方机构扩散至普通民众,传播节点呈几何级数增长,高校青年群体也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主动的内容生产者或议程设置者。他们在虚拟空间中以兴趣偏好和价值认知为纽带,迅速聚合为具有内部话语体系和身份认同的多元圈层。这些圈层在内容共创与日常互动中将主流意识形态表达按照群体目标指向进行倾向性重塑,这种重塑不再是外部的对抗式解读,而是内嵌于圈层文化肌理的再加工与再诠释。每一次圈层内的内容共创,跨圈层的传播扩散,都在持续消解传统意识形态主体的权威性与中心性地位。更具挑战性的是,全媒体的全员参与特性使得这一过程极为隐蔽,高校青年群体在追逐兴趣表达与寻求圈层归属的过程中,往往意识不到自身正参与着对主流价值的重新编码,其主体身份在碎片化的信息生产与消费中不断弥散,传统意义上清晰的“受众”边界被彻底打破。其次,受众本位理念在全媒体互动中被推向极致,人机关系矛盾进一步放大。全媒体时代下全员媒体的核心逻辑是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算法推荐机制作为这一逻辑的技术载体,根据用户的点击、停留、互动等行为数据不断强化其既有的兴趣偏好与价值取向,形成“信息茧房”与“回声室”效应,这就导致青年群体的多样性价值取向在算法的精准推送中被固化,原本多元的价值观念在算法的反复强化下,演变为在封闭圈层内不断自我确证的真理,积极正向的价值认知在迎合用户偏好的过程中不断被分割重组,以适应不同圈层的审美趣味和话语风格,人与技术的矛盾便凸显于此。技术本应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拓展人的认知边界,促进人的理性对话,却在全媒体的流量逻辑下异化为强化认知偏差、固化圈层壁垒的工具。当算法主导着青年群体的信息视野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资源在与个性化推荐内容的竞争中往往处于增量不足的境地,系统性的理论阐释难以匹敌碎片化的感官刺激,深度的价值引导难以穿透层层过滤的圈层壁垒。

(二)全媒体时代主流价值尚未能统一

在全媒体时代的高校场域中,传播内容的碎片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媒介环境的深度开放,这种开放性打破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壁垒,赋予了多元主体平等的话语权,但也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深层风险。

一方面,传播主体泛化带来话语权威稀释风险。全媒体传播开放性使得高校场域内的信息生产者不再局限于官方宣传渠道,学生组织、社团账号、自媒体或校外机构等都可以通过便捷的方式介入校园信息传播,这种多元主体并存的格局虽然活跃了校园文化表达,但也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从唯一传递变成之一表达,使其原有的权威性和主导性地位在不知不觉中被稀释,主流话语面临着被淹没的风险。同时,信息来源混杂易引发认知整合困境。在海量信息的冲击下,真伪信息混杂在来源各异的渠道并以碎片化形态呈现,高校青年在缺乏足够辨别能力的情况下难以有效自主整合碎片信息以形成完整认知体系。当来源不同的信息相互矛盾时,高校青年难免陷入认知困惑,甚至会对一切信息源产生怀疑,包括动摇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信任根基。另一方面,表达方式自由化导致价值解构风险。网络空间的开放性赋予了个体表达观点的极大自由,为追求个性化、趣味化的表达逻辑,严肃的意识形态话语往往被改造成轻松娱乐的文本片段,一些原本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政治话语,在碎片化的传播中被抽离出原有的语境,成为可供随意调侃的网络梗或表情包。这种表达方式的自由,虽然增强了短时间内的传播力,却也导致了深层意义的浅表化。当学生习惯于以娱乐心态接触这些被改造后的话语片段时,主流意识形态所承载的严肃价值便面临着被解构的风险。

(三)全媒体时代传播价值认同存在壁垒

媒介技术学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曾指出:“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

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15]21全媒体传播以其精准触达的突出特征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带来新的技术支持，但同时也加剧了价值传播过程中内在的复杂性。高校作为青年群体的聚集地和意识形态交锋的前沿阵地，全媒体的技术逻辑与高校育人场景相互交织，使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更为具体的挑战。

量化考核导向与高校育人规律之间形成结构性张力。全媒体强调传播效果的可测量性，点击率、完播率等量化指标日益成为衡量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这种评估导向易诱导意识形态传播过度追求即时反馈与短期流量，从而忽视了对青年价值认同的深层建构。立德树人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但在全媒体时代的量化压力下，部分高校的意识形态传播易倒向符号化、仪式化的浅层表达，使主流意识形态在校园网络空间中的话语温度与持久感召力不断衰减。

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存在失衡问题。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未能充分融入人文关怀，难以实现师生与学生之间真实的情感互动与联结。在全媒体传播格局下，如何在量化指标与价值建构之间实现平衡，如何在信息精准触达与社会意义共识之间搭建桥梁，已成为提升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效能的关键命题。这就要求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跳出单一技术思维，在算法运行机制中主动嵌入价值校准与价值引领维度，在效果评估中纳入人文关怀指标，推动全媒体真正成为主流价值有效传播的重要载体，使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网络空间的传播效度与认同深度得到充分提升。

三、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对策制定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直接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在校园网络空间的传播效果与主导地位，必须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全媒体传播带来的话语解放与传播变革，既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提出了新挑战，也为其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机遇。高校需主动遵循全媒体传播规律，紧密结合高校青年学生成长发展特点，着力应对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现实挑战。结合全媒体传播的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特征，高校需统筹发力，从全媒体主体赋能、认知整合、深度认同三个核心维度，构建科学系统、切实可行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体系。

在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面临着传播主体泛化、信息来源混杂、人文温度失衡等多重挑战。全程媒体实现了传播的全过程全视角，全员媒体赋予每个个体话语权，全息媒体带来信息呈现的碎片化，全效媒体强化了量化考核导向，这些都深刻影响着主流话语的传播效能。高校作为意识形态交锋的首要场所，必须在全媒体语境中重构话语权建构对策，使主流价值真正走进高校青年精神世界。

（一）夯实话语接受的主体能力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稳固，不仅取决于“谁在说”，更取决于“谁在听”以及“如何听”。为应对主体功能性式微的根本局面，应着力提升高校青年群体自身的主体能力，使他们从信息技术的被动接收者、圈层的盲目追随者，成长为具有辨识能力、批判思维和价值定力的理性参与者，使话语权从外在强制转化为内在认同。

1.构建全媒体环境下的话语主体生成支撑环境

话语权的实现需要以接受者的主体性为前提，应立足全媒体传播时代新语境。主体能力的提升，既需要教育的引导，也需要环境的支撑，高校应重塑对话机制，营造开放包容、理性平和的网络文化氛围，鼓励学生在遵守底线的前提下自由表达、理性讨论。通过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交流平台，为学生提供思想碰撞、价值辨析、共识建构的网络空间。在线上，搭建高校青年思想汇角落等主题论坛平台，利用全媒体的互动性特征，倡导学生在恪守价值底线与行为规范的前提下，以理性开放的态度表达对主流话语的理解与思考。在线下，定期举办“圆桌派”“思想沙龙”等讨论活动，围绕学生关注的热点议题开展理性讨论。

在全媒体开放格局中，当学生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中表达困惑，在对话的氛围中求知，在多元的参照中自主选择答案，那么主体性便不再是盲从，而是经过独立思考后的自觉接受。这种主体性的建构，从源头上抵御了价值畸变与信仰分歧的风险，也在技术迭代、人文关怀和认知认同之间得到稳定且持久的平衡。

2.培育圈层内部的价值引领力量

全媒体时代催生了多元圈层的快速兴起，在圈层化传播与圈层化生存的现实语境下，圈层内部往往真正具备广泛的认同感与强大的影响力。高校应重视对学生意见领袖的发现、培养与支持，通过大数据分析、师生推荐等方式识别各圈层中具有影响力的学生骨干，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系统性的能力训练、适当的资源倾斜等方式，提升意见领袖在圈层内部的理论站位、价值引领能力和辨析能力。意见领袖的圈层文化话语逻辑能够在日常互动中用更为贴近青年群体易懂的语言“转译”主流话语，使主流价值以圈层成员可接受的方式在全媒体网络中传播，并成为连接教育者与普通学生、主流价值与圈层文化的重要桥梁，从而有效提升主流话语的圈层穿透力。同时，应鼓励意见领袖在圈层内发起正向议题，组织有益活动，使圈层不仅成为兴趣交流的空间，更能成为意识形态的价值成长沃土。

（二）统一话语价值认知框架

全媒体时代信息呈现全息化、碎片化特征，学生每天接触海量信息，却难以形成完整认知，针对信息来源混杂引发的认知整合困境，高校需构建帮助学生厘清辨识信息、整合认知的支撑体系，使高校青年在开放的网络格局中能够形成清晰、稳定的价值认知，这是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得以落地生根的关键。

1.建构全媒体环境下话语理解的意义坐标系，系统提升学生的信息辨别能力

面对全媒体带来的碎片化信息环境和认知整合的困境，根本在于提升高校青年学生自身的信息素养。高校需为青年学生提供整合碎片、辨识方向的意义框架，可利用环境优势通过课堂教学、主题班会、校刊校报、校园专题宣讲、开展案例讲座等方式传递具体的知识点，帮助学生掌握识别信息真伪、判断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辨析信息背后立场的方法；更要帮助学生建立理解世界的理论坐标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将看似孤立的信息碎片串联为系统的认知图景。当学生掌握了这套意义框架，便能在混杂的信息中辨别方向，在多元声音中识别主流，在碎片信息中建构整体认知。

2.强化全媒体传播中主流话语的框架植入能力，建立澄清谬误的常态化机制

高校网络话语权的实现需要主流话语能够有效嵌入高校青年的认知结构。高校在全媒体信息传播中，不仅要传递具体内容，更要传递分析问题的框架和方法。一方面，可制作“理论坐标系”系列短视频，将视听化的方式运用于热点分析，呈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另一方面，可在校园新闻报道、新媒体宣传中，有意识地引导高校青年运用所学框架理解事件。当主流话语的分析框架成为高校青年群体认识世界的习惯性思维工具，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便实现了从外部灌输到内化于心的转变，从而在全媒体环境中真正扎根。

针对误解、曲解甚至攻击主流价值的混杂信息，高校需建立常态化的澄清机制。一方面，对于学生所怀疑的网络信息可设立真相求证平台，鼓励学生通过平台进行求证；另一方面，对于学生的模糊认识可定期进行梳理，通过文章或视听语言的方式进行辨析；再一方面，对于境外势力的刻意渗透，能够及时揭露其真实意图和错误实质。通过持续的正本清源，可以帮助高校青年穿透信息迷雾，守住认知底线。

（三）打破主流话语权深度认同壁垒

在全媒体技术的精准触达与传播效果的可测量下，点击率、完播率等量化指标成为重要的衡量标尺，极易造成意识形态传播转向浅层化表达。如何突破浅层局限，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在学生精神世界扎根，意识上深度认同，成为亟待回应的核心命题。

1.确立全媒体时代的话语传播导向

针对全媒体量化指标所带来的浅层化倾向与高校育人规律之间可能存在的结构性矛盾,需重构评价体系,促使量化指标服务于价值认同的深层建构。具体而言,应构建量化指标与隐性效果相融合的双重评价体系,如,量化指标包括点击率、完播率等传播数据,用以评估内容的触及广度;隐性效果包括问卷调查、深度访谈、课堂观察等周期性方式,用以评估学生对主流价值的理解深度与认同程度。两种指标相互印证,才能共同构成对思想政治工作有成效的完整评价体系。另外,日常记录数据也可作为传播参考,可通过焦点小组、学业表现分析等方式系统评估学生价值认同的累积性变化。更为根本的是,需确立育人温度优先于流量数据的价值导向,在内容策划中将能否触及学生精神深处作为重要考量,使意识形态传播真正从浅层表达走向深度认同。

2.打造全媒体时代人本逻辑的话语技术载体

针对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失衡的问题,需要在全媒体技术应用中注入人文温度,使全媒体技术真正服务于人与人之间的精神相遇与价值共鸣。一方面,要强化技术应用中的人本逻辑,算法的设计应着眼于拓宽学生视野,破除认知局限,而非固化认知偏差,强化信息茧房;内容的推送应致力于回应学生困惑,开展价值引导,而非简单迎合偏好,追逐流量效应;平台的运营应聚焦于促进学生交流而非制造信息孤岛。当人本逻辑贯穿数字技术应用全过程,技术便成为温暖人心的载体。另一方面,需构建线上触达与线下深化的融合模式,充分发挥线上与线下的协同效应,用精准推送实现主流价值的广泛触达,这种线上引流、线下扎根的模式,既发挥了技术的传播效能,又弥补了技术的人文缺失。

[参考文献]

[1]米华全.高校网络意识相同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2]徐晓美.新媒体时代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嬗变及重构[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5):163-170.

[3]刘颖洁.媒体融合时代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困境突围理路[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48):48-51.

[4]汪寅,张慧.媒体融合背景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其防范策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2(12):108-113.

[5]陶达.全媒体时代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理性审思[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10):70-71+78.

[6]王大伟,孟宪生.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路径探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165-171.

[7]张劲.新时代高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建设探赜[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22):85-87.

[8]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局.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学习出版社,2020.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0]毛玉西."全媒体时代"多维内涵初探[J].新闻战线,2021(16):59-61.

[11]李明德,张收鹏.主流意识形态全媒体传播的效能与进路[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71-81.

[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15]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责任编辑　陈晓姿)

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价值、内涵及路径*

孙建华　何硕涵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苏州　215006)

[摘　要]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将“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置于教育强国建设“八大体系”之首,这充分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从价值维度看,构建该体系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建设教育强国的现实要求,也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内在要求。从内涵维度看,其核心要义体现为“固本”与“铸魂”的辩证统一、“多元”与“一体”的有机结合、“内化”与“外化”的贯通循环。从路径维度看,构建该体系需强化顶层设计,坚持系统观念;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师资水平;整合各方资源,打破时空场域;运用数字技术,创新育人方法。三维审视相互支撑、有机统一,旨在不断开辟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境界,培养更多听党话、跟党走、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关键词] 教育强国;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固本铸魂;　时代新人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5-0035-0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1]。“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2]235。无疑,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意义十分重大,也是兼具学理性与实践性的系统工程,难以一蹴而就,必须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学校作为育人主阵地,必须把立德树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推动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着力培养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当前,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既要立足当下,系统整合现有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又要面向未来,对整体育人生态和人才培养目标做出长远规划,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才能不断谱写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崭新篇章。

一、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价值意蕴

思想政治教育既是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也是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的重要保障。要真正理解这一体系的价值所在,需要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教育强国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以及时代新人培养面临的新任务等方面加以阐释。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及其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1&ZD009)。

[收稿日期] 2026-05-10

[作者简介] 孙建华,男,江苏盐城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苏州大学基地研究员。

何硕涵,女,河南安阳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应对意识形态风险挑战的战略防御工程

从外部环境看，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应对意识形态风险挑战的战略防御工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3]147，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复杂。一些西方势力借助数字化平台、文化产品等更具隐蔽性的渠道，以更隐蔽、更多样的方式进行价值观渗透，给学生思想观念形成带来潜在影响。“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4]143在此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停留在常规工作层面，而必须上升为具有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体系。所谓系统性，就是要将教育目标、内容、方法、评价等环节统筹起来，形成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所谓前瞻性，就是要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前研判，在问题萌芽阶段就进行有效干预。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正是要将意识形态安全的底线思维转化为育人实践的系统部署。这一体系通过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和塑造力，引导青年学生在多元文化与思潮中明辨是非、坚定立场，不断筑牢思想防线和精神堤坝。构建这一体系，既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以高质量思想政治教育支撑高水平教育安全、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必然选择。

（二）支撑建设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重要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3]230。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教育强国的核心特质，也为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指明了价值坐标。其中思政引领力居于六大特质首位，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正是生成思政引领力的根本载体。这一体系把“固本”与“铸魂”统一起来，为思政引领力的形成提供实践基础。一方面，它通过巩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本”，把民族精神植入学生的文化血脉，使思政引领力有了深厚的历史滋养和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确保思政引领力的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人才竞争力是教育强国的重要标志，“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5]。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引导他们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在小我与大我的统一中实现自身价值。这种引导不是简单说教，而是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丰富的实践活动及日常的潜移默化，逐步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追求。科技支撑力体现教育强国对国家创新发展的驱动作用，其核心在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技支撑力的背后是人的创造力，而人的创造力离不开科学精神与价值信念的引导。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通过对科技人才的精神激励和价值引领，为科技支撑力的持续提升注入不竭动力。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课程育人、实践育人等多种方式，将爱国、奉献、担当等品质转化为学生稳定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追求，引导他们在“两个大局”背景下准确把握时代方位，把报国之志真正落实到科技创新的行动中去。

（三）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本质要求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必须是在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精神状态等方面同新时代要求相符合的。”[6]166这就意味着新时代人才培养不仅要重视知识积累和能力提升，还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价值观塑造和健全人格养成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让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方面，培养时代新人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7]8教育不仅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还承担着文明传承、精神塑造和价值引领的使命。在“固本”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价值理念和人文精神，能够通过理论教学和日常教育

实践转化为学生的精神滋养,从而帮助他们在多元文化激荡中形成稳定的文化辨别力和价值判断力,保持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培养时代新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和品格塑造功能。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学生的认知方式、交往模式及价值形成机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更易受错误思潮的影响,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零散化、局部化、被动式应对上升为系统化、整体化、主动式引导。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正是围绕时代新人培养目标形成的系统性制度安排。它通过理论武装、文化浸润、实践养成和行为规范的协同发力,推动青年学生一步步从知识认知走向情感认同,从价值内化走向行动自觉,最后成长为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核心内涵

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需要从理论上阐明其核心内涵。这一体系并非教育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具有特定价值指向、结构特征与运行机理的复杂系统。在价值方面,体现了“固本”与“铸魂”的辩证统一;在结构方面,表现为“多元”与“一体”的有机结合;在运行方面,体现为“内化”与“外化”的贯通循环。这三个方面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构成对这一体系核心内涵的整体性把握。

(一)“固本”与“铸魂”的辩证统一

“固本”即巩固根本,筑牢根基,涵盖政治、理论与文化三个层面,三个层面层层递进、缺一不可。第一,巩固政治之本,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教育的方向才不会变,培养的人才才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政治本位的稳固,是确保整个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性质不变、立场不移的根本前提。第二,巩固理论之本,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8]12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根基。理论之本为教育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撑,决定了思想引领的方向性与彻底性。第三,巩固文化之本,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9]25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过程,使其成为滋养学生精神成长的源头活水。文化之本赋予思想政治教育以民族底蕴与历史厚度,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精神纽带。“铸魂”即塑造灵魂,坚定信念。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是“铸魂”的核心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3]232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而人的核心在于思想、在于灵魂。“铸魂”就是要用科学理论武装学生头脑,用崇高理想引领学生成长。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铸魂”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是支撑个体面对困难不放弃、遇到诱惑不动摇的深层力量,是精神之“钙”,缺乏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铸魂”的行为准则,也是目标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规定了价值追求的基本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提供了明确的内容框架。价值观的培育不能停留于认知层面,而必须转化为学生的行为习惯和日常实践,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使教育对象将科学的理论、优秀的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固本”与“铸魂”是一个内在统一、互为条件的辩证体。“固本”是基础,为“铸魂”提供政治保障、理论根基和文化滋养,使“铸魂”有所依托;“铸魂”为“固本”注入时代内涵、精神动力和价值方向,使“固本”与时俱进,二者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的整体性要求。没有“固本”,“铸魂”就是空中楼阁;没有“铸

魂”,“固本”就失去了时代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7]5这种契合性,正体现为政治立场、理论根基、文化底蕴与精神塑造之间的相互成就,共同指向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根本目标。

(二)“多元”与“一体”的有机结合

“多元”主要表现为体系构成要素和运行层面的丰富性与差异性。从横向上看,包括理论武装、学科教学、日常教育、管理服务、安全稳定、队伍建设、评估督导七个子系统[10],这些系统相互依存、协同并进,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有机整体。同时各个体系侧重点不同,如理论武装系统侧重于思想引领与价值导向,学科教学系统则聚焦知识传授与价值融入,日常教育系统侧重行为养成与情感熏陶,管理服务系统提供制度保障与环境支持等,这种多元分工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从不同方面作用于学生成长。从纵向上看,这一体系贯穿大中小学各个学段,整体呈现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趋势,如小学阶段以道德启蒙与情感培育为主,中学阶段侧重思想认知与价值判断能力的形成,大学阶段则聚焦使命担当与社会责任感的强化。各个学段相互独立又有机衔接,遵循学生认知发展规律与品德形成阶段性特征,形成层次分明、相互衔接的育人链条。这种纵向结构的差异性确保了教育的针对性,而目标的连贯性则保证了育人过程的整体性。“一体”指体系整体的统一性,是在共同目标引领下形成的有机整体,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构成了体系之所以成为“一体”的逻辑前提。一方面,无论是理论武装还是学科教学,无论是日常教育还是管理服务,它们虽运行方式不同、功能各有侧重,但都指向共同的育人目标;另一方面,无论是小学阶段的启蒙体验、中学阶段的认知深化,还是大学阶段的价值践行,各学段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始终围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根本目标展开,这种一致性也确保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时间上的连贯性。唯有目标统一,才能使分散的“多元”力量同向同行,使体系的运行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

“多元”与“一体”的有机结合,并非二者简单并存,而是在目标统领下实现的辩证统一。“多元”不是分散化、“一体”也不是同质化,而是在尊重差异、发挥优势的基础上实现价值同向和功能协同。体系之所以需要“多元”,是因为育人任务具有高度复杂性,必须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回应学生成长的多样化需求;体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体”,则是因为共同目标为所有分散的力量提供了统一的方向指引。只有“多元”,各要素便可能各自为政、力量分散,难以形成育人合力;只有“一体”,体系则可能僵化单一、缺乏活力,难以适应不同学段、不同学生的发展需要。因此,“多元”与“一体”的有机结合,既是体系结构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协同育人的根本保障。

(三)“内化”与“外化”的贯通循环

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是一个“理论内化”与“行为外化”持续贯通、良性循环的动态过程。其核心不在于知识的简单传递,而在于能否成功引导学生完成从认知到认同再到实践的转化。“内化”即将外在的、系统的思想理论转化为学生个人的价值信仰与精神追求,是发挥“铸魂”功能的关键所在。这一过程强调“有理”与“有情”的结合,呈现“知—情—意—信”的递进规律。“知”是起点,也是基础,通过系统的理论教育如思想政治理论课,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没有“知”,后面的环节就无从谈起。“情”即情感认同,通过人文关怀、榜样示范等,将抽象的道理变得可感可触,让学生在情感上产生共鸣,进而形成价值认同。缺少情感,理论就难以走进学生内心。“意”即意志锤炼,是在价值认同基础上形成的坚定意志品质。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认同就可能动摇。意志锤炼就是在反复的价值冲突中磨砺出来的,它让学生在面对困难时能够坚持正确的选择,在面对错误思潮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信”是内化的完成形

态，即理论认知经过“情”的催化与“意”的锤炼，转化为个体内心稳定的价值信仰。在这一阶段，外在的要求变成了内在的需要，理论不再是灌输的教条，而是自己相信并愿意为之奋斗的真理。只有当外在的理论要求转化为个体内心的价值信仰时，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入脑入心。“外化”即将内化于心的价值信仰，主动、持续、稳定地转化为符合社会期待的日常行为，这是检验“内化”成效、实现“固本”目标的实践环节，这一过程强调“有根”与“有行”的统一。“有根”即实践必须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脱离了这个根基，实践就会失去方向。“有行”即将价值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做到知行合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8外化的最终指向，正是通过具有自觉而非强制、灵活而非盲目、持续而非短暂的知行合一实践，使学生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完成自我塑造。

“内化”和“外化”并非线性的先后关系，而是一个相互渗透、循环上升的过程。“内化”是“外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深刻的“内化”，“外化”就可能沦为被动、偶然甚至虚假的行为；“外化”是“内化”的检验和深化，成功实践带来的价值感与成就感，会进一步强化内在认同，推动形成“内化—外化—再内化”的螺旋式上升。二者的贯通循环本质上就是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实践深化认识，又产生新的认识需求。正是这种循环往复的互动，使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在反复淬炼中逐步提升。“内化”与“外化”缺一不可，只有把学与做、知与行统一起来，让学生在学中做、在做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最终达到“固本铸魂”的育人目标。

三、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实践理路

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涉及价值引领、制度安排、实践探索等多方面。面对教育环境、传播手段和学生成长的深刻变化，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从顶层设计、队伍支撑、资源整合和技术赋能等方面协同推进，真正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坚持系统观念，强化顶层设计

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强化顶层设计，不断增强体系的整体性与协同性。首先，要把党的领导贯穿顶层设计全过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8]10在体系构建中，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政治方向不偏、工作重心不散，把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其次，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筑牢体系的科学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有其特定规律，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必须尊重并自觉运用这些规律，如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等，将规律意识贯穿顶层设计全过程，就是要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来确立育人目标、整合各类资源，避免主观随意和经验主义，使体系构建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效度。再次，要加强体系内部结构的统筹协调，提升运行的整体效能。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是一个由理论武装、学科教学、日常教育等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有机体，这些子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因此要从整体出发，优化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主体之间的结构关系，使它们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形成目标一致、功能互补的有机整体。最后，要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与学校其他教育体系深度融合。通过课程思政建设，将价值引领融入各学科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之中，实现育人目标同向、内容互通、效果互促。同时，加强与教材建设体系的联系，确保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教材编写全过程，使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与学校其他教育体系形成协同发力的共同体，在整体性运行中释放“固本铸魂”的最大效能。

（二）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师资水平

师资队伍是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关键力量，其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固本”的深度与“铸魂”的效度。首先，要推

进师资队伍一体化建设,实现育人力量的时空贯通。师资队伍一体化建设关键在于打破不同学段、不同岗位教师之间的壁垒,形成育人合力。纵向维度上,建立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集体备课机制,使教学内容循序渐进、有效衔接,避免简单重复、断层脱节。横向维度上,统筹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等多元主体,构建“思政课程—课程思政—日常思政”协同育人共同体,使各支队伍在价值引领上同向同行。通过这种协同,打破单一主体的局限,让教育影响更加连贯、更有穿透力。其次,要增强课堂内容趣味性,提升理论教育吸引力。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强烈实践性和现实性的学问”[12],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铸魂”的主渠道。理论只有与实际结合起来才有说服力和趣味性,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立足实践,联系实际,通过贴近学生的话语体系和鲜活生动的案例,将道理讲深讲透讲活。最后,要拓展实践活动的载体,“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2]41。“固本铸魂”不能止于课堂,必须要在实践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可以将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活动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与理论教学形成呼应,同时引导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在解决实际问题中锤炼责任担当,在身体力行中实现从认知到认同、再到践行的转化,达成知行合一。

(三)整合各方资源,打破时空场域

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要遵循协同育人原理与环境渗透原则,通过整合资源和突破时空限制,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立体化格局,这种格局不是简单拼凑,而是让各个育人环节相互支撑、有效贯通。首先,要打破教师、辅导员等育人主体之间的壁垒,构建“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管理服务人员”四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使各类主体从各自为战转向同向同行。同时,系统梳理校内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建立“校内+社会+网络”的共享资源体系,通过校企联动、社区结对、虚拟展馆等方式,将红色场馆、企事业单位等社会资源转化为稳定的育人阵地。其次,拓展空间场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价值引导。一方面,加强思政课实践教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将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纳入必修课程,实现从坐着听讲到走着践行的转化;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校园文化,将红色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景观建设、楼宇命名等,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精神滋养。最后,贯通时间维度,遵循过程育人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贯穿学生成长成才全过程,“破除育人过程‘只管一段渠’‘各自成一体’的现象”[13],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遵循学生认知发展规律,构建从“启蒙”到“深化”再到“践行”的阶梯式育人链条;同时要善用重要时间节点,遵循教育时机规律,在重大纪念日、传统节日等关键时机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四)用好数字技术,创新育人方法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14]378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必须把握时代发展新趋势,立足教育对象新变化,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探索更加有效的育人方法。首先,遵循因材施教原则,运用大数据精准把握不同学生的思想动态,通过学习分析、网络行为追踪、课堂互动记录等方式,建立学生思想动态的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识别学生思想困惑的共性特征与个性差异,在此基础上调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使思想政治教育从经验判断走向数据驱动,从“大水漫灌”走向“精准滴灌”。其次,利用社交媒体,拓宽育人渠道。一方面,思政工作者要利用新媒体平台,占领网络育人阵地,以平等对话姿态融入学生群体,“在网络思想互动的价值引领中,消除人们的思想困惑,澄清错误的价值观念,凝聚人们的思想共识”[15];另一方面,运用网络话语传播方法,将宏大理论转化为学生喜闻乐见的微视频、表情包等内容,实现价值引领的网络化表达。通过线上线下话语体系的融通转换,使思想政治教育从单向灌输转向平等对话,从说教式传播转向浸润式引导。最后,融合虚拟

与现实场景，增强教育沉浸体验。运用 AR、VR 等技术，打造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同时，创新“线上学习+线下实践”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将虚拟场景中的认知体验与现实社会中的实践锻炼有机结合，实现认知、情感、行动的递进转化。

总之，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既关乎当下，也指向长远。这一体系并非简单的经验总结，而是立足于新时代育人实践的系统性回应。它承载着应对意识形态风险、支撑教育强国建设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的多重使命，其价值、内涵与路径三个维度彼此关联、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对该体系的整体性把握。当然，体系的构建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如何在坚持统一要求的同时兼顾不同学校的实际情况，如何让各环节真正实现协同贯通，都还需进一步研究。唯有将体系建设与育人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动态调整中不断完善，才能真正释放其效能。面向未来，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还需在守正中持续创新，在探索中稳步推进。理论的深度与实践的温度相辅相成，二者结合越紧密，体系的生命力就越强。只有让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真正落地生根、发挥实效，才能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持久的动力。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加快建设教育强国[J].求是，2025(11)：4-9.

[2]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5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4]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5]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3(2).

[6]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7]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9]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0]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教思政〔2020〕1 号)[EB/OL].(2020-04-22)[2020-05-15].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5/15/content_5511831.htm.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2]刘建军.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的时代要求[J].教学与研究，2025(2)：41-48.

[13]彭庆红，袁正臣.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J].思想教育研究，2025(3)：22-25.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5]骆郁廷，李恩.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机理[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5)：178-184.

(责任编辑　王遐见)

元宇宙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的基本特征及实践路径*

林　峰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120）

[摘　要]　元宇宙作为当前互联网发展的最新形态，在深刻影响和全面改变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必将继续深入驱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智化转型进程，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的高阶形态和未来图景。元宇宙驱动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具有化身性、具身性和实验性的核心特征，并创设了虚实融生的三维式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心流状态的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及可验证性的模拟式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只有始终坚持以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和灌输为价值前提，以推进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的设计应用为实践方向，并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担当，才能加快推动元宇宙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

[关键词]　元宇宙；　思想政治教育；　数智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5-0042-0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1]元宇宙作为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目标及人类科技文明发展的高阶形态，被业界誉为“第三次互联网革命”。所谓元宇宙，从内涵上来看，主要是指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对自然宇宙进行数字映射，是自然宇宙的数据投影，是各类信息技术综合构建的数字化宇宙[2]，其势必会对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带来深刻影响和全面变革。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提升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社会实践形态，其理论范式、实践方式和学科样式也必将深受元宇宙的赋能和形塑，进而迈向深度数智化转型阶段。而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是指由数字技术驱动、数据要素赋能而引发的系统性创变[3]。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前瞻性布局和建设性探索元宇宙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的独有特征和未来前景，进而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和主导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圈群视域下高校意识形态风险识别及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5BKS13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Z 世代’青年数字意识形态风险生成、识别与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4YJC710042），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5 年度一般项目“数智时代高校思政课有效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K25YG2030269），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数智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精准破解学生疑思的模式建构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53058）。

[收稿日期]　2026-03-25

[作者简介]　林　峰，女，黑龙江绥化人，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一、元宇宙催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

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是数智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并在技术赋能和数智驱动下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范式、实践方式和学科样式发生范式转换和形态变革，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智化能力与科学化水平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既是数智技术跃迁式发展倒逼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结果，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实现科学化与现代化的需要，而且随着数智技术的迭代革新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场景的多维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智化程度和现代化水平也将随之不断跃升。

（一）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的迫切性

“元宇宙”（Metaverse）一词最早出现在1992年美国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所著的小说《雪崩》。斯蒂芬森描绘了“元宇宙”，即一个基于数字技术而生的、与现实世界平行的三维虚拟空间，并且在这个虚拟空间中人们可以通过各自的“数字化身”进行社交、娱乐和消费，并能借助VR穿戴设备与“数字自我”共同生活在虚拟空间。当前，元宇宙是指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数智技术的多元聚合与综合集成基础上建构的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无缝链接、高度互嵌、深度融合的全息数字场景和社会时空结构。元宇宙作为一种互联网形态和数智化场景势必会引发人类社会深刻变革，数智化时代已悄然而至。元宇宙凭借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深刻重塑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环境、感知环境与媒介环境[4]，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结构和体系机制的数智化转型提供技术引擎和场景支撑，同时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实践应用及学科发展提供新模式，并将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迈向更高阶的形态。这就意味着，元宇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就是要以元宇宙驱动思想政治教育外部要素和内部结构实现转型升级与系统变革，即以技术的综合集成、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场景的全身沉浸，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方位、全要素和全过程的技术赋能，进而衍生出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新的教育生态和新的教育范式的过程。

然而，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绝非元宇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物理叠加或简单套用，而是在元宇宙的驱动赋能下，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系统性创变和革命性重塑，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新方向、催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样态，进而创建“精准思政”“滴灌思政”“计算思政”“实验思政”等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和新范式。从本质上看，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既不同于单纯线下的传统思政，也不同于注重线上的网络思政，而是一种连接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连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场景，它既是一种基于技术迭代和情境交互的技术新范式，也是一种基于思维革新和认知变革的育人新模式，是数智技术赋权增能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效果，进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外延和应用场景的过程。

（二）元宇宙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的前提审思

元宇宙作为一种新技术、新思维和新方法，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实践应用及学科发展提供新范式，进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智化转型。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智化转型并不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盘否定和另起炉灶，而是沿用改进和转化升级，是在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发展规律、受教育对象的成长规律及教育的运行规律基础上，借助元宇宙的技术优势用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效能并延展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过程。这就要求在元宇宙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转型和范式转换过程中，必须把握和处理好元宇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次关系、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关系、元宇宙与其他思政的统合关系，这是实现元宇宙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的前提。

其一，元宇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次关系。元宇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目的在于提升教育对象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获

得感,但其终究只能是作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和智能化水平的一种技术手段。因此,在二者融合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并起核心作用的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是说,在元宇宙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过程中,元宇宙只是工具和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才是核心和根本,并且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和灌输,这就决定了元宇宙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始终是立德树人,这是元宇宙融合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前提。尽管如此,仍然有人认为可以通过脑机接口和脑脑接口实现人脑与元宇宙的融合,最终达到以元宇宙代替人脑,甚至提出“缸中之脑”的悖论,其本质上是一种唯技术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虽然借助元宇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现实发展所遇到的诸多问题,但是元宇宙绝非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乌托邦和教育理想国,其只能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映射补充和预测反思,而不能用其完全代替甚至消除思想政治教育。在元宇宙融合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与灌输作为价值前提和根本遵循,将元宇宙作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效能的重要手段和技术依托,进而使其更好地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其二,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关系。元宇宙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是通过数字化映射和数据化模拟的方式将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空间进行真实化还原和仿真化呈现的过程。元宇宙是一个虚实共生、融合共进的体验空间、沉浸场景和交互场域,它不仅可以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真实还原,还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数字摹写,又可以在与现实世界的深度交互中创构新的世界,因而打通了过去、现代和未来,建构了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全息世界。元宇宙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智化转型意味着元宇宙技术将全领域、全方位、全过程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进而实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虚实同步和双向互链,以至于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边界愈发模糊,最终彻底打破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之间的壁垒,并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与边界,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虚实共生。与此同时,受教育对象可以随时切换身份并任意穿梭于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之间,随时随地体验元宇宙中前所未有的感官刺激和光怪陆离的新奇体验。然而元宇宙终究只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技术手段,受教育对象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世界当中面对错综复杂的一系列问题,这就容易引发受教育对象过度沉迷于元宇宙的虚假快乐和精神满足,导致真实自我与虚拟自我之间的矛盾冲突,以至于在回归现实世界中遭到虚实之间的鲜明对比和巨大落差时产生自我否定、人格分裂、道德冷漠等身份危机、认同危机和伦理危机。因此,必须明晰元宇宙背景下虚拟与现实之间是深度融合和彼此支撑的关系,而非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全面替代,而只是在元宇宙中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边界得到了拓展和融合。

其三,元宇宙思政与其他思政的统合关系。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总体上分为传统思政和网络思政两大类型。传统思政是前数字化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主要侧重于理论研究、逻辑反思、经验总结;而网络思政是信息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不同媒介工具和技术手段会催生不同的思政样态,主要体现为大数据思政、人工智能思政、虚拟现实思政等具体样态,主要侧重于数据分析、算法建模、沉浸体验等。两种思政类型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思政范式:传统思政范式侧重于对因果关系的分析,主要采用的是面对面的工作方式,更加凸显其情感关照和人文关怀;而网络思政范式则偏重于对相关关系的分析,主要采用的是大数据分析和算法建模的方式,更加凸显其精准性、个性化和预见性。可见,现有的两种思政范式各有侧重和优势,因此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是相互补充、融合共生的关系。而元宇宙综合集成现有数智技术,是与现实世界高度耦合的数字世界,基于元宇宙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思维和方法方面也会相应产生新的变革并生成新的范式,即元宇宙思政,其既是网络思政衍进发展的未来形态,也是对现有思政

样态特征和实践优势的融合创新。但需要注意的是，元宇宙思政的生成并不会导致对现有两种思政范式的否定和替代，这是因为，人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实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人的心理过程、情感状态和人际关系不可能通过冷冰冰的数字形式进行完整呈现，还必须通过面对面的对话交流才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温度和人文关怀，而且任何一种思政类型都存在自身的运思限度且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单纯依靠其中任何一种类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都不可能取得完美的效果。因此，元宇宙思政与现有思政类型之间并非是以新代旧、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种实践范式的转换，即在现有思政形态基础上的革新升级、沿用改进和相容互补，进而不断用数智技术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的过程。

二、元宇宙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的基本特征

元宇宙系统集成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介导现实、扩展现实、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多方面的新兴数字技术[5]，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的技术主要是数字孪生、数字替身、扩展现实、沉浸交互、脑机接口和脑脑接口，二者的深度融合将打造一个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进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化身性、具身性和实验性的特征。

（一）化身性：虚实融生的三维式思想政治教育场域

数字孪生（DT）和数字替身（Avatar）是元宇宙中的核心技术。借助数字孪生技术，元宇宙能够在虚拟世界中对现实世界每个真实的人和物进行数据化呈现与镜像化还原，并且在虚拟世界中实现对现实世界的实时化反馈和真实化映射。元宇宙场景中的每个真实具身还可以通过数字替身技术创建数字化身，并使其成为人类身体和全部感官的外部延伸，以数字化身为中介在元宇宙中进行人际交往和社会实践，并且可以同时参与到多个社会生活场景中，从而实现虚拟中有现实、现实中有虚拟，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平行共在、无缝衔接、深度融合和高度互嵌，最终建构一个虚实难分、真假难辨的数字孪生的元宇宙。

依托元宇宙的技术赋能，可以建构一个虚实共在、虚实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极大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时空，进而建构了立体化和三维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场域。具体来看：一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中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可以依托数字孪生技术生成数字化身，但是，这种数字化身与数字分身则完全不同，以往的数字分身只是作为受人类主观意志控制的人类肉身的附属品，受技术水平限制仅能与人类进行简单的对话交流，而数字化身作为一种数字主体，其不仅具有身体的外形，还具备身体的功能[6]。这就意味着，借助数字化身可以实现对现实具身的生理、心理、文化和精神存在的全映射化配置，使数字化身可以同时、同步、真实地反映现实具身的情绪变化、学习行为和互动痕迹，并获取现实具身在人际交往和社会实践中自然而然流露的真实数据，实现现实具身与数字化身的数据同步对接和信息实时反馈，进而获得教育对象在知情意信行等各个方面的真实数据。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不仅仅留于对现实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化平移、数字化复刻和数据化摹写，而且还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目的、模式等现实要素融入其逻辑体系进而衍生出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同时，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在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中也可以数字化身的形式进行即时互动和深度交互，并能实现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随时切换与自由穿梭，使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实现联结互通和高度互嵌。

（二）具身性：心流状态的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情境

体感技术、3D 建模、实时渲染、扩展现实（XR）等交互技术是为元宇宙提供沉浸式体验、具身性社交和探索性学习等活动的关键技术。近年来，VR、AR、MR 等已经在各领域和各行业受到广泛重视和普遍应用，然而，限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当下的交互技术只能为用户在视觉和听觉两个感官维度上营造沉浸式体

验,并且由于现实具身与数字化身的共情体验被屏幕所带来的离身性所妨碍,其体验更多只能以“第三人称”视角获得,其拟真度和沉浸度相对较低。而在元宇宙场景中可以借助XR和体感技术使用户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方面实现全知觉沉浸和全感官体验,使用户能够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深度的沉浸体验,并且这种体验不仅限于感官上的冲击,更是一种思想上的触动和精神上的洗礼,进而真正实现了“身临其境”和“感同身受”。

元宇宙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为创设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提供了“身”“心”条件,并使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在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中通过学习和交互产生心流状态。所谓“心流”指的是当人们沉浸在当下着手的某件事情或某个目标时,全神贯注、全情投入并享受其中而体验到的一种精神状态[7]。具体来看:一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中,可以借助动作捕获、眼动追踪、表情识别、心率测速等体感技术,采集和捕捉教育对象的注意力、情绪波动、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非言语数据,实现对教育对象语言数据和非语言数据的全模态分析,进而将人在虚拟情境中的感知空间由物理维度延伸至生理和心理维度,为心流状态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创设提供了“心”可能;另一方面,依托图像传感、感觉反馈、3D建模、图像渲染、XR等交互技术,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由数字信息转化为大脑信号,并通过数字化身的形式实现多维感官投射和多重感知交互,使数字化身与现实具身在知觉方式上达到完全统一,进而实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中再现现实具身,为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更多的真实感和在场感,为心流状态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创设提供了“身”基础。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可以赋予教育对象新的“身心经验”,也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创设一些诸如突发事件、红色记忆、重大事件、直观教学等相关场景,提升教育对象的代入感提供了技术可能。

(三)实验性:可验证性的模拟式思想政治教育样态

脑机接口(BCI)和脑脑接口(BBI)技术使元宇宙的用户能够通过自我意识对数字化身进行控制,并获得数字化身在元宇宙中的感受、认知及体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用户可以在元宇宙中进行自主编辑与想象创构,并即时地将思维设计转化为原创性的具象物,实现“所思即所得”,进而真正实现了虚实共生,这就使得在元宇宙的赋能驱动下可以将一些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开展的情境假设和难以实现的思想实验同步映射到元宇宙中进行模拟、预测和优化,并对其进行结论探究和方案验证,进而极大拓展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元宇宙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中的诸多价值问题情境和道德矛盾困境及时地进行思想实验与研究假设,并为创设可验证性的模拟式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提供了技术可能。所谓可验证性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中能够根据教学情境需要和学习资源需求进行及时的假设验证和方案改进等学习活动。具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实践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显著特征,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必须通过教育对象的行为实践来检测。然而在现有数智技术支撑下所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平台仅能对部分情境进行假设和讨论,并且这些情境也仅限于在教育者提前设定或特定的范围和领域中进行,尤其是对教育对象在特定情境下做出相应行为选择的思想动态和价值判断不能全面分析和充分把握,对依据不同道德判断和价值选择下所产生的不同的行为也无法进行视觉化和对比性的呈现。而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能够基于教学问题设定需要和教育对象情感需求自动生成或自我创设相应的教育情境和学习空间,全生命日志式记录并展现教育对象在教育情境下的思想动态和情感反应,并将教育对象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的转变过程进行动态化建模,同时将在不同教育情境下教育对象所产生的不同行为结果进行对比化呈现,进而加深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的理解和掌握。需要注意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中数据的完备性使得建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基础

上的实验模型的数据集合和使用这个模型的测试集合成为同一个集合，也就是使它们的交叉熵为零，这就在一定意义上使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相重合，进而将各种概率事件全部囊括，为消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各种不确定性事件提供可能[8]。

三、元宇宙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的实践路径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元宇宙是一把双刃剑，既引发问题，又赋能提效[9]。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智化转型应坚持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推动自身传统优势与元宇宙深度融合，在充分发挥元宇宙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正效应中实现数智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一）理念先行：搭建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框架

数智技术的迭代发展倒逼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元宇宙是人类社会通用技术变革的体现，已经嵌入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进行日常交往和社会实践的基础。元宇宙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也必将催动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载体、方法、环境、功能等各个方面进行优化升级，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是基于新技术、新思维和新方法而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应用集群。然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实践还相对缺乏基于元宇宙技术、思维和方法的考量，元宇宙带来的嬗变已经无法用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和方法进行诠释，这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思维、内容、方式、方法、路径等亟待优化和全面变革，借助元宇宙驱动思想政治教育向深度数智化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并迫在眉睫。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加快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工作方式的转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厘清并回答元宇宙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数智化深度转型所需要的理论依据和可能问题，探寻思想政治教育逻辑与元宇宙逻辑之间的契合点，审视元宇宙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在内涵、边界等各个方面发生的变化，探索元宇宙时代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认知图式和行为模式会呈现何种新特征、新规律及新动向，进而研究元宇宙中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新规律、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思维的运思限度及其元宇宙时代个性化彰显与社会主导价值观统合之间的矛盾等新问题，最终推进元宇宙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协商对话，广泛吸收统计学、脑科学、情报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建构计算思想政治教育、实验思想政治教育、科技思想政治教育等新的学科领域和研究方向。

（二）实践方向：推进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发应用

实践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体系[10]。目前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的构建和应用尚处于摸索阶段，相应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都明显滞后于数智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智化背景下教育教学实效性的提升及其数智技术迭代升级速度的加快，都倒逼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速度加快、程度加深。因此，必须加快元宇宙的技术打造并推进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发应用，促进元宇宙的技术优势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优势高度融合，多方合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向深度数智化转型。具体而言，国家层面要加快对元宇宙的统筹规划和政策引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顶层制度设计，推进前沿技术及其应用正向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深度数智化转型提供必要的数字场景和超强的算力支持，另外还应加强相应的法律规范和道德约束，推进科技伦理道德建设，引导元宇宙融合思想政治教育有序发展；企业层面要在坚持科技向善原则基础上加快推进元宇宙的技术研发和综合集成，加快元宇宙的物理层、软件层、数据层、规则层和应用层等五个层面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基座建设，同时建构元宇宙相关数据的采集和使用规范，建立统一的建设标准和评估方案，加快研发与思想政治教育相适配的元宇宙相关技术架构，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智能数据资源库和智慧化教学平台；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者则要及时转变理念、思维和方法，不断提升数智化育人能力和数字素养，理性辩证地看待元宇宙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和作用，防止技术异化和数据迷信现象的发生，同时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目标充分挖掘元宇宙中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能的要素和资源，促进元宇宙与思想政治教育达成借力共赢的局面，使元宇宙应用场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能够发挥激活作用并发挥正向功能，积极打造正能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

（三）价值引领：明确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角色担当

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的深刻变革，而元宇宙的发展也必将催生相应的数字社会和数字文明。但是，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依托元宇宙所构建的虚实融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空间，极易导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打着数字自由和数字民主的旗号进行价值渗透并瓦解价值共识，企图消解我国文化主权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同时也极易导致受教育对象陷入信息茧房并沉迷于元宇宙所建构的数字镜像及其带来的精神快感，进而滋生泛娱乐主义、数字消费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明确自身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过程中的角色担当并提前谋划布局，探测元宇宙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应用的可能性和风险性，深刻认识元宇宙技术本身的限度，为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场景注入主流价值观念，从而在应对新局中赢得主动权和话语权，使元宇宙有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数字空间的引领力和向心力。具体来说，在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背景下，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在元宇宙技术加持下具有相同的权利，二者均可根据自身需要创设相应的学习情境并编辑生产特定内容，使得教育对象不再仅仅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背景下被动的学习者，而是可进行场景塑造和内容生产的主动探索者，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角色也要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和灌输者转变为数智场景的创设者和价值导向的把关人，始终牢牢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教育对象的人文关怀和情感沟通，及时规避因技术异化可能导致的安全问题和伦理问题，促进技术发展与思想引领的有机结合，确保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价值聚焦。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5-29(2).

[2]黄欣荣，曹贤平.元宇宙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机遇[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46-55.

[3]卢岚.从互联网到ChatGPT：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重塑与建构逻辑[J].探索，2023(2)：163-174.

[4]王春霞.元宇宙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机理及实践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5(1)：82-86.

[5]董旖旎.元宇宙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22(7)：91-95.

[6]董扣艳.元宇宙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前景探测、伦理风险及其规避[J].思想理论教育，2022(4)：90-95.

[7]陈欣.心流体验及其研究现状[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150-155.

[8]石磊，张笑然.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场域[J].思想教育研究，2022(3)：36-42.

[9]许名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关系论辩[J].未来与发展，2025(2)：131-135+119.

[10]冯刚，陈倩.解构与重构：元宇宙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其应对[J].探索，2022(3)：166-175+2.

（责任编辑　光　翟）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的三重维度*

王　萌

（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重塑社会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与思维方式，这既为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提供了全新机遇，也带来了意识形态安全、主体性消解等多重挑战。简单的技术应用论或风险恐惧论均难以应对智能时代的教学变革，亟须构建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以回应“人工智能赋能教学何以必然、何以可能、何以向善”的核心命题。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构建“理论-技术-价值”三重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内在必然性、实践可行性与价值规范性。旨在说明，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理论维度奠基、技术维度支撑、价值维度引领的辩证统一体，三者相互支撑，共同构成智能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的完整体系。

[关键词]　人工智能；　高校思政课；　教学质量；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5-0049-08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时代，这一变革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力推进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提升思政课教师信息化能力素养，推动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思政课教学中应用。”[1]，这为推动思政课教学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思政课教学如何利用先进技术提高教学质量、回应时代发展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人工智能技术为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提供了无限可能，与此同时，其技术特性亦易引发诸如意识形态安全、技术伦理等一系列现实困境。而追问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内在逻辑也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思政课教学改革的重要议题。

一、理论维度：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内在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为我们洞察科技本质、引领科技向善提供思想武器。高校思政课承担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青年学生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的任务。其教学对象是深受信息技术影响的“数字原住民”。主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教学质量既是高校思政课守正创新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适应时代变革的必然选择。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课程传授的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学生认知的起点始终是有限的、碎片化的个别经验。传统教学手段在跨越这一鸿

*[基金项目]　南京财经大学校级教改课题“人工智能赋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质量提升研究”（项目编号：XJWC3202533），2023 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设成果。

[收稿日期]　2026-06-12

[作者简介]　王　萌，女，山东淄博人，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沟时，始终面临案例有限、体验间接等难题，而人工智能的出现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可能性。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人工智能赋能提供根本遵循

相较于一般教学技术的应用，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根本遵循，是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的核心特质，也是其获得学理合法性的根本依据。

首先，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是人类认识工具的一次质的飞跃，彰显了技术进步的历史必然性。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工具与人类发展的经典论述高度契合，更呼应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的核心观点要求。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做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2]209人类社会的进步不同于动物的纯粹生物进化，人通过劳动实践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通过各种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实现对自然的改造，以实现“类”的生存与发展，这是建立在动物适应环境基础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进步，本质上是“从体力延伸到脑力延伸”[3]的转变。与此前一切生产工具不同，人工智能的核心价值是延伸人的认知能力。作为新型认识中介，进入教学领域之后，它不仅是呈现理论对象的工具，更能依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普遍联系、矛盾分析的观点，通过对话、追问等形式，帮助学生构建对理论的理解，搭建起个别经验与普遍规律之间的桥梁。这其实就是生产工具进步的历史必然性，是生产工具推动教学发展的内在体现。也是生产工具革新推动教学形态迭代、助力理论传播的内在要求，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认识工具与认知发展的辩证关系原理高度一致，是马克思主义核心观点在教学技术应用中的生动实践。

其次，人工智能为践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落实马克思主义核心观点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载体与实践路径。脱离现实的单纯理论传授只是空洞的说教和教条，而人工智能为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载体。马克思曾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4]11理论被群众掌握的速度、效率、方式、深度等都高度依赖于传播工具，而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可以精准识别学生认知起点，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性能够更充分地转化为说服力。这就让高校思政课的理论传授不再局限于书本与课堂，而是能够对接现实社会的发展实践，让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当代社会的技术变革、现实矛盾相结合。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内在要求，也是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的理论根基。同时，在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内，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根本目的，必须服务于“立德树人”的初心，促进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有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一要求并非外部约束，而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内在体现，进一步夯实了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的理论支撑。

（二）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与核心诉求的学理契合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的必然性，核心体现在其与高校思政课核心诉求的高度契合。高校思政课的核心诉求在内容维度上体现为将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认知对象，在目标维度上体现为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与思维方式。人工智能与高校思政课核心诉求的契合是技术服务与理论传递的内在统一，而非外力强加的技术叠加，也是人工智能能够深度赋能高校思政课，而非单纯“炫技”的核心学理支撑。

人工智能的技术功能与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内容相契合，有助于摆脱传统教学的困境。高校思政课的核心任务是传递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其理论传播具有抽象性向具象化转化的需求，理论的核心概念需通过具象化载体让学生理解，抽象理论需与学生的认知体验、现实思考结合，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而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功能可以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提供场景的模拟、可视化呈现、AI 实时

交互等,这些方式的使用有助于解决高校思政课面临的“理论讲不透”等授课困境。

人工智能的赋能价值与思政课育人目标的契合,也体现了二者在价值取向上的高度同向。高校思政课的核心育人目标是帮助学生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具备运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这一目标的落地,关键在于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深度认同、灵活运用。人工智能赋能的价值在于通过技术手段,为这一育人目标的落地提供学理支撑。AI 的互动式、探究式功能,可引导学生主动追问、自主探索,让学生在思考中理解理论内涵,而非机械记忆,这正是培养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具体应用。同时,人工智能的精准引导、错误辨析功能,可针对学生在理论理解中出现的偏差、认知中的困惑,进行针对性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契合立德树人的核心要求。这种同向性,并非人为赋予的关联,而是人工智能赋能价值与高校思政课育人目标的学理共鸣。

(三)回应时代需求是高校思政课创新的必然选择

从新时代大学生的认知现状和需求来看,作为数字原住民,其思维方式和学习习惯已深受数字环境影响,传统教学方式难以适应其个性化、互动化、场景化的学习需求,而人工智能能够契合青年学生的数字认知习惯,通过场景模拟、个性化推送等方式激发学习主动性,让高校思政课从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化为主动地探索知识,从抽象枯燥的理论转化为生动鲜活的案例。就此而言,这是回应青年学生认知需求的必然选择,是提升高校思政课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关键。

从高校思政课的时代发展需求来看,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核心立场与基本原理,又要回应时代关切、顺应时代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发了生产力跃迁、交往方式变革与社会结构重塑,在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潜能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现实难题和时代之问,带来了诸多哲学追问与价值冲突,这些问题亟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回答。当下诸多现实问题,例如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取代人类劳动、受制于算法是否会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等,都源于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困惑与争论。但从根本上看,这些争论并未超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将人工智能相关的前沿议题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并不是肤浅地用新兴科技元素包装传统理论知识,而是教学模式的深刻转变,以此为切入点能够促使青年学生在抽象知识和现实社会的交融中精准洞悉社会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进而筑牢对高校思政课讲授内容的情感认同与理论信仰。这一转变既是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实践,也是高校思政课推进改革创新的必然要求。

从教育数字化战略需求来看,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教育强国,是新时代教育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随着《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计划》《数字中国建设纲要》等政策的相继出台,教育数字化成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高校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核心课程,其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必须主动顺应这一趋势,主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并通过不断丰富数字化课程资源、建立科学的课程体系、加强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信息化培训等方式加快数字化建设。以期在国家教育强国战略的指引下,通过技术赋能推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迈上新台阶。

二、技术维度: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操作可行性

理论上的必要性最终需要通过可操作的技术手段落实到现实的教学过程。人工智能技术之所以可以助力高校思政课建设就在于它能够真正回应课程的实际需要。这种可行性是建立在对课程实际需求与技术能力的精准匹配之上。具体而言,可以从技术支撑、场景适配和落地实施三个递进维度展开,既明确技术应用的具体路径,也辩证分析技术的局限性,确保技术赋能不脱离教学本质。

（一）人工智能技术成熟是赋能高校思政课的基础支撑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迭代，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智能可视化等核心技术已日趋成熟，为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破解了传统教学中的诸多痛点。

一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运用破解了高校思政课理论传递的抽象化难题。高校思政课理论性强、抽象概念多，人工智能可以精准识别教材中的核心知识点，实现知识点的逻辑关系梳理，将抽象的理论表述转化为通俗化、具象化的语言，从形式上降低了理论传递的难度。同时，可以实现师生间自然语言交互，针对学生提出的理论疑问进行及时回应，结合课程的理论体系给出规范、准确的解析，解决传统教学中答疑不及时、解析不系统的问题。

二是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技术的使用实现了个性化教学的精准落地。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技术的核心价值是实现因材施教，这一技术逻辑与高校思政课兼顾共性教育与个性需求的教学目标高度契合。机器学习算法可通过采集学生的课堂互动数据、作业完成情况、知识点测试结果等，构建学生个人学习画像，精准识别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的薄弱环节。数据挖掘技术可对学习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学生的学习规律、认知特点，为学生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同时为教师提供教学决策支持，辅助教师调整教学节奏、优化教学重点。该技术的核心优势在于无需人工干预即可完成数据采集与分析，且随着学习数据的积累，个性化适配的精准度会持续提升，为高校思政课个性化教学提供稳定的技术支撑。当前，已有研究者开始探索利用大语言模型与知识图谱协同技术，构建结构化的课程知识体系，并基于思维链等技术优化问答准确性，实现教学内容的智能化重构与个性化推送，辅之以大数据驱动的学情分析，进一步提升了技术赋能的精准度。[5]

三是智能可视化与交互技术的应用强化了高校思政课教学体验与参与度。智能可视化技术可将高校思政课中的抽象理论转化为动态图表、三维模型、情境动画等可视化内容，让抽象理论直观可感，帮助学生理解理论的内在逻辑；智能交互技术可构建沉浸式教学场景，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情境推演，打破传统“教师讲授、学生倾听”的单向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在教学过程中，赋能核心在于重构“人机协同”的互动生态，单一讲授模式正让位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研讨”的融合式教学。智能工具不仅用于管理课堂、提升互动效率，更关键的是创设沉浸式、探究式的学习情境，引导学生在与 AI 的互动对话中深化对复杂原理的理解。

（二）场景精准对接是技术赋能的核心路径

技术逻辑与教学场景的精准对接是技术得以落地的前提，人工智能技术并非简单地叠加于教学，而是根据高校思政课的教学环节、教学目标，实现技术功能与教学场景的深度融合，确保技术赋能不脱离教学本质。这种适配逻辑主要体现在课前、课中、课后三个核心教学场景中，形成闭环教学支撑。

其一，在课前准备环节，人工智能辅助优化备课流程。课前准备是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基础，人工智能技术可通过文本检索与生成技术，快速检索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权威文献、现实案例、教学素材，并对素材进行分类、筛选，辅助教师整合教学资源。同时，人工智能可根据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大纲、教学目标，结合学生的学习基础，生成个性化的备课方案、教学流程建议，甚至可自动生成课堂提问、课后作业等教学内容，帮助教师精准把握教学重点、难点，提升备课效率。这种适配逻辑无需改变教师的备课习惯，只需将 AI 作为辅助工具，实现备课流程的技术优化，具备极强的可操作性。

其二，在课堂实施环节，AI 破解传统课堂痛点。课堂实施是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核心环节，AI 技术通过场景化适配，可有效破解传统课堂中理论抽象、互动不足、反馈不及时等痛点。课堂上 AI 可通过智能交互模块实现实时

答疑,学生可通过语音、文字提问,AI 即时给出规范解析,教师可通过 AI 后台查看学生的提问数据,精准掌握学生的认知困惑,及时调整教学节奏;智能可视化技术可同步呈现教学内容的可视化素材,配合教师的讲解,帮助学生快速理解抽象理论。同时,在授课过程中,AI 可以实时采集课堂数据进行分析,为教师提供真实可靠的实时教学反馈,为教师针对性教学提供真实依据。

其三,在课后巩固环节,AI 实现精准持续的辅导。课后巩固是高校思政课教学效果落地的关键,AI 技术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有针对性地推送学习资源,加强薄弱知识点的深入学习,帮助学生查缺补漏。同时 AI 还可以辅助批改作业,减轻教师工作负担。AI 伴学系统可提供全天候的答疑辅导,自适应学习路径规划则试图满足学生的差异化需求[6];此外,借助长期的学习数据跟踪和分析,教师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效果,从而更具针对性地开展课后辅导,形成“课前准备—课堂实施—课后巩固”的闭环教学支撑。

事实上,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的实质就是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现实实践,其核心要义是实现线上智能赋能与线下精准教学的深度衔接,使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广泛参与都得以实现,真正实现教与学的同频共振。人工智能通过“对学生不同模态的思想行为痕迹,包括图像、音频、视频、方位、语义等进行关联,让不同模态建立起映射关系,并以立体动态、直观具象的方式呈现学生的样貌。”[7]这种多模态数据的采集与关联,打破了以往仅靠课堂提问、课后完成作业的局限,AI 可以实时捕捉学生在各个阶段的学习痕迹,并将这些零散的碎片化数据整合关联,构建起全方位的学生画像,直观呈现每个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程度、认知困惑,让教师清晰掌握每个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对学生的学习成效进行深度分析,及时发现学习中的问题和不足,为线下教学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

(三)低门槛是技术落地的现实保障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可直接依托现有成熟的 AI 教育平台、智慧课堂系统实现快速接入,高校思政课教师可直接登录平台,根据教学需求调用相关 AI 功能,无需进行复杂的技术对接与调试。同时,AI 教学工具的操作逻辑贴合教师的教学习惯,无需教师具备专业的编程技术与 AI 知识,便可快速掌握素材检索、个性化推送、作业批改等核心功能的操作方法。例如,在素材检索环节,教师只需输入高校思政课相关关键词就能自动筛选、分类适配的教学课件、动画视频、经典案例、学术文献等素材,无需教师逐一向搜索引擎、资源库检索相关平台提供详细的操作指南与培训服务,帮助教师快速适应 AI 工具的使用,降低技术操作的学习成本。在作业批改环节,AI 可自动完成客观题批改、主观题初步评分与错误标注,教师仅需针对 AI 标注的疑问点、易错点进行二次审核,大幅节省批改时间。

这种相对简单操作方式,确保了不同年龄段、不同技术水平的高校思政课教师都能熟练运用 AI 技术辅助教学,提升技术落地的可操作性。同时,AI 技术维护无需额外组建专业的 AI 技术维护团队。高校的网络中心、信息化建设部门均具备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负责 AI 教学平台的日常维护、故障排查、版本更新等工作,为 AI 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长期落地提供保障。

即便在这种前提下,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当前,部分教师尚未充分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缺乏主动接纳和使用智能工具的思维,导致他们在教学中无法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教学。有的教师习惯于传统教学方式,智能化教学理念薄弱,对于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教学改革和创新缺乏深刻认识与实践探索的动力。因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应着重提高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人工智能教学素养,主动强化教师主动运用人工智能开展教学的思想认识,切实提升智能教学的应用意识。

三、价值维度：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目标指向性与规范性

价值维度是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核心引领，其核心在于明确“赋能为了什么”“如何规范赋能”的问题。也就是要确立明晰的价值目标，确定赋能过程不偏离高校思政课的育人本质，同时建立明确的规范体系，防范技术应用的风险，实现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技术路径的可行性，必须受到价值目标的严格规约，才能确保赋能方向正确、结果向善。

（一）价值目标：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方向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的价值目标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核心是服务于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契合《“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中“守正创新、素养为先、智能向善”的总体思路，将技术赋能与思政育人的本质要求深度融合为双重指向：

一方面，坚守意识形态引领底线，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高校思政课的核心使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弘扬主流价值，而意识形态引领能力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巩固，直接关系到育人方向的正确性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信息传播方式日益多元的今天，各种社会思潮、信息借助数字平台交织碰撞、广泛传播，青年学生的思想观念容易受到冲击，这就使得强化意识形态引领、筑牢思想防线成为高校思政课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要求。

另一方面，促进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培养能够驾驭智能时代、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高校思政课致力于引导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理论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现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的同频共振。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在实践层面的最大优势就是将抽象晦涩的理论以更感性的方式展现给学生，让课堂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借助互动平台，实现因材施教，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理论探讨、案例分析，将书本内容与数字时代的现实问题相结合，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实践能力，让学生在掌握理论的同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智能时代的新问题。这与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中“启蒙科技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与人机协作能力，树立‘技术服务于人’的理念，夯实核心素养”[8]的目标高度契合，最终实现促进学生自由全面发展，为国家培养适应智能时代、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育人价值。

高校思政课的核心使命决定了人工智能赋能不能偏离人的本质，所有技术应用都必须围绕“引导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一目标展开，不能陷入技术至上的误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9]18。这就为人工智能的发展确立了以人为本和向善发展的价值锚点，“它要求技术创新必须嵌入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与法治框架，在发展之初即同步构建治理体系，使技术进步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10]。显然，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必须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将学生的成长成才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技术服务于育人、服务于真理传播，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学习效果，将技术赋能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相结合，让高校思政课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焕发新的活力，培养出更多信仰坚定、能力突出、勇于担当的时代新人。

（二）价值规范：防范风险、坚守育人初心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的价值规范性是实现价值目标的重要保障，核心是明确技术应用的边界、原则和风险防控机制。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要警惕技术异化并坚守教育以人为本的初心。但赋能之路并非坦途，潜藏着多重异化风险。在意识形态层面，可能存在“算法黑箱”承载的隐性价值偏见、“数据殖民”导致的文化主体性侵蚀[11]，以及技术话语对制度、认知、价值等复杂社会历史维度的

遮蔽，从而无形中陷入“去阶级化、去物质化、去历史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困境[12]。在认知与伦理层面，“人工智能幻觉”可能误导学生认知[13]，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导致学生批判性思维与独立思考能力退化[14]。在主体关系层面，因为“人工智能被知性先验构造出来的那种所谓主体性是一种虚假的主体性”[15]，从而有可能导致教学中模糊师生教学相长的主体间性，甚至引发对人与机器主客体关系的哲学混淆。因此，必须通过明确的价值规范，引导人工智能赋能走上正确轨道。

第一，坚持教师主导、技术辅助的核心原则。明确教师的主体地位，防范技术异化，是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的首要规范。人工智能可以模拟场景、传递知识，但是无法替代教师对理论的深度解读和对学生的思想引领，教师的专业判断、人文关怀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因此，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必须坚持教师主导，明确教师在教学目标设定、教学内容选择、价值导向引领、风险防控等方面的主体责任；人工智能仅作为辅助工具，服务于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需求，避免出现“技术主导教学”“教师被技术绑架”的现象。尤其是在运用人工智能答疑、情境模拟等环节，教师需对人工智能的内容进行审核、对价值导向进行把控，及时纠正人工智能可能出现的错误导向，确保教学内容的正确性和严肃性。

第二，建立人工智能教学内容的规范审核机制。人工智能技术在使用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生成的内容与信息源或现实事实不符的“大模型幻觉”[16]，这就使得输出的内容可能会误导使用者。2025 年 1 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5 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连续两年位居短期风险之首，持续对社会凝聚力和治理构成重大威胁，它们侵蚀公众信任并加剧国内外分歧[13]。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科学性，而这些风险在高校思政课的教学过程中被逐渐放大。因此，人工智能赋能过程中，所有涉及马克思主义原理、时代案例、价值引导的内容，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核，确保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符合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意识形态要求，杜绝错误观点、片面解读的出现。例如，AI 对话系统的训练素材、案例库的内容、个性化推送的资源，都需由高校思政课教师团队进行审核、筛选和优化，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规范性；针对“人工智能幻觉”可能带来的认知偏差，动态教学评价不能完全委托给算法，必须坚持教师主导性审阅，将智能反馈作为参考，最终的评价与价值引导由教师掌握，这体现了“人机协同”中“人”的不可替代性。同时，建立动态更新机制，及时补充新的理论成果、时代案例，删除过时、错误的内容，确保人工智能教学内容与高校思政课的教学要求保持一致。

第三，健全技术应用的风险防控机制。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过程中，会采集学生的学习数据、疑问反馈、个人信息等，若缺乏规范管理，可能出现隐私泄漏的问题；同时，AI 算法的偏见可能导致教学内容的不公平推送、价值导向的偏差，影响教学效果。因此，必须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一方面，规范数据采集、存储和使用，明确数据采集的范围和目的，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保护学生的个人隐私，禁止滥用学生数据；另一方面，优化 AI 算法，避免算法偏见，确保教学资源推送的公平性、针对性，同时建立算法审核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算法中的偏差，确保算法服务于教学目标和价值导向。此外，需加强对 AI 技术应用的监管，定期对 AI 教学工具、教学内容进行检查，及时排查风险隐患，确保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和规范性。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的价值逻辑，本质上是技术价值与教育价值的有机统一，既要发挥技术的工具价值，提升教学质量和效率，又要坚守教育的本质价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技术本身没有价值倾向，但技术的应用具有价值导向，AI 赋能高校思政课，必须让技术服务于教育的价值目标，而不是让教育迁就技术的发展。因此，在 AI 赋能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价值引领优先、技术服务为辅”，既要充

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破解传统教学的难题，又要时刻坚守高校思政课的育人本质，明确价值目标、规范技术应用，让 AI 真正成为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助力。同时还需要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的 AI 应用能力和价值引领能力，让教师能够熟练运用 AI 工具的同时能够坚守价值导向，把控教学内容的规范性和严肃性。此外，还需要加强校企合作、理论研究，不断优化 AI 教学工具，完善规范体系，推动 AI 赋能高校思政课的价值目标落地生根，实现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的同频共振。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本质上是对教学方式守正创新的实践。守正是根本前提，无论技术如何迭代，都必须守住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正”、立德树人初心之“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之“正”；创新是实践路径，即在守正的基础上，以人工智能为抓手，大胆探索教学模式与方法的变革，让抽象理论更贴合时代与学生。展望未来，随着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这一实践将向更精准的个性化引导、更具沉浸感的价值塑造等方向持续深化。我们需以守正为魂、以创新为翼，既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与立德树人初心，又持续深化人工智能的教学应用，不断探索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让高校思政课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守正，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筑牢坚实的思想基础。

[参 考 文 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EB/OL].(2019-08-14)[2026-05-08].https://www.gov.c/zhengce/2019-08/14/content_5421252.htm.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徐璐，朱炳元.人工智能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读[J].广西社会科学，2022(11)：84-90.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黄志芳，秦易，曹义志，等.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高校思政课对话式教学模式构建与行动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26(3)：10-20.

[6]张霞.人工智能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路径[J].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117-121.

[7]操菊华.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教学精准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图景[J].思政理论教育导刊，2022(4)：141-147.

[8]中国教育新闻网.畅想与行动：普及全学段人工智能通识教育[EB/OL].(2026-04-15)[2026-05-30]. https://www.163.com/dy/article/KQI50MQA0550CBNY.html.

[9]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10]杜玉中，李效东.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重要论述的生成理路、逻辑体系与战略意义[J].思想教育研究，2026(2)：26-33.

[11]潘冰清.人工智能时代数字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治理体系构建——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理阐释[J].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26(1)：13-22.

[12]张亮.人工智能时代关于“体力劳动”问题的三维审视——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若干论域分析[J].党政研究，2026(2)：23-34.

[13]杨云霞.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幻觉生成及其消弭[J].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5(3)：80-90.

[14]黄怡璇.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和挑战[J].秦智，2023(8)：89-92.

[15]刘华初.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中的四个关键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1)：105-112.

[16]刘泽垣，王鹏江，宋晓斌，等.大语言模型的幻觉问题研究综述[J].软件学报，2025(3)：1152-1185.

(责任编辑　王遐见)

红色工业文化涵育大学生家国情怀：逻辑、困境与进路*

冯灵芝[1] 谢宗旺[2]

（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44；
2.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

[摘 要] 红色工业文化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积淀形成的先进特色文化形态，内含自力更生、爱国奉献、实干攻坚、自主创新等精神内核，是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大学生家国情怀的宝贵思政资源。红色工业文化与家国情怀在历史脉络、价值内核、情感培育、实景载体等四重维度深度融通，已形成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当前，在推进红色工业文化涵育大学生家国情怀的实践中，存在着历史资源挖掘浅表化、育人主体目标偏差化、社会关注度收窄、知行转化不畅等现实困境。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对红色工业文化深挖历史根脉，强化价值铸魂，构建传播矩阵，创新研学模式，将红色工业文化切实融入大学生家国情怀的涵育实践。

[关键词] 红色工业文化； 家国情怀； 内在关联； 现实困境； 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5-0057-09

红色工业文化是红色基因与工业文明深度融合形成的专属先进文化形态，具有独特的思政育人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44。为新征程上以红色文化涵养大学生家国情怀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涵育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红色工业文化在新征程上进一步厚植大学生群体的家国情怀尤为关键，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成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应有之义。

纵观现有学术研究进展，学术界对红色工业文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围绕红色工业文化的概念展开探析。严鹏(2025)[2]等人厘清了红色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内涵边界及内在关联，明确将工业遗产引入思政课堂。其二，聚焦红色工业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进行研究。温永强(2026)[3]认为，在红色工业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时，需要构建“理论+实践”的立体化融入机制，但并未针对性解决大学生家国情怀的涵养问题。总体而言，现有研究虽对红色工业文化的理论内涵与育人路径开展了一定探索，但对于红色工业文化涵养大学生家国情怀的深层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对策仍有待进一步深化挖掘。立足新时代育人使命，精准剖析红色工业文化涵养大学生家国情怀的现实困境，有

*[基金项目] 2020年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步融入’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JDSZK060)。

[收稿日期] 2026-04-16

[作者简介] 冯灵芝，女，江苏徐州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谢宗旺，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助理工程师。

针对性地提出实践路径，既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对培养时代新人提出的殷切期望，也是赓续大学生家国情怀的必要之举。

一、红色工业文化的核心要义与育人特质

恩格斯指出，“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4]251。探讨红色工业文化涵育大学生家国情怀，首要前提是清晰界定红色工业文化的核心要义，阐述红色工业文化具有的生成逻辑，凝练红色工业文化的育人特质，为构建红色工业文化涵养大学生家国情怀的逻辑结构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

（一）红色工业文化的核心要义

红色工业文化兼具红色文化的精神底色与工业文化的实践底蕴，并非红色文化和工业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二者深度融合、有机共生形成的特色文化形态。对其概念加以界定，红色工业文化特指党领导人民群众，围绕军工应急攻坚、工业全域布局、产业迭代升级、重大工程落地、关键科技攻关等工业化建设实践，集体创造、代代积淀、接力传承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体。从这一内涵阐述出发，红色工业文化在百年征程中形成的精神内核可以概括为自力更生、爱国奉献、实干攻坚、自主创新，构成区别于一般红色文化、传统工业文化的独特精神标识，奠定独特育人价值的核心根基。

红色工业文化的精神内核源于红色工业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具有鲜明的历史底蕴和现实意义。其一，自力更生的立国底色。我国工业发展起步晚、基础薄弱。一代代工业建设者自力更生、攻坚克难，从一穷二白逐步构建起独立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依靠自身的发展实现突破，逐步成就新时代中国工业的繁荣发展，这种独立自主、逆势突围的特质是红色工业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最鲜明标识。其二，爱国奉献的价值内核。爱国是红色工业文化的底色，工业文化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均展现了对国家的热爱，这也成为红色工业文化持之以恒的特质。我国工业建设与发展始终锚定强国兴国、民族复兴的核心目标。从战火年代的实业救国、军工护国，到和平时期的工业强国、制造强国，中国工业建设的初心使命始终紧扣国家发展需求、民族复兴大局，彰显出为国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追求，这是红色工业文化绵延传承的核心灵魂。其三，实干攻坚的实践品格。工业建设是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实践性事业，实干笃行、攻坚克难是红色工业发展的鲜明特质。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5]284。纵观我国百年工业发展历程，所有工业成就的取得，都源于一代代建设者脚踏实地的奋斗、迎难而上的攻坚，彰显出实干兴邦的鲜明实践品格。其四，自主创新的时代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决定性因素。”[6]481红色工业文化是伴随工业化不断升级而迭代更新的文化形态。面对科技创新的“卡脖子”难题，关键技术需要依靠自主创新，铸就强国建设的大国重器，推动红色工业文化持续焕发生机活力。总的来说，红色工业文化的核心要义与精神特质促进思想共识的凝聚，成为涵养大学生家国情怀的独特精神动力和精神标识。

（二）红色工业文化的生成逻辑

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有其自身的生成逻辑，符合其自身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在明晰红色工业文化的核心要义之后，人们不禁会发出诘问：红色工业文化具有怎样的理论发展脉络？回答好这个问题，需要从理论自身的发展脉络出发，探讨红色工业文化的生成逻辑，这也是明确红色工业文化育人特质的前置条件，能够进一步把握红色工业文化的核心要义与育人特质。

红色工业文化的生成逻辑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建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发展和中国工业发展的现实观照之上。首先，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工业发展的重要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剖析是确立唯物史观的重要来源，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

书”[7]192,从而将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紧密结合。马克思所倡导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理论,让无产阶级所具有的“红色基因”进一步彰显,成为红色工业文化的理论根基。其次,集中反映中国工业发展的现实观照。洋务运动让中国近代工业实现艰难起步,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逐步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不断突破“瓶颈”难题,逐步形成红色工业文化。再次,立于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论述。这是红色工业文化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时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8]明确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不断深化对“新质生产力”概念的认识,为红色工业文化提供了新的理论内涵与契机,成为新征程上发展红色工业文化的当代理论遵循。

(三)红色工业文化的育人特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塑造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新时代大学生家国情怀的重大责任。红色工业文化承载的历史脉络、文化特质以及家国情怀为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红色工业文化之所以具有鲜明的育人特质,其原因就在于红色工业文化源于中国工业发展和中国革命的恢宏历程,蕴含着红色文化与工业文化交融共生的家国情怀。在涵养大学生家国情怀过程中,红色工业文化展现出的历史性、导向性、情感性和实践性等鲜明的育人特质,建构成红色工业文化涵养大学生家国情怀的深层逻辑。

红色工业文化具有四个方面的育人特质。一是深厚的历史性。红色工业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工业发展进程中孕育形成的特色文化形态,具备厚重的历史积淀。因此,把握红色工业文化的育人价值,应当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纵向贯穿党领导工人运动的起步阶段、工业化建设的探索阶段、产业升级的发展阶段,直至当前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时期,这一历史进程始终与国家发展、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天然蕴含着与家国情怀高度契合的历史逻辑。二是突出的导向性。红色工业文化在百年积淀中凝练的工业报国、实业兴邦的价值追求,具有清晰的育人目标与价值导向。这种扎根家国、矢志报国的精神内核,与当代大学生青春报国、挺膺担当的价值导向同频共振,能够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校准人生奋斗方向提供有力引领。三是真挚的情感性。文化是情感与精神的具象表达,饱含人间温度。红色工业文化承载着一代代工业建设者为国攻坚、无私奉献的赤诚初心与家国热忱,蕴含着真挚的爱国情感。这种深沉的爱国情感能够与当代大学生的青春热忱形成双向共鸣、深度互嵌,推动工业精神与家国情怀内化于心、浸润心田。四是鲜明的实践性。红色工业文化源于实践、行于实践,能够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促进知行合一。将红色工业文化蕴含的家国情怀传递给新时代大学生群体,能够引导他们在实践中感悟红色工业文化的精神内涵,真正将深厚的家国情怀转化为自己的思想认知与行动自觉。

二、红色工业文化与大学生家国情怀的内在关联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现实社会的事物之间是存在普遍联系的。列宁指出的“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9]364,为认识和解读现实事物的内在逻辑提供了科学方法论。红色工业文化承载的历史使命与当代大学生家国情怀之间高度契合,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集中体现在历史底蕴同源、目标导向同频、情感关联相通、载体路径相融。系统阐释红色工业文化与大学生家国情怀的内在耦合关联,能够为进一步优化涵育大学生家国情怀的实践路径筑牢厚实的理论根基。

(一)历史同源:百年工业征程与民族复兴同根共生

中国百年工业化发展进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同根同源、深度交织。中国近代工业发轫于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彼时“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直接诉求,希冀通过工业发展带动民族复兴,寄托着实业图强、工业救国的朴素理想。近代民族工业的

艰难崛起，不断提振着中国人的民族自信。1934年，中国民族化工先驱范旭东在南京卸甲甸创办永利铔厂，生产出我国第一袋化肥。南京沦陷后，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范旭东坚守民族气节，宁肯停厂毁业也不依附外敌，这一爱国壮举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赞赏。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毛泽东同志对工业发展提出新的要求，“要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需要工业化”[10]516。中国自此逐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不断突破尖端前沿技术，以工业自立自强为民族复兴筑牢坚实根基、注入强大信心。

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早在建党初期就已然擘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1]1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28年武装斗争建立新中国，又在70多年的革命、建设、改革中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进程中，红色工业文化成为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的鲜明表达，承载着民族工业从受制于人到自主自强的集体记忆，是涵育大学生家国情怀的宝贵资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时代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实质上是推进民族复兴宏大使命在青年群体的具象表达，从个体赤诚家国情怀切入，尽显振兴中华的胸襟担当，唤醒青年家国一体的思想认知，厚植民族归属感与“强国有我”使命感，让抽象的家国情怀转化为真实可触、深入人心的精神力量。

（二）目标契合：实业报国与青春报国同向同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总是把历史责任赋予青年。”[12]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需要一代代中国青年挺膺担当、积极作为。这一庄严使命与红色工业文化中的实业救国、兴国、强国一脉相承的价值主线同向同频。大学生家国情怀核心要义在于以小我融入大我、青春奉献祖国，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前途紧密融合，二者本源契合、立场统一、育人同向，是历史实践与时代使命的深度耦合，形成实业报国与青春报国的双向联动。

红色工业文化蕴含着实业报国的崇高目标。红色工业文化展现了中国工业发展助力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阶段的精神面貌，工业救国、工业报国、工业强国是前后承接、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13]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艰难求索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转型升级，中国工业实现了从弱小落后到体系完备的历史性跨越。现如今，中国已经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印证了红色工业践行实业报国的初心志向。以实业报国作为精神内核的红色工业文化，在新征程上成为激励时代青年涵育家国情怀，志在青春报国的精神密码。

大学生家国情怀包含青春报国时代使命。红色工业文化成为连接历史发展与青春行动的精神枢纽，习近平总书记曾寄语当代青年：“在激扬青春、开拓人生、奉献社会的进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14]176大学生的青春理想与红色工业文化深度交融。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学子发起五四运动，用热血行动捍卫民族尊严，成为中国青年展现家国情怀的光辉典范。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学子走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强国建设凝聚青春力量。新时代虽无硝烟战火，但家国情怀仍未褪色。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仍有许多棘手难题等待青年一代去攻坚突破，续写家国情怀的新篇章。同时，探究红色工业文化发展的过程，也是实业报国与青春报国浸润成长的过程。

（三）情感互嵌：工业文化与家国情怀相融相生

情感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彰显主体对客观事物或现实社会产生的态度体验，归结为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判断。马克思指出：“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5]270红色工业文化与家国情怀之间历史同源、目标契合，决定了二者之间形成

了情感互嵌的逻辑关系，二者相互滋养、共生赋能，推动工业文化与家国情怀之间相融相生。

红色工业文化蕴含着家国情怀的厚重意蕴。红色工业文化拥有实业报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攻坚克难精神内核，家国情怀蕴含着赤诚报国、勇担使命、甘于奉献价值特质，二者精神契合、同向共振。近代以来，我国实业救国、建厂兴业、攻坚克难的工业发展历程，镌刻着一代代建设者心系民族命运、守护国家发展的炽热初心，沉淀为厚重深沉的家国情怀，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鲜活且生动的育人资源。这份扎根工业实践孕育出的爱国热忱、责任担当与奉献精神，具象为诠释家国情怀的精神内核。红色工业文化将抽象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知的历史事迹、精神品质，引导青年体悟个人命运与国家工业发展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结，在文化浸润中厚植爱国情感，树立建功立业、实干兴邦的价值追求。

家国情怀为红色工业文化赓续提供精神动力。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红色工业文化之中，是其永续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立足唯物史观，国家发展与工业建设深度耦合、彼此成就，一代代建设者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为己任，扎根一线、矢志攻坚。深厚的家国情怀凝聚起艰苦奋斗、自立自强的精神力量，推动着我国工业在艰苦探索中突破技术瓶颈、夯实产业根基，指引工业建设始终朝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目标前行，持续为红色工业文化赓续发展注入不竭内生动力。新中国工业战线涌现的先进榜样，鞍钢“高炉卫士”孟泰爱厂如家，誓与高炉共存亡；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立志甩掉贫油帽子，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他们的英雄壮举，能够引导青年把朴素爱国情感转化为热爱专业、扎根实业的坚定行动，实现情感认同到行为践行的跃升。

（四）载体浸润：实景思政与青春成长情理共生

在红色工业文化涵养大学生家国情怀的进程中，实践载体也在随着情感浸润的深化不断发展。“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16]，为高校创新思政育人形式提供了重要导向。实景思政的探索实践让红色工业文化从社会走进校园，让当代大学生能够在成长成才中感受红色工业文化的价值意蕴与滚烫温度。“大思政课”的实践形式让实景思政从理论走向现实，不同于一般的思政课教学，“大思政课”在育人格局、内容供给、表达形式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通过大国工匠与新时代青年的面对面交流，以及红色工业文化的多元表达等形式，将红色工业文化传递给新时代大学生群体，让大学生在文化浸润中感受家国情怀的厚重与担当。同时，“大思政课”还能够深度盘活红色工业遗址、智能工厂、工匠楷模、工程地标等全域实景载体。这类载体沉浸式强、共情度高，是提升“大思政课”建设成效的关键场域。依托实景载体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能够打破传统思政课枯燥的理论说教，让大学生能够沉浸式感悟我国工业化的百年发展历程，在情理交融中厚植家国初心，润物无声地涵养报国情怀，坚定工业报国的职业理想。

三、红色工业文化涵育大学生家国情怀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红色工业文化涵育大学生家国情怀工作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学理支撑日趋完善，实践转化不断夯实，使其在高校思政育人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创新前景。但与此同时，在红色工业文化涵育大学生家国情怀的实践中仍存在诸如历史挖掘、目标指向、社会关注与实践载体等方面的现实困境。上述问题相互交织、彼此制约，形成了制约育人实效提升的现实壁垒。系统剖析上述困境，是精准破解育人难题、切实提高育人成效的重要前提。

（一）历史资源挖掘浅表化：精神特质凝练不足

历史资源是红色工业文化传承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涵育大学生家国情怀的重要基础资源。当前，红色工业历史资源的开发利用仍存在明显短板，集中表现为历史资源整体研究深度不足、史料整理系统性不强等问题，成为红色工业文化涵育大学生家国情怀的痛点所在。

一方面，历史资源的整体化凝练较为薄弱。我国红色工业文化历经百年发展，存续时间跨度大、地域覆盖范围广，积淀了体量丰厚、类型丰富的红色工业历史资源，但同时也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的分布特征，亟须进行系统性归集、整体性提炼。理工类高校具有红色工业文化资源优势，应该在红色工业文化研究以及涵养大学生家国情怀方面产出丰硕成果。但多数高校仅简单罗列属地工业遗存、梳理发展史实，缺乏系统性普查、史料归集与深度调研。同时，普遍存在重物质遗址管护、轻精神价值深挖的问题，对地域专属红色工业精神凝练不足，未能形成具有原创性、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难以充分释放红色工业文化的育人价值。

另一方面，历史资料的整理缺乏系统性梳理。当前红色工业史料，例如工厂档案、老物件、口述史料、建设文献等资源分散留存于企业、地方档案馆、民间收藏者手中。资源留存主体多元、分布零散，难以集中归纳整理，形成完整统一的红色工业资源名录。相较于传统红色革命史料的规范化整理，红色工业史料涵盖生产建设、技术革新、文化新业态建设等多元内容，门类繁杂且专业性强，对整理研究工作的系统性要求更高。但现有整理工作多为零散补救式开展，缺乏长期、全局的统筹规划。同时，各地普遍存在“重保护、轻研究”问题，在保存工业遗址的同时，忽视对遗址背后蕴藏的红色工业精神的阐释。这种理论阐释的缺失割裂了红色工业文化的历史完整性，导致文化研究、教育传播、文旅活化缺乏完整的史料支撑，限制了红色工业文化的系统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制约了红色工业文化对大学生家国情怀的涵育功能的充分发挥。

（二）大学生个体与社会群体目标有偏差：价值取向存在分歧

工业报国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宏观目标，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则是个体主体性的外在表现。西方哲学对主体性的探讨呈现出从个体主体向类主体逐渐延伸的态势。大学生群体作为社会集体的组成部分，既具有个体主体的自由性，也具有集体主体的公共性，个体主体与类主体的目标并非具有完全意义的同一性，二者之间存在的目标偏差也成为红色工业文化涵育大学生家国情怀的困境之一。

大学生主体目标蕴含着实现个体抱负的指向。新时代大学生普遍怀揣实现自我价值、成就个人抱负的成长诉求，这种追求与红色工业文化蕴含的实业报国、实干兴邦的内核本可深度契合，实现个人理想与家国情怀的双向滋养。但在社会思潮多元交织、价值观念纷繁复杂、理想追求日趋功利化的时代背景下，部分大学生治学浮躁、择业功利，重享乐、轻担当，这种个体本位的发展诉求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集体目标产生错位。因此，只有正视大学生个体主体的目标指向，才能够弥合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价值错位，畅通个人理想与家国使命的连接通道，推动二者协同共生、协同发展。

社会群体目标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整体导向。社会发展进步催生人的思想观念的多元化，个体主体目标的多元化会导致与社会集体目标存在一定的偏差。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青年追求“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14]175，为大学生群体实现青春报国指明了根本方向。社会群体目标立足集体利益，着眼国家长远发展与民族整体福祉，具有突出的公共性与方向性。而大学生个体目标更多承载个人成长诉求、兴趣爱好与现实考量，带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二者之间在价值定位、利益诉求上存在差异，制约着红色工业文化对大学生家国情怀的涵育成效，成为红色工业文化涵育大学生家国情怀的困境之一。

（三）社会各界关注度收窄：缺乏广泛的价值共识

红色工业文化作为红色文化与工业文化深度交融、有机共生的特色文化形态，既承载着红色基因、革命精神与初心使命，又凝结着我国工业化建设历程中的奋斗历史、工匠精神与产业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具历史底蕴与时代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 年，《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62.3% 的调查对象表示不太了解工业遗

产,12.8%的调查对象表示完全不了解;只有约25%有基本了解,75%为不了解、完全不了解。[17]由此可见,当前红色工业文化的社会普及度、大众知晓度和舆论关注度仍整体偏低,社会层面的价值挖掘、宣传推广与传承力度明显不足,大众对其历史内涵、精神内核与现实意义的认知较为薄弱,整体社会关注度亟待进一步提升与强化,由此造成情感层面的主体疏离与价值共鸣弱化,成为制约红色工业文化传播的痛点之一。

从受众结构来看,红色工业文化的传播圈层较狭窄,普遍以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老一辈建设者和工程亲历者为主。受众群体的局限性导致社会层面对红色工业文化的关注度受限。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工业文化与社会发展存在天然的距离感。工业文化侧重机器生产、效率至上、理性规则与产业逻辑,具有较强的专业化、技术化、制度化特质;而社会大众扎根市井生活、人情伦理、传统习俗与大众生活节奏。工业文化强调标准化、功利化,社会生活注重生活化、情感化,二者价值取向、行为逻辑、审美方式差异明显。加之工业领域圈层相对封闭、文化传播下沉不足,大众缺乏参与感知,拉大了工业文化与大众生活的认知距离。其二,工业文化整体偏向理性化、工具化。技术规则色彩较强,人文温情叙事相对欠缺,大众对工业文化缺乏亲近感与认同感,很难产生精神触动与情感共鸣,工业精神、工业美学难以融入日常生活与大众精神世界,工业文化偏理性、冰冷的技术与规则属性,缺少人文温情,加之内容专业晦涩、传播形式生硬,远离大众生活场景。在传统人文思想长期浸润的社会语境下,红色工业文化缺少通俗化的情感叙事与大众易于接受的文化表达,难以触动大众内心。总体而言,受众圈层固化、传播壁垒明显,红色工业文化的社会关注度较低,难以在社会层面获得广泛关注。

(四)实践转化形式单一:外显于行存在堵点

红色工业文化涵养大学生家国情怀的实践进路本应朝着多元化、立体化方向拓展,兼顾育人广度与深度,但现实中仍然明显存在短板。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多采用专题实践与课堂教学的方式,但两种实践形式较为单一,二者之间缺乏有效衔接,造成大学生家国情怀培育过程中知行转化不畅的现实困境。具体来看,在专题实践中,高校思政课教学多采用分组作业的形式,让学生自主选题开展实践调研。学生在调研过程中,普遍停留在打卡式研学、浅层次参观体验的层面,沉浸式感悟的广度、深度历练不足,长效化志愿服务机制缺失。学生多是获得短暂的情感触动,家国情怀的体悟较为表面化、瞬时化,难以形成持久、深刻的价值认同,难以将爱国情感有效转化为实干报国的自觉行动。在课堂教学中,高校思政课教学育人话语偏向宏大叙事与理论宣贯,而非贴合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也难以回应不同专业学生的学业困惑。课堂多以单向理论灌输为主,情景化、互动式育人场景供给不足,脱离青年择业焦虑、专业迷茫等现实诉求,育人精准度不高、吸引力不足,家国情怀涵育实效不佳。课堂话语模式固化、育人形式单一,进一步加剧了红色工业文化理论认知与实践行动的割裂,成为阻碍思政课堂与社会实践有效联动的一大难题。

四、红色工业文化涵育大学生家国情怀的实践路径

在红色工业文化涵育大学生家国情怀的进程中,既要在理论层面厘清二者的内在逻辑、剖析现实困境,更要优化育人路径,促进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一再倡导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原则。在实践路径上,红色工业文化应在历史性、导向性、情感性和实践性等四个方面切实提升涵养大学生家国情怀的育人实效,形成多维涵养大学生家国情怀的实践探索。

(一)深耕历史根脉:夯实红色工业文化理论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18]211涵育大学生的家国情怀,首要前提是深耕红色工业历史文脉、挖掘红色

工业精神内核，以厚重的历史资源筑牢育人根基。针对历史资源挖掘浅表化、碎片化的现实，不仅需要深度挖掘本土红色工业史料，系统梳理本土工业遗存、革命建设史实、劳模事迹与工业建设往事，盘活尘封历史素材，丰富红色工业文化资源库，夯实文化根基，又需要加强史料数字化整理保护，推进红色工业史料、旧址、文献、影像全面数字化归档存储，搭建线上传播平台与数据库，筑牢长效传承载体，保障红色工业文化永续保存、长效传播，还需要赋予红色工业文化的时代内涵，紧扣新时代发展需求，融入主流价值理念，创新红色工业文化表达形式，让红色工业精神与时俱进、薪火相传。

（二）强化价值引领：筑牢青年家国情怀培育方向

红色工业文化以先辈实业坚守为价值范本，以实干报国为精神内核，具备强大的家国情怀感召力，能够有效校正大学生价值偏差，引导青年对标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要求。针对个体理想与社会集体理想存在错位问题，需要结合时代发展背景，赋予家国情怀以新的时代内涵，鼓励青年把个人学业成长、职业发展与强国建设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家国情怀对大学生青春报国的价值引领作用。

一方面，系统总结红色工业文化精神谱系。立足我国工业化百年发展脉络，系统梳理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业发展历程、典型事迹与精神特质，提炼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精益求精等核心精神要义。红色工业文化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工业领域的具体延伸，它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时期孕育形成，集中体现为大庆精神、“三线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等精神集群，为红色工业文化传承发展提供精神滋养。另一方面，深刻阐释红色工业文化的家国意蕴。聚焦红色工业承载的初心使命，阐释工业发展背后产业报国、实业兴邦、科技自强的价值追求。深挖一代代工业建设者扎根一线、为国攻坚、无私奉献的家国担当，阐释红色工业文化蕴含的爱国情怀、民族精神与理想信念，充分彰显其深厚的人文底蕴与鲜明的家国底色，引导青年在价值认同中厚植报国初心。

（三）构建传播矩阵：扩大红色工业文化社会认同

红色工业文化镌刻着党领导人民工业化建设的奋斗历程，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担当，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宝贵的精神财富，提升红色文化社会感知度，是激活红色文化生命力、发挥其社会育人与精神赋能价值的重要举措。当前部分红色文化存在传播圈层小众化、大众认知表层化等现象，社会大众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对其精神内核的理解不够深入。通过多维传播破局，能够打破红色文化的传播壁垒，让厚重的红色历史、革命精神与报国使命走出史料与场馆，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实现红色工业精神从被动灌输转为主动感悟，不断凝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青年理想信念教育以及民族精神传承夯实思想根基，让红色文化在当代社会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与时代活力。

拓展多元实践路径，全面提升红色工业文化的社会影响力。首先，深耕特色资源，强化精准宣传推广。立足本土红色工业资源，讲好红色工业历史故事、典型人物与文化遗存，开展常态化、大众化宣传活动，持续提升红色工业文化的知名度、认同感与传播覆盖面。其次，整合传播渠道，构建立体传播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传播体系，统筹线下展馆研学、文旅融合、专题宣讲与线上新媒体传播，搭配小红书、短视频、公众号、线上展馆等数字化平台，打通文化传播壁垒，扩大红色工业文化辐射范围，增强文化传播影响力。最后，打造专属文化 IP，赋能品牌价值提升。依托本地红色工业独有资源，凝练文化标识、塑造特色文化品牌，整合工业遗存、历史典故、匠心人物等核心要素，打造具有地域辨识度、代表性的红色工业文化 IP，推动文化资源向品牌优势转化，提升红色工业文化软实力与社会影响力。

（四）创新育人模式：提升红色工业文化研学实效

育人模式创新是高校对教学方式、方法、载体、路径的有机集成。高校思政课既要夯实理论阐释深度、拓宽育人广度，也要积极推动教学模式创新，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有效衔接。拓展红色工业文化的实践模式创新，打通红色工业文化知行转化衔接不畅的堵点，推动思政教学与社会实践融合发展，为红色工业文化赋能青年成长注入新活力。

应当深化课程思政融合建设，构建一体化教学体系。立足红色工业文化资源禀赋，将工业发展史、劳模工匠事迹等内容系统融入思政课堂、专业课程以及通识教育体系，搭建大资源、大师资、大课堂的三位一体实践框架。优化课程教学设计，开发专题教学课件、校本课程与教学案例库，打通理论教学与精神浸润的双向通道，实现红色工业文化常态化、系统化融入高校育人环节。进而搭建校企协同实践平台，拓宽社会实践育人路径。依托地方工业遗址、红色展馆、老牌工矿企业等红色工业资源，共建校外思政实践教学基地。常态化组织学生开展实地调研、遗址研学、劳模访谈、史料整理等实践活动，推动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现场，在实景体验中感悟工业精神，打通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的衔接壁垒，强化沉浸式育人成效。还要创新校园实践活动载体，丰富文化育人实践模式。结合高校学生特点，打造多元化红色工业文化校园实践活动。通过开展红色工业文创设计、主题宣讲、情景剧展演、调研竞赛、数字文创等活动，鼓励学生以数字化、创意化方式解读红色工业文化。依托学生社团、志愿服务团队开展文化传播实践，持续创新实践育人载体，提升红色工业文化在青年群体中的渗透力与感染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严鹏，孙星，邵彦涛.红色文化与工业遗产：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工业文化［J］.东方学刊，2025（1）：39-49+124.

［3］温永强.红色工业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创新路径［N］.中国工业报，2026-04-20（1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23-09-09（1）.

［9］列宁.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1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1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2-05-11（2）.

［13］习近平：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脚踏实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N］.人民日报，2013-07-24（1）.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6］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支撑作用 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生动局面［N］.人民日报，2025-03-07（1）.

［17］《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擦亮工业文明的“遗珠”——对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现状的调查与思考［N］.光明日报，2024-05-09（7）.

［18］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书信选集：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责任编辑　王遐见）

霍懋征教育家精神:源起、构成及启示*

魏 宏 聚

(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河南新乡　453007)

[摘　要]　霍懋征教育家精神源起于在教育改革变迁中凝练的基础教育理念,发轫于语文学科教学中的教学思想,养成于 20 世纪其他教育家精神的熏陶引领。霍懋征教育家精神的构成特质可概括为四点:第一,心有大爱,躬耕教坛;第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第三,反思教学,凝练智慧;第四,言为士则,行为世范。霍懋征教育家精神启示现代教育家及教师发展应推崇“尊德性”与“道问学”统一的教育实践,建构“研究型”与“实践型”融合的教师身份,提炼“主张性”与“理论性”结合的教学智慧,塑造“自我养成”与“持续更新”的教育理念自觉。

[关键词]　霍懋征;教育家精神;基础教育;教育理念

[中图分类号]　G4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5-0066-07

霍懋征先生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著名的教育家,是新中国首批特级教师,也是语文教学名师。霍老的一生完美诠释了何谓真正的“教育家精神”。当下关于教育家精神的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教育家精神需要深入个体案例分析。因而,选取有代表性的教育家进行教育家精神意识、情感、要素等方面的分析,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笔者以霍懋征的教育家精神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梳理和考辨,阐释霍懋征教育家精神的源起和构成,并提出对当代教育家培养、教师队伍建设的启示,以在学理层面扩充、论证教育家精神的具象化意义。

一、霍懋征教育家精神的源起

霍懋征教育家精神的起源可从三个方面考辨、明晰: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基础教育改革实验中塑造和凝练的基础教育理念,二是在语文学科教学中形成的教学实践思想,三是 20 世纪其他教育家的精神引领。

(一)在教育改革中凝练的基础教育理念

霍懋征教育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其与时俱进、不断优化成长的基础教育理念。霍懋征的基础教育理念的形成源于新中国成立前在北京师范大学系统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知识打下的坚实基础。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霍懋征选择去实验小学任教,这也为其在基础教育教学实验改革中不断反思、更新教育理念提供了广阔的教学舞台。从教育家精神的角度而言,教育家精神的发展与时代背景、社会变迁、文化传统等密切相关。教育家精神是我国教育思想的结晶,是一代代教育家长期实践的产物[1]。因而,教育家精神的源起不可避免地要植根于中国浩荡的教育改革文

*[基金项目] 2025 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教育研究范式与方法的考察与构建”(项目编号:2025BJY009)。

[收稿日期] 2025-01-19

[作者简介] 魏宏聚,男,河南南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化、历史，并使“教育精神”在“教育理念”的种子中生根发芽，逐渐壮大。霍懋征的教育家精神集中表现为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和壮大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改革实践的基础教育理念，尤其是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语文教育、“师爱”教育等教育思想理念被视为典型。霍懋征的基础教育理念是伴随其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实践成长中逐渐形成的。霍懋征的教育实践成长史分为理想萌发期、探索发展期、韬光养晦期、发展成熟期四个阶段[2]。相应地，其基础教育思想、理念也经历了学习、摸索的萌芽期，观察、实践的形成期，反思、沉淀的思索期，探求、总结的完善期，研讨、传教的完善期[3]。霍懋征的教育理念成长于社会转型的文化背景下的不间断的教育改革工作。一方面，她参政议政，提出改善教师待遇、提高教师地位、制定《教师法》等提案；同时，学习苏联教育工作改革经验，不断改进本土基础教育的办学方法。另一方面，在“文革”中，学校教育遭受批判和打压，教育教学工作停滞不前，霍懋征认识到国家基础教育正面临着发展中断的危机，必须坚持正确的教育教学工作方向，因而，她依然在困难局势中坚持科学的办学方针，尽可能多地开展教书育人工作。“文革”结束后，霍懋征认识到国家基础教育亟待振兴，未来国家的发展是经济、知识社会的发展，要依托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变革。她的教育理念正是在持续经历教育改革的历程中生发的，并且滋养着她的教育精神。

（二）在语文学科教学中发轫的教学思想

霍懋征教育家精神来源之一是其在语文学科中发轫的教学思想。霍懋征的语文教学思想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关于学科教学结构和要素的认知。以霍懋征语文教材观为例。首先，霍懋征对语文教材进行了编排和重组，改变原有语文学科中关于“听、说、读、写”教学内容设置繁杂无序的现状。其次，她区分了语文学科教材在城市和农村实施的效果差异，并指导、重新编撰了适合农村学生学习的语文教材。霍懋征认为教材的编撰要以培养学生语文知识素养为目标，在落实学生基本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教材在教学内容、语言绘图等方面都要凸显时代的知识元素，因此，她倡导按“单元”进行语文知识结构化的编排。这一教材编撰理念正是当下基础教育领域倡导大概念课程、大单元教学的雏形，我们从霍懋征关于语文学科教学的独特理解中就能发现她早已具备教育家的洞见和气质。

二是学科教学的方法和技巧的主张。霍懋征关于语文教学的典型主张是“讲读法”和“读讲法”。“讲读法”教学主张的提出源自她在小学语文教学实验中的发现。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注重教师对知识的机械传授和学生对知识点的死记硬背，阻碍了学生主体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和掌握。霍懋征多次组织教师研讨教材和分析学情，逐渐形成以“讲”为主、以“读”为辅的教学法，通过讲透知识点，然后让学生读练记忆，这个方法对大部分学生把握语文知识要点起到了明显效果。20 世纪改革开放后，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语文水平基础能力普遍较差，霍懋征针对这一现象，借鉴国外语文教材的经验，广泛比较，提出提升学生阅读量、扎实学生阅读基础的做法，并围绕课文“精讲、多练、组织”，提出了其教学生涯典型的“十六字”教改主张，即“速度得快，数量得多，质量得高，负担得轻”，对“讲读法”进行翻转式改良，提出以学生为主体的“读讲法”，倡导语文教学要多读、多听、多思、多问、多练，以及课前预习好、课上理解好、课后复习好，简称“五多三好”[4]。

三是学科教学的价值观念。霍懋征提出语文教育要注重“文道统一”的教学方法论，所谓“文”指文化知识，“道”指蕴含在知识当中的思想、哲理和情感价值。在“双基”教学年代，霍懋征早早注意到了语文学科不仅有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写作能力的教学内容，更重要的是蕴含在语文学科教学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也就是说要通过语文教学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霍懋征以语文教学为例，整合了“双基”的教学理念，提出语文教学方法不只要使学生学会基础知识和掌握基本能力，更要使学

生感受语文的“美”和“韵”，从生活中体察“语文”的学科之道，感悟语文育人的元素。

（三）20世纪其他教育家精神的熏陶指引

霍懋征是在20世纪教育家的精神熏陶和指引下成长的。在工作中，霍懋征研读教育名家的理论著作，纳多家之言并在实践中拓展、发展成为自己的见解。新中国成立前，霍懋征就接触叶圣陶、雷洁琼、张志公等老一辈教育家的作品和思想，正如霍懋征本人说道“先生们的学识以及教育的主张、理念对我影响深刻，与之相交越多，越能感受他们身系劳苦大众的教育事业品格”。以叶圣陶为例，叶圣陶的教育家精神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语文教育为象征，其教育家精神融入人民教育生活当中，关怀学生成长，注重教师劳动，教育界流传“不读叶圣陶，无以教语文”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由叶圣陶领导，人民教育出版社组建了编教材的专家队伍，霍懋征也在其列。在参与语文教材编写工作的过程中，霍懋征向叶老请教，其语文教学思想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霍懋征还经常向其他教学名师请教，结交志同道合的好友，如方明、斯霞、顾明远等名师，不断学习教育家的教育实践理念和观点，其“师爱”教育精神就是在此基础上获得指引加以构建的。以方明为例，方明是陶行知的弟子，方明认为有爱才有教育，并提出爱是教育的根本、育人要先育德、爱人是爱教的前提等教育理念，霍懋征通过不断与方明交流论证爱的教育思想及其理论与实践经验，逐渐形成、完善其“师爱”教育思想，并将爱的教育贯穿到具体教育教学当中，通过爱感化学生、激励学生、启发学生，可以说师爱是其达成教学目标的教学方法的灵魂。霍懋征通过学习方明、斯霞等人的师爱思想观点不断完善自身的师爱教育思想体系，在实践中凝练出“激励、赏识、参与、期待”的教育智慧方针。

二、霍懋征教育家精神的构成

霍懋征的教育家精神构成可分为四项：一是信念层面，心有大爱，躬耕教坛；二是方法层面，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三是实践层面，反思教学，凝练智慧；四是价值引领层面，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一）心有大爱，躬耕教坛

纵观霍懋征六十多年的执教生涯，其“师爱”生动地诠释了“教育的爱”和“爱的教育”的意蕴。霍懋征的师爱是理性的爱，是教育中的大爱，也是感性的爱，是对教育无私的爱，对青少年儿童成长殷切的爱。在霍懋征六十多年的教育教学历程中，“师爱”可以体现为几个方面。一者，认真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促使其所在的小学始终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办学。二者，爱岗敬业，对学校管理工作尽心尽责。霍懋征在学校管理层中担任要职，多次肩负起学校课改的重担，组织小学教师磨课、试课、改课，带头进行语文教材及教学改革，并且承担了多年的班主任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班级管理经验。其“师爱”教育以激励、赏识、参与、期待这些行为为表征，爱学习困难的学生、家庭困难的学生，也爱内向自卑、淘气顽皮的学生，体现出的是尊重、平等、关怀等师爱价值品质，它们是爱的具体表现与价值品质[5]。三者，霍懋征的师爱是历经时代风雨，依旧永葆教育初心，百折不挠、鞠躬尽瘁的大爱。霍懋征的教育教学生涯几乎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苦难和磨砺，从抗战胜利到改革开放，在此期间，霍懋征牺牲了照顾家庭的时间和精力，始终心系学校和学生，从这个角度而言，当下中国教育家精神研究中所提及的“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正是对霍懋征教育家精神特征的写照之一。四者，霍懋征的师爱是超越世俗的大爱。霍懋征一生是“光荣、艰巨、幸福”的一生，其爱的教育的本质正如雅思贝尔斯所言，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6]66。霍懋征的爱的教育突破了专业本位思想的束缚，体现为她在“教”和“育”的价值抉择上充分认识价值观层面的“育”的作用后，发自内心地投入、坚守、奉献和享用自己的教育工作[7]。从霍懋征一生的教育行动中可以看到一位朴素的教育家坚守的教育情怀打破了功利主义思想的桎梏，甘于奉献已成为霍懋征教育生涯的个体生

命自觉。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说,霍懋征的教育思想是一种以“爱”为主旨的实践教育学。

(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霍懋征教育家精神的一大特质在于其教学理念和方法诠释了何谓“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首先,在“有教无类”上,霍懋征执教生涯中遇到诸多不同类型的学生,有学习困难的学生,有性格顽劣的学生,有脆弱敏感的学生,有误入歧途的学生,霍懋征始终秉持“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理念,在日常教学中不遗余力地引导和帮助上述问题学生。事实亦证明,霍懋征所带班级的问题学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学习成绩、道德情感、社会生活上都有了积极的转变。霍懋征不带任何偏见,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是其“有教无类”的教育精神的实践表达。其次,在“因材施教”上,霍懋征针对不同特点的学生,使用不同的教学情感策略,引导学生品格发展,表现为三方面。一者,以“激励”和“爱护”为教学情感态度,保护学生的自尊,和学生平等对话,拉近与学生的距离,鼓励懦弱、胆怯的学生参与集体活动,以“耐心”期待学生逐渐取得进步。二者,用“赏识”的方式,对学生实施欣赏性评价,用具体的行为和语言夸奖学生的优点和才华。霍懋征十分注重去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优缺点、家庭背景,有的放矢,针对学生的具体问题采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三者,创造教学条件,营造教学氛围,使学生全员参与教学活动。她在课堂教学中,擅用启发式教学方法,用谜语、诗歌、典故来激发学生学习语言文字的兴趣,甚至成立学习兴趣组,带动学生全员参与,激发学生学习欲望,收效显著。

总体而言,霍懋征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精神渗透在德育、智育、体育等多个方面。从德育层面来看,霍懋征认为每个学生的思想品德都是教育引导的重点,因此,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她采用不同的情感教学方式实施正面教育,在对每个学生个体的教导上,做到了耐心、期待、赏识、陪伴、参与,为学生创造健康思想成长的教学环境;从智育层面来说,霍懋征的教学方法多样,早年从事数学教学时,她讲解算术应用题时深入浅出,启发学生举一反三;后期转向语文教改,她精讲诗文古文,同时预留充足自学时间,帮助学生吃透知识,夯实学习根基;从体育层面来看,霍懋征深刻认识到“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良好的体魄是学生成长的根基,因此,她注重开展生动活泼的体育活动,为学生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教育氛围。

(三)反思教学,凝练智慧

纵观霍懋征的教学生涯,教学反思贯穿其中。在长期的一线课堂工作中,霍懋征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经验,并通过实践检验和优化形成了个人独有的教学智慧。教学智慧是教育家的基本素养,也是教育家精神养成的核心要素,霍懋征基于教学实践的不断反思是形成教育家精神的途径之一。从“讲读法”到“读讲法”,从问题学生教育方式的反思及改进到各项语文教学方法的形成等,都映射了霍懋征教学工作的特征,即通过教学反思,提炼教学经验,凝练教学智慧。从教学经验的类型来看,根据经验的成熟度及经验中“思维”的含量,杜威把经验分为三类:原初经验、反省经验和艺术化经验。随着经验中思维含量的增加,经验的价值逐渐增大,最终发展成为艺术化经验[8]。霍懋征的教学反思经历了从原初教学经验到反省教学经验再到艺术化教学经验的变迁过程。首先,霍懋征从北师大毕业后初到小学任教,正处于早期的职业生涯阶段,尚未具备丰富的教学教改经历,她从开始分析语文教学案例起,逐渐积累初始性的教学经验,这种经验是未经过加工的、粗糙的教学经验。其次,霍懋征提出的“读讲法”“讲读法”等教学主张,是经过系统反思性实践得出的教学经验,正如杜威所言:“反思是产生有意义经验的思维要素。”[9]158关于霍懋征反思教学、提炼反省经验的成果诸多,例如霍懋征提出的“精讲、多练、合理组织课文”。笔者认为,“精讲”的内涵在于讲课文的重难点、精华、典型,它是反映课文中心思想的核心知识点;“多练”的内涵在于通过听说读写多种学习活动结合达成教学目的,而这些都属于课堂教学设计的典

型环节,需要教师不断反思教学案例来提取其中好的教学经验,以形成有效的教学操作方法。再者,霍懋征在执教生涯的后期,形成了艺术化的教学经验,即教学智慧。教学智慧是霍懋征从教数十年的成果,是霍懋征为方便教师系统学习教学和管理经验,对自我执教生涯的归纳总结,包括其出版的《班主任工作札记》《霍懋征语文教学经验选编》《小学语文教学经验谈》等,可视为艺术化教育教学经验的集大成者。

(四)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霍懋征是教育教学改革的先行者,教学实践的研究者。她不仅关爱学生成长,也注重教师的专业发展。在霍懋征的言传身教下,她的亲人中有多人投身教育事业,从事教书育人工作。霍懋征心系教育事业,在改革开放后,曾担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正如她所言:“担任职务就意味着承担责任,所谓责任就是要在站在职位的平台上,努力表达自我的心声,带头推动教育的发展。”[10]163霍懋征对待教育工作凡事亲力亲为,积极参与各项教育研讨会、讲学会,涉及学校办学的方方面面,并且投身社会的教育工作,结合社会教育问题,通过多种渠道积极为广大教育工作者谋取福利和权益,为保障妇女和儿童受教育权而贡献力量。霍懋征退休后,仍积极响应国家教育发展政策,曾多次组织支教团前往贫困地区开展公益支教活动。在支教过程中,霍懋征不仅通过送教下乡、开展专题讲学、组织观摩教学等,为农村小学提供教育教学工作指导,为当地学校传授教改信息、办学经验和教学方法等,还观察和指导地方青年教师磨课、上课,了解其教学及生活情况,并组织教师开展文娱活动,以实际行动对西部地区小学进行教育扶贫。霍懋征在改革开放后深入我国青海、甘肃、贵州、广西等贫困地区考察教育现状,联系政协呼吁集中社会力量建设西部地区基础教育事业,为地方农村学校教育提供发展资金。霍懋征的教育公益足迹遍及西部的六个省、八个地级市、一个自治州,受益者多达十余万人次,她的爱的教育思想传播到广阔的西部大地。晚年的霍懋征依然保持学习前沿教育思想文化的精神自觉,随同我国教育代表团出访日韩等国开展学术交流。以上种种,无不彰显霍懋征作为教育家的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终身奉献的教育精神气质。

三、霍懋征教育家精神的启示

霍懋征的教育家精神蕴含德性、知识、智慧、理念等多方面实践特质,对当下教师专业发展及教育家培养具有如下启示:教育实践应推崇“尊德性”与“道问学”统一,建构“研究型”与“实践型”融合的教师身份,提炼“主张性”与“理论性”结合的教学智慧,塑造“自我养成”与“持续更新”的教育理念自觉。

(一)推崇“尊德性”与“道问学”统一的教育实践

霍懋征在长期教育实践中推崇和践行“文道统一”的思想。一方面,她在传授学科知识文化的同时,注重挖掘知识文化背后的德性价值,引导和涵养学生的文化品性和道德情操;另一方面,她以“爱”之名培养和塑造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使学生德才并育、知行合一。霍懋征的教育实践启示当下中小学教育实践应推崇“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统一的思想。“尊德性”即重视个体德性的教化,“道问学”即追求知识文化的真理。正如霍懋征认为,语文教学不能只注重学生掌握语文学科的知识、技能,更要涵养其语文的学科志趣,强化语文课中的思想品德教育。正所谓“文以载道”,所有的学科教育都不应偏离育人的方向,中小学应结合具体的学科教学,挖掘学科思政元素,大力弘扬课程思政育人的理念,践行文道统一的教育思想,而非将学生视为知识的容器,实施“满堂灌”和“填鸭式”教育,剥离学生道德品性的养成,使个体生命成长的丰富性沦丧。此外,教师的“爱”应贯穿学校的教育过程。霍懋征信奉教师的爱是实现寓德于教的根基之一。鲁洁先生认为,“德育的深层价值在于发展人的品格过程中,使之获得一种自我肯定、自我完善的满足,是为精神上的享受”[11]。作为“爱”的情感正是个体教化、实现个体自我满足的精神享受的催化剂,因而教

师的爱是感化学生、引导学生的关键要素。唐代韩愈的“师道”思想也指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重视知识文化的传授,也要解答学生的困惑,引领学生的思想。“经师”致知,“人师”崇德,教师不应只为“经师”,更应为“人师”。当下不少中小学教育重视工具主义,讲究技术理性,将学生的学科成绩放在本位,而忽视个体心灵、品格的培育,本末倒置。如果教育的现实背离了“人性实现优秀”的发展目的,那么教育就不是合乎人性的,就不是合目的、合价值的[12]。因此,学校教育要倡导“师爱”,以爱助推学校教育的生命关怀,关注学生的情感世界,悦纳学生的生命尊严和成长规律。如此这般,“爱”的情感价值观教育便赋予了教育过程的深刻意义,而教师也朝向既精通专业知识又涵养德行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方向发展,这是教育者践行教育使命的核心品质,是成为好老师的先决条件[7]。

(二)建构“研究型”与“实践型”融合的教师身份

新课改以来,教师成为研究者的呼声愈演愈烈。早在20世纪,霍懋征就已呈现出作为“研究型教师”的身份属性。霍懋征的执教生涯历经多次教改、教材、课堂的研究转向。霍懋征在编纂语文教材、实施课例研讨、学习和应用教学理论等方面呈现出特定的研究品格。例如在语文教学中,霍懋征时常通过对特定课例的描述性、解释性反思优化教学设计,她所做的课堂观察和反思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场研究、行动研究和实践研究,产生了大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教学成果。当下的一线教师需要形成如同霍懋征“研究型教师”的身份自觉,在教学现场开展实践研究,改变以往单纯“教书匠”的角色身份定位,强调教师的“教学学术”素养的养成。一般而言,课堂观察、课例研究是教师作为教学研究者直接参与的研究活动。但在当下新课改背景下,随着核心素养、大单元教学、“教—学—评”一致性等诸多教改理念的倡导,一线中小学教师开展教学实践研究面临诸多困惑。教师难以把顶层理念与课堂实践的底层逻辑打通,也不易内化这些新理念并落实到课程实践当中。这种情形如同舍恩所描述的,教育教学中涵括两种情境:一是通过一般理论技术知识的套用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高硬地带”,这类教学情境的问题清晰、符合常规方法的检验;二是教学技术或理论难以解决问题的“低湿地带”,这类教学情境的问题结构极其复杂,需要在行动中反思才能逐渐得出问题情境的解决办法[13]43。霍懋征的研究思维正是在大量语文教学问题情境中得以训练和强化的。从霍懋征教学实践的相关文献中可以发现,霍懋征的研究从实践现场出发,在明晰教学问题后通常会呈现出反思、探究的“自反性”过程,这种过程是抽离其自身实践经验、重组实践性知识的过程,此种过程的持续会逐渐形成“研究—实践”双向建构和循环的教师个体身份意识,是名师成长必然经历的身份意识觉醒和认同过程,更是教育家精神形成的初始阶段。教师需要有意识地了解、熟悉和掌握关于教学研究的基本理论知识、方法技术,在实践研究中不断打磨研究思维,建构其“研究型”和“实践型”融合的教师身份。

(三)提炼“主张性”与“理论性”结合的教学智慧

教学智慧是教育家基本素养的构成要素。霍懋征的教育家精神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善于反思、归纳、概括、提炼教学经验,以使教学经验概念化、系统化,进而生成个人的教学智慧。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中,诸多一线教师缺乏归纳经验与提炼智慧的意识和方法,教师的教学经验、个人知识、实践性知识等如果能够实现概念化提取和表征,那么就能发挥巨大的实践价值,正如霍懋征全面反思总结了其教学生涯中有效的教学方法、策略,结合实际教学效果,凝练出“读讲法”“讲读法”“十六字教学方针”等教学主张。基于上述认识,一线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重要方式就是要提炼教学智慧、形成教学主张。另外,教学智慧不仅要具有“主张性”,更要实现“理论化”,具备“理论性”。也就是说,教师教学经验的总结提炼不仅是一个主张性的“实践框架”,更要在具

体实践中建构具有可操作性、实用性的实践性教学理论，以使教师的教学智慧结晶不仅有“名”，更有“实”，兼具规范性和实用性，是教学名师乃至教育家真正需要的实践智慧。教学名师乃至教育名家的形成过程是提炼“主张性”与“理论性”结合的教学智慧的过程。

（四）塑造“自我养成”与“持续更新”的教育理念自觉

从“精神”本身而言，个体的“精神”形成于理念的萌发、壮大的过程。霍懋征的教育理念是经过数十年实践探索才走向成熟的。从其执教生涯来看，霍懋征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的理念，并基于此理念不断提炼、总结教育经验，完善理念框架。霍懋征的教育家精神形成的内核在于霍懋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和实践历程中的自我养成和持续更新的教育理念。教师专业发展的引导、成熟、稳定、停滞、超越等阶段都以教育理念适应、嵌入、成熟、突破、完善于教育实践过程为根基。无论是教师的理论学习、实践反思或技能训练，都需要理念的引领和融贯。教育工作者、研究者在教育行动研究中的活动需要形成“自我认同”“自我革命”“自我行动”的教育理念自觉，并在反思归纳教育经验、开展批判性思考和创新中深化理念支撑教育实践活动的要素、框架。教育工作者塑造自主养成和持续更新的教育理念可从三个层面展开。其一，专业知识文献的阅读与积累。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文化知识是教育工作者成长为教育家的素养基础，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一线教师需要关注教育教学的经典文献和发展前沿，通过专业阅读养成具有教育性和前瞻性的教育理念意识。其二，课堂教学的变革与实践。教育工作者应依托行动研究开展课堂教学的变革性实践，不断深化对课堂文化的理解，改进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优化教学理念，厚植教育理念的实践根脉。其三，凝练理论智慧，提升理念境界。教育工作者要在教育研究中凝练教育实践的理论智慧，教师可从微观情境的个案描述出发进行意义挖掘与建构，在教学反思中积累、聚拢教育教学经验，凝练教育理论智慧的观点阐释与表述[14]。而这一行动过程，也是教师以及教育工作者深化个人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自下而上渐进形成个人风格教育理念的精神历程。

[参考文献]

[1]王莅，王凌皓.弘道立范：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当代教育论坛，2024(4)：108-116.

[2]杨婷.教育家霍懋征个体成长史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8.

[3]冯丽君.霍懋征语文教育思想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16.

[4]易进.霍懋征语文教育思想及实践探索述评[J].小学语文教学，2022(28)：14-19.

[5]魏宏聚.论师生交往中“师爱”发生的价值秩序——以霍懋征、斯霞“师爱”实践探寻“师爱”发生机制[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43-148.

[6]雅思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7]刘敏，张新科.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内涵、价值意蕴及弘扬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3(10)：143-151.

[8]魏宏聚，任玥姗.论课例中的教学经验及提取策略[J].课程·教材·教法，2021(10)：59-64+71.

[9]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

[10]赵萱，张小武.霍懋征传[M].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

[11]鲁洁.试论德育之个体享用性功能[J].教育研究，1994(6)：46-47.

[12]金生鉱.以教育为志业：教育家的精神实质[J].中国教育学刊，2011(7)：1-6.

[13]SCH.N DA.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M].New York：Basic Books，1983.

[14]汤博闻，朱志勇，阮琳燕，等.中小学学者型教师的实践素养与发展机制[J].教育学报，2024(5)：87-99.

（责任编辑　师　语）

论陈鹤琴教育家精神及对涵养幼教大先生的启示*

田 景 正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省学前教育研究基地，湖南长沙　410081）

［摘　要］　陈鹤琴创建了著名的“活教育”理论体系，为教育的科学化和中国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陈鹤琴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和理论探索中，表现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陈鹤琴教育家精神主要体现在心有大我、为国育才的济世志向，博采众长、求知识于世界的学习态度，扎根中国大地开展新教育实验的科学精神以及探索科学化、中国化教育的责任担当等。作为新时代的幼儿教师要积极学习践行陈鹤琴以教育为志业的精神和教育强国的使命担当，要有“一切为儿童”的奉献精神和仁爱情怀以及勇于开拓求新的创造精神，深入学习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全面提升专业素养，做新时代幼教大先生。

［关键词］　陈鹤琴；　教育家精神；　幼教大先生；　教师素养

［中图分类号］　G4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5-0073-07

陈鹤琴(1892—1982)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他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针对学校普遍存在的“死读书”问题，以开创中国化、科学化教育的勇气和担当，进行了著名的南京鼓楼幼稚园实验和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等实验研究，创建了著名的“活教育”理论体系，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陈鹤琴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和理论探索中表现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发扬光大。

一、陈鹤琴教育家精神的内涵

(一)心有大我、为国育才的济世志向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是古往今来教育家首要的精神与理念。《礼记》中《大学》指出知识分子应“亲民”，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的一生常怀“老安少怀”“天下大同”之志，强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教育家陶行知指出广大教师对待教育事业应怀抱“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和“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来去”精神，要求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1]87。

陈鹤琴的父亲在他 6 岁时离世，生活困顿。1906 年，在姐夫的资助下，陈鹤琴于杭州蕙兰中学求学。受学校氛围的影响，陈鹤琴这一时期的志向已经不是“显亲扬名，谋个人的福利”[2]558，而是立志要做济世救人的事业，“非有学问不可”[2]559。于是，陈鹤琴插班进入圣约翰大学，经过层层选拔，考入清华学堂。进入清华，他的大我理想更为明确。他说清华时代“好像朝气蓬勃的春天”，希望“非常远大”，前途“非常光明”，精神“非常饱满”，自信也“非常坚强”[2]564，认为“一个人要有成就非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科“十四五”规划基地重点课题“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农村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策略研究”(项目编号：XJK23AJD031)。

［收稿日期］2024-12-13

［作者简介］田景正，男，湖南泸溪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努力非奋斗不可,非为人民服务、非为国效劳不可”[2]572-573。陈鹤琴把大我精神还转化成了实践,一是他给校工开办了补习学校,帮助他们识字读书;二是办了一个义务小学,指导几十个儿童读书。另外,他还组织了取名为“仁友”的同志会,办了一张报纸。

清华学习结束后,陈鹤琴决定去美国留学。“大我”理念使他反复思量专业问题,确定自己的志向“是要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同时,“我是喜欢儿童,儿童也是喜欢我的”,因而“决意去学教育”[2]583。他认为儿童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教育工作能为国家培育栋梁之才,教育事业才是自己所喜爱的。这一志向也使其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伟大的教育事业。在学成归国长达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在“做官”与“做事”之间,他始终选择了后者。20 世纪 20 年代,陈鹤琴克服困难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研究中国化幼儿教育。1940 年,他拒任高官,创办了江西省立幼师,面对办学的诸多困难毫不退缩,实施“活教育”实验,培养了一大批新型师范人才,为中国教育革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博采众长、求知识于世界的学习态度

1.求学美国,融会贯通

1914 年 10 月,抵达美国的陈鹤琴开始了长达 5 年的留美学习生涯。留美学习给陈鹤琴打下了扎实的西学根基,为他回国改造传统教育,成长为现代著名教育家奠定了学理上的基础。

首先,广泛涉猎现代科学知识。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远涉重洋来到美国的陈鹤琴定下了为学方略:“凡百事物都要知道一些,有一些事物,都要彻底知道。”[2]586他在霍普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先后选修了德文、法文、英文、政治学、市政学、经济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哲学和教育史等课程,大大增长了见识。陈鹤琴说:“我研究了生物学,好像发现了显微镜底下的一个生物世界,认识了从前所看见而不知道的动物世界。”[2]591美国教师在教学中重视实验,教法新颖,使他耳目一新,有了许多新的收获。他感觉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和教育哲学等课程更具有吸引力。此外,陈鹤琴还利用暑假选修一些国内尚新的诸如鸟学、园艺、养蜂学、汽车学等课程,大大拓宽了知识面。

其次,深入学习和领会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实验精神。陈鹤琴对霍普金斯大学学理精神极其佩服。他指出:“我觉得一个游学生到外国去游学,最重要的不是许许多多死知识,乃是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精神。”他强调:“方法是秘诀,方法是钥匙,得到了秘诀,得到了钥匙,你就可以任意去开知识的宝藏了。”[2]591-592他极为赞赏科学实验法,认为这种教学法与中国传统“拿着书本死教”截然不同,“是一种科学上的归纳法”,教师“先教我们去实验,去研究。……等到我们一起做好了,才肯告诉我们,指出我们的错误,比较我们的结果。这种方法真是好极了”[2]590。

最后,学习和实地感受了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1917 年陈鹤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后,这里的实用主义精神的气氛让他如痴如醉。杜威的学生兼同事克伯屈的教学活动所体现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给陈鹤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伯屈讲授“教育哲学”时先把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然后给每人发一张纸,纸上印有十几个问题和十几本参考书名,要求学生就所选问题分组去图书馆查阅资料,之后在小组内讨论。上课时,针对教师所提问题,各组提供意见,并进行辩论。各组成员充分发表意见后,教师再做总结,指出真理和谬误所在。这一教学方法遵循了实用主义“问题—探索”的基本程序[3]21,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陈鹤琴称克伯屈的教育方法是“独出心裁而能刺激思想的方法”,他“不用注入式的讲演法”,“用启发式的问答法”,与苏格拉底问答法相似[2]593-594。

2.亲历欧洲,考察求证

20 世纪 30 年代,欧洲作为新教育运动的实施地,已有 40 多个春秋。欧洲“新教育运动”推行得怎么样?新教育在欧洲遇到什么阻力?对中国的新教育建设有什么启示?陈鹤琴决心深入其中好好考察一番。1934 年 7 月,陈鹤琴开始了长达 7 个月的欧洲之行。

通过参观考察,陈鹤琴不仅对各国教育特点有了较好的了解和把握,而且从中看出了世界现代教育发展趋势。

欧洲之行给陈鹤琴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回国撰文《欧洲教育考察报告》《欧洲各国小学教育新趋势》《参观德可乐利学校报告》等,对欧洲新教育进行了介绍,对德可乐利教学法更是大力宣传。此时,陈鹤琴进一步感受到,对中国式的教育现代化探索同样离不开对世界先进教育潮流的吸收和借鉴。“1934 年作者赴欧洲考察那里的教育情况。他遍历了 11 个国家,与许多著名的教育家们讨论了教育问题,参观了许多新型的非传统的学校,这些使得作者对欧洲有关进步教育的实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促使他确立了在中国实行活教育运动的方向。”[4]295-296

美国留学及欧洲考察对陈鹤琴教育理论的形成和革新教育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学理意义。陈鹤琴正是基于宽阔的中西教育视野,立足时代要求,把西方先进的新教育理论融入中国土壤,通过扎根试验去探寻中国化、科学化的教育。

(三)扎根中国大地开展新教育实验的科学精神

早在 1917 年,陶行知就指出:“试验岂易言哉?知其要而无人才,不足以言试验;有其才而无百折不回之气概,犹不足以言试验也!故试验者,当内省其才,外度其势;视阻力为当然,失败为难免;复贯以再接再厉之精神,然后功可成也。”[5]246-247 可见,教育实验就需要这种“百折不回”的精神。为了进行中国的新教育实验,陈鹤琴不畏艰难困苦,扎根试验探寻中国的新教育道路,铸就其教育事业的辉煌。

1.南京鼓楼幼稚园实验

陶行知在《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的报告中写道:“国立东南大学陈鹤琴教授所指导的幼稚园教育实验,也是意义重大又令人鼓舞的。他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有感于目前在幼稚园教育中所使用的一些教材和教法都是照搬外国的,其中有一些不符合中国儿童的实际,所以在 1923 年秋季开始用自制的玩具、中国的儿歌、童话以及其他的教材在幼稚园中进行实验。”[6]285-286 可见,南京鼓楼幼稚园实验是中国学前教育民族化、科学化道路上的先驱,也为陈鹤琴教育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早期学前教育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明显[7]84。因此,用科学的方法去实验和建设“中国的”学前教育要求迫在眉睫,陈鹤琴深感责任重大。1923 年秋,陈鹤琴决定以南京鼓楼幼稚园为基地,开展实验,开创新路。经过南京鼓楼幼稚园的一系列实验探索,到 1927 年,陈鹤琴隆重推出历史性宣言《我们的主张》,提出了中国新教育的 15 条主张,这成为陈鹤琴教育理论的纲领性文献。

一是中国新教育建设原则。陈鹤琴指出,国外的先进的东西必须拿来,但一定要加以改造。他指出幼稚园要适应国情,否则“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强调“那些具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采用,总以不违反国情为唯一的条件”[8]110-111。这标志其关于中国学前教育从“模仿”转向“中国化”的清晰思路。二是教育教学的逻辑起点。陈鹤琴强调教育教学应该以幼儿而不是以知识或书本为起点,“凡儿童能够学的而又应当学的,我们都应当教他”[8]113,他强调幼稚园应以幼儿能学的东西作为教材,这些教材应与幼儿的生活及其意义对接。为此,他要求幼儿园教材选择应参考 3 个标准:其一,凡儿童能够学的东西就有可能作为幼稚园的教材;其二,凡教材须以儿童的经验为依据,私塾里的四书五经毫无意义,因为这些书上所讲的与儿童的经验隔离得太远;其三,凡能使儿童适应社会的,就可取为教材[8]114。三是课程内容的选取及其组织。陈鹤琴指出“幼稚园课程可以用自然、社会为中心”[8]115,“幼稚生的户外生活要多”[8]121,强调让儿童感受生活的整体,以“整个的”“打成一片的”方式实施教学,绝不能把儿童整日关在教室中,要充分利用户外世界去增长儿童的见识。

2.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实验

陈鹤琴指出欧美的师范教育各有特点,而我国没有对师范教育下一番功夫研究,只是一

味跟着欧美走,未能创立一个适合国情的师范教育。对此,他强烈主张“师范教育一定要实验”[9]38。1940 年 10 月,陈鹤琴从重庆来到江西,正式开办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江西省立幼师”)。以此为基地,试验“活教育”理论,指导幼稚师范教育。

江西省立幼师的“活教育”实验所针对的是学校管理、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沉寂死板的现象,旨在通过“活教育”来替代“死教育”,以培养“现代中国人”。与 20 世纪 20 年代南京鼓楼幼稚园一脉相承的是,江西实验也包括课程、教材教法等要素,但实验对象和范围已大大拓展。参与实验的包括附属幼儿园、附属小学、幼师、幼专等。其中,实验主体是江西省立幼师。

在江西省立幼师,面对十分有限的经费,陈鹤琴与师生一道以“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共勉,克服重重困难,编草盖屋顶、修路,乃至一些房子的建设等事情都由学生和员工自己做,他将这些视之为“活教育”试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 20 世纪 40 年代江西省立幼师实验,陈鹤琴“活教育”理论体系逐渐形成。

(四)探索科学化、中国化教育的责任担当

1919 年 8 月,陈鹤琴回到祖国。与新文化运动相呼应,国内已掀起了新教育运动。然而,缺少生机的学校实际与这股新风很不相称。比如当时南高师一般学生都穿长衫,学生参加运动需要有人强迫,他们“只知道读书,别的都不晓得”,“这种死一般的教育真叫人呕气”[2]622。陈鹤琴决心用“新教育”理念和实践来改变这种状况,他几乎“天天提倡课外活动,常常举行各种竞赛、交谊会这一类有生色的活动,培养学生们的兴趣”。活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不到一年,每个年级都有了级会、级歌,各年级也经常举行联谊会,还有表演、讲座、辩论等。由于陈鹤琴等人的努力,南高师的校园氛围变得昂扬振奋,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相继出台。

回国后的陈鹤琴很快就思考了教育的科学化与中国化问题。他指出传统教育让学生死记硬背《三字经》、读四书五经等固然是不科学的,时下的现代教科书若不合儿童心理,便不能说是科学的。他认为“唯今日所欲讲的心理测验才是科学的方法,在教育上算是最新的利器”[10]557-558。基于此,陈鹤琴与廖世承在教育测验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两人于 1920 年、1924 年先后共同编制了《智力测验法》和《测验概要》,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上述工作促进了中国教育测验运动的发展,展现了陈鹤琴等人对教育实践与理论中国化、科学化研究的早期贡献。

中国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前教育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外国化,二是“幼稚监狱”式的教育。外国化包括强烈的宗教气息和未经消化而移植外国教育教学模式。据 1924 年南京第一女子师范的调查统计,上年的全国幼稚园 190 所中,由教会办理者达到 156 所,占幼稚园总数的 80%以上[11]246。与此同时,西方教会在中国办理的幼教师资培训机构也早于国人自办,且后来有了一定的规模。除了 1912 年由英国长老会在厦门单设怀德幼稚师范学校等,另有一些教会大学纷纷开设幼稚教育系或专业,培养高层次的幼儿教育人才。这些学校毕业生不仅为教会幼儿园培养师资,也为中国官立私立幼儿园服务。故而有学者认为在 20 世纪头 20 年,教会幼儿师范教育控制了整个幼教界[12]283。这造成了中国学前教育严重的外国化倾向。1926 年陶行知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一文中痛陈了这种情况,指出这些幼稚园“弹的是外国钢琴,唱的是外国歌,讲的是外国故事,玩的是外国玩具,甚至于吃的是外国点心。中国的幼稚园几乎成了外国货的贩卖场,先生做了外国货的贩子,可怜的儿童居然做了外国货的主顾”[7]84。

经过深入调查,陈鹤琴还发现幼稚园存在严重的“幼稚监狱”式[13]3的教育问题,主要体现为:其一,幼儿“与环境接触太少,在游戏室时间太多”,阻止了他们与环境的接触,隔绝了儿童的经验来源;其二,“功课太简单”,无外乎图书、玩土、折纸、团体游戏、唱歌、玩积木等几种;其三,“团体动作太多”,强调幼儿活动整齐划一,影响儿童的个性发展等。这一时

期,福禄倍尔、蒙台梭利和杜威的学前教育理论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其教育模式也在中国的一些幼稚园得到运用。然而,外国新教育思潮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怎样利用外国教育理论与经验助推中国教育的现代化?陈鹤琴指出,欧美各国新的教育制度发明确实对世界新教育制度的建立与教材教法的改善有着极大的贡献,但"未尽适合于我们本国的国情与需要,所以我们应当另辟蹊径,从事于一种新的教育方法之探求"[14]339-340。于是,陈鹤琴毅然决然担负起探索学前教育科学化、中国化之重任。

通过南京鼓楼幼稚园试验,陈鹤琴提出了中国化新教育的纲领《我们的主张》。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以鼓楼幼稚园实验成果等为基础,由陈鹤琴、胡叔异等专家负责制定了中国第一个学前教育课程标准——《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该文件由教育部于1929年颁布,1932年作为正式的《幼稚园课程标准》公布。陈鹤琴在《我们的主张》中旗帜鲜明强调"幼稚园是要适应国情的"。在《幼稚园课程标准》中进一步具体指出幼儿园办理"要合乎我们的民族性。……不必多取洋式和舶来品,而须尽量中国化","我国地方辽阔,都市、乡村、南方、北土,富饶地、贫瘠区……社会情形,各各不同","要合乎当地社会情形","不和社会的实际情形分离"[15]176。之后,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陈鹤琴开展了江西省立幼师"活教育"试验,把"活的教育"作为校训,提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的目标,强调"大自然、大社会是活的教材",实施"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教学方法,以革除学校"死教育"的弊端。

二、陈鹤琴教育家精神对涵养幼教大先生的启示

陈鹤琴一生所展现的奉献精神、创造精神以及科学精神是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重要来源,也为新时代幼教大先生的培养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要有以教育为志业的精神和教育强国的使命担当

早在1914年,23岁的陈鹤琴在赴美留学船上就下定决心"要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坚定了回国从事教育事业,教育救国的志向。自此,陈鹤琴矢志不移,在美国留学期间以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为主业,学成回国后即投入火热的新教育运动,亲自参与指导南高师新教育改革,使学校教风学风焕然一新。此后,陈鹤琴创建南京鼓楼幼稚园,开启了中国化、科学化的学前教育试验。他发起成立"幼稚教育研究会"和"中华儿童教育社",创建《幼稚教育》和《儿童教育》刊物,推广新教育理论和实验。在抗战"孤岛"时期,陈鹤琴呼吁"保育民族幼苗",全力投入难民救济与教育工作,开办难民难童学校、报童学校、儿童保育院。1940年,陈鹤琴在江西创办幼师,实施"活教育"实验。抗战胜利后,陈鹤琴出任上海市幼师、女师和国立幼专校长,继续实施"活教育"。新中国成立后,陈鹤琴担任南京师范学院首任院长,发表文章探索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在1949年9月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时,陈鹤琴感慨地写下"愿竭志尽忠为人民服务,为儿童尽瘁"[16]483。

陈鹤琴的一生是以教育为志业、献身祖国的一生。他对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要做事,不做官"的态度,不畏艰难困苦,披荆斩棘,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寻找新路。即使到了晚年,陈鹤琴依旧胸怀祖国教育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言献策,强调"要为儿童教育事业更加努力奋斗"[17]455。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夯实早期根基的使命。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学前教育整体上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实现了基本普及普惠优质发展的大步迈进,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旧突出。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结构面临新的挑战,推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幼儿园教师要不负时代,学习陈鹤琴献身祖国的精神,树立"心有大国,至诚报国"的信念,充分认识幼教事业"报国"的价值和对幼儿健全成长的意义。幼儿教师要勇担民族复兴大任之责,明确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对党和人民教育事业高度负

责,面对平淡、日常、难出彩、待遇低的工作,要能够做到“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乐教爱生,自觉肩负育人使命。

(二)要有“一切为儿童”的奉献精神和仁爱情怀

“为了苦孩,甘为骆驼”[18]468是陶行知对教育精神的描述,意思是教师应具备不怕吃苦的骆驼精神,树立终身奉献教育的志向,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对此,他勉励教育工作者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陈鹤琴正是以这种“骆驼精神”不断创新自己的教育事业。1943 年,在无钱、无粮、无交通工具的困境里,陈鹤琴带领 200 多名师生跋山涉水向后方转移。他表示:“我就是讨饭,也要带着学生走,决不丢下一个。”[19]392他在给师生们的信中写道:“我是你们的校长,也是愿意驮着你们奔走于荒漠间的骆驼,尽我的力,我要为你们寻找可以使你们休息、学习、工作、发展的绿洲。只要我存在一天,我对教育事业,对你们,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懈怠。”[19]392他一生做到了“一切为儿童”[20]749。1935 年陈鹤琴发表《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倡导全社会关爱和教育儿童,维护儿童的权益,教师应“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去教导儿童,训练儿童,使他们成为健全的公民”。“爱”是教育精神的核心体现,陈鹤琴历来反对以“威严”来对儿童实施压制,更反对歧视儿童,强调应以“爱”来感化、教育儿童。1981 年,他在《家庭教育·重版序》中写道:“我虽然年已九旬,但热爱儿童、热爱教育事业之心依然十分炽烈。”[21]678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未来。教育爱曾为古今中外教育家所倡导,对儿童的关爱是教育工作的前提,是教师职业的核心素养。新时代广大幼儿教师要学习陈鹤琴天性“喜欢儿童”的仁爱精神,拥有甘当孩子“骆驼”“为儿童尽瘁”的情怀,用爱心守护好每一个孩子;要积极融入幼儿的活动和生活之中,充分了解幼儿,准确把握幼儿的身心状态,从而能更好地因材施教,使每一个孩子得到应有的发展;要放下身段,倾听儿童的声音,关注他们所思所想,理解尊重儿童,解放儿童的创造力,创造条件,让儿童能够在自主学习探索中成长。

(三)要有勇于开拓求新的创造精神

教育活动是一项创造性极强的工作。陶行知认为“第一流的教育家”应“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22]25-26。陈鹤琴正是这样的“第一流的教育家”。在 20 世纪上半叶,他以改造“死教育”为己任,扎根中国大地,深入开展新教育实验,开拓性地进行“活教育”实验研究,创建了“活教育”理论体系,推出幼儿园“五指活动”“整个教学法”“课程中心制”等自主知识性的话语,历史性地使中国学前教育由对西方的移植模仿转入依据国情的本土化改造创新。这一切成果的取得,正是陈鹤琴攻坚克难、积极探求的结果。

建设教育强国是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重任。广大幼儿教师应发扬陈鹤琴等老一辈教育家的精神,勇担时代责任,勇于探索新时代学前教育发展路径。当前,低人口出生率致使学前教育面临生源短缺,学前教育将从规模扩张向提升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转变。因此,需要积极探索“小规模园”“小班额”“混龄教育”“托幼一体化”等新形态的中国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适宜路径;深入了解幼儿身心状况和学习动机,设计出切实有效的具有“个性化”的教育教学方案;努力拓展“大自然”“大社会”中“人”“事”“物”等教育资源,提升活动质量。面对日益增长的托育需求,幼儿教师要主动探索通过幼儿园设置托儿班,依托幼儿园力量实施“托幼融合”,推进普惠性托育事业的发展。

(四)深入学习陈鹤琴教育思想,努力提升专业素养

“活教育”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灌输式“死教育”的根基,它突出了儿童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直接经验的重要价值,强调要立足时代发展需要,面向社会生活,引导儿童在实践中学习。陈鹤琴教育理论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可以视为现代的‘活

教育’。‘素质教育’所欲克服的‘应试教育’，正是陈鹤琴在半个多世纪前说的‘死教育’。”[23]新时代幼儿教师应根据时代要求，以陈鹤琴为榜样，深入研究陈鹤琴教育思想，提升自身专业素养。一是要努力学习中外教育理论，树立科学的儿童观、人才观和教育质量观，研究儿童，拓宽理解儿童的视角，能够对幼儿有科学的认知与有效回应，让每个儿童享受成长的意义；二是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践行陈鹤琴“活教育”思想，通过“生活”“实践”“活教材”“小先生”等元素来推进课程改革，培养出具有生活力、建设力、创造力的中国儿童；三是幼儿园教师应把教育教学和教育研究融为一体，在科学研究和反思性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专业知识，在实践中生发“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以科学的保教活动促进儿童身心健全发展，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 考 文 献]

[1]陶行知.我们的信条[M]//方明.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2]陈鹤琴.我的半生[M]//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六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

[3]黄书光.陈鹤琴与现代中国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4]陈鹤琴.活教育[M]//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六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

[5]陶行知.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M]//方明.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6]陶行知.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M]//方明.陶行知全集(第六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7]陶行知.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M]//方明.陶行知全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8]陈鹤琴.我们的主张[M]//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二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

[9]陈鹤琴.师范教育为什么要实验[M]//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五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

[10]陈鹤琴.心理测验[M]//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五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

[11]喻本伐.中国学前教育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

[12]易慧清.中国近现代学前教育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3]陈鹤琴.现今幼稚教育之弊端[M]//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二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

[14]陈鹤琴.活教育要怎样实施的[M]//吕静,周谷平.陈鹤琴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15]教育部.幼稚园课程标准[M]//喻本伐,李先军.中国学前教育史料集成(卷四).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2.

[16]陈鹤琴.愿竭志尽忠为人民服务,为儿童尽瘁[M]//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六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

[17]陈鹤琴.要为儿童教育事业更加努力奋斗[M]//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六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

[18]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9]陈鹤琴.给留在江西国立幼师全体同学的公开信[M]//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六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

[20]蔡怡曾,等.陈鹤琴生平年表[M]//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六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

[21]陈鹤琴.家庭教育·重版序[M]//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二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

[22]陶行知.第一流的教育家[M]//方明.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23]田景正.略论陈鹤琴教学法与蒙台梭利教学法的一致性及特色[J].教师教育研究,2008(1)54-57.

(责任编辑　师　语)

教育家精神的生成机理与实践传播*

——基于“教育家精神万里行”语料的扎根理论研究

高 晓 文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吉林长春　130024）

［摘　要］　教育家精神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价值引领。本研究以教育部“教育家精神万里行”活动语料为对象，采用扎根理论开展三级编码分析，揭示其生成机理与实践传播规律。研究发现，教育家精神的生成并非各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初心信念”“躬行实践”与“精神传承”三大核心范畴依循“触发-转化-固化”的内在逻辑逐步建构而成的完整体系；在实践传播中，“教育家精神万里行”活动呈现出流动式与互动式的鲜明特征，其传播效果受主讲者叙事能力、内容具象化程度等因素影响。未来需通过传播精准化与生态长效化，推动教育家精神从理论阐释走向实践落地，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　教育家精神；　扎根理论；　教师队伍建设

［中图分类号］　G4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5-0080-12

一、问题提出

教育家精神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价值引领。回溯政策演进脉络，自 2014 年提出“四有”好老师[1]以来，党中央对教师素养的要求持续深化并不断推进理论创新：2016 年倡导做“四个引路人”[2]，坚持“四个相统一”[3]；2021 年勉励教师成为“大先生”[4]；2022 年强调要做“经师”与“人师”的统一者[5]；2023 年对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进行了系统阐述[6]，这一精神凝练了包括“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在内的六大内涵，已成为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标识性概念，为新时代教师发展确立了根本遵循[6]。

学界针对“教育家精神”的相关研究，自 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以来，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冯建军指出，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家为学、为事、为人的道德品质和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是所有教育家的集体品格，是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一个标识性概念[7]。石中英认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是当代中国师道的集中体现，是对中国传统师道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中居于根本指导地位[8]。王文静和曾榕清强调，教育家精神是在中华传统师道文化沃土中，自本、自根、自觉生长出来的，展现了中国教师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看待教育的特有价值、思维和文化内涵[9]。刘铁芳等认为教育家精神就是“四有”好老师和“大先生”的进一步提升，教育家精神整体地体现了教师发展的自我超越性[10]。邬志辉等认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根植于中国独特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11]。总体来看，现有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后期资助项目“艺术取向教育研究方法的兴起”（项目编号：24JHQ095）。
［收稿日期］　2025-12-31

［作者简介］　高晓文，男，山西吕梁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研究已围绕教育家精神的核心内涵、文化渊源与现实价值达成初步共识，也对其弘扬路径进行了初步探索，但仍然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其一，已有研究视角多聚焦理论阐释，对实践层面的具象表达与落地机制关注不足；其二，已有研究对弘扬路径的探讨多停留在政策倡导、氛围营造等宏观层面，缺乏对具体实践活动的微观解析与经验提炼。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家精神的弘扬需要依托具象化的实践载体与传播场景，“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唯有通过可感知、可参与的实践活动才能真正内化为教师的职业信念与行动自觉。因此，由教育部主导的“教育家精神万里行”等宣讲类活动作为弘扬教育家精神的重要实践载体，其蕴含的丰富语料不仅承载着教育家精神的核心内容，更折射出教育家精神传递的实践逻辑与传播特征，这一领域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挖掘。基于此，本研究立足既有理论成果，以“教育家精神万里行”等实践活动的语料为分析对象，通过系统梳理语料中的精神生成要素，解析其传播特征，最终探寻教育家精神在实践层面的传播优化逻辑，旨在为推动教育家精神从理论阐释走向实践落地提供可操作的经验借鉴，弥补现有研究在微观实践机制探讨上的不足。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强调从经验资料中构建理论，其核心在于基于经验证据提炼理论观点。与先提出理论假设的研究方式不同，该范式要求研究者从实际观察出发，自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结论，再逐步发展为系统化的理论。这一“自下而上”的理论建构过程，体现为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先提取反映现象本质的核心概念，进而通过厘清概念之间的关系建构相应理论。需要指出的是，扎根理论虽立足经验证据，但其价值不仅在于呈现经验事实，更在于从中抽象出具有解释力的新概念与新理论。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以教育部组织的“教育家精神万里行”一手语料为主要分析材料，运用三级编码技术对文本进行系统分析。通过对语料的持续比较，逐步提炼概念类属、梳理类属关联，最终凝练出核心范畴，从而深入揭示教育家精神的生成机理与弘扬路径。

（二）语料来源

本研究以教育部主导的“教育家精神万里行”活动系列资源作为研究资料。该活动是教育部为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要求，于 2025 年 4 月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的系统性活动，由教育部统筹推进，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协同落实，联合中央主流媒体、教育类媒体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单位共同参与实施，其政策背景与组织架构确保了资料来源的规范性与权威性[12]。

本研究所依托的具体素材，涵盖教育部门户网站并经官方渠道刊发的优秀教师事迹报道、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典型经验案例，以及“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展演活动相关资料等资源，同时包括活动专栏中发布的微视频、融媒体系列节目等多元素材。这些素材均直接源自“教育家精神万里行”系列活动，全面记录了一线教师的教育实践与精神风貌，构成一个真实、完整且具有高度代表性的经验叙事集群。

通过该活动官方渠道所获取的文本、影像等内容，不仅客观呈现了教师群体立德修身、敬业立学、教书育人的实践历程，更在叙事建构中生动彰显了其教育理念与精神特质。尽管个体经验叙事具有一定的主观建构色彩，未必完全等同于历史客观性的全部细节，但其作为行动者亲身实践与意义阐释的真实载体，依然具有高度的真实性与信效度。因此，本研究以此类来源清晰、内容可靠的一手材料为基础，旨在深入剖析教育家精神在当代教育实践中的具体表征与生成机制，从而为相关理论建构与政策优化提供扎实的实证依据。

（三）语料处理

1.抽样与转录

在语料处理方面，本研究在遵循质性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法，选取

了40名“教育家精神万里行”活动中的教师作为研究对象(详见表1)。在研究过程中,依据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对原始语料进行系统编码。当分析至第33份资料时,初步实现理论饱和,随后以其余7份资料进行理论饱和性检验,以确保概念体系的严谨性与完备性。

本研究采用的视频材料为分析提供了多模态数据支持,除视频中的言语内容外,还包括非言语行为以及主办方提供的个人背景介绍。为保障编码的准确性与分析深度,所有视频均经逐字转录,文本不仅完整记录语言信息,也系统标注了非言语行为的细节。这些丰富的情境化信息,对深入阐释教育家精神的行为表征与情感传达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

表1　研究样本基本信息一览表

编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A1	邓滢	女	西安外国语大学
A2	何咏诗	女	澳门浸信中学
A3	黄大年	男	吉林大学
A4	蒋春凌	女	浙江诸暨市特殊教育学校
A5	李校堃	男	温州医科大学
A6	刘华东	男	河南省淮阳中学
A7	刘秀祥	男	贵州省望谟县实验高中
A8	牛雪松	男	沈阳体育学院运动训练学院
A9	戚发轫	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
A10	申承林	男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启智学校
A11	谭蕴华	女	香港东华三院包玉星学校
A12	王芬	女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
A13	王亚平	女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A14	王义遒	男	北京大学
A15	夏雪	女	成都七中
A16	肖向荣	男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A17	叶嘉莹	女	南开大学
A18	张洪成	男	扬州大学农学院
A19	周荣方	女	郑州大学
A20	周晓玲	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街第一小学
A21	胡方圆	女	大连理工大学
A22	谭美珍	女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草原小学
A23	马克俭	男	贵州大学
A24	洪美叔	女	海南省三沙市永兴学校
A25	蔡镖	男	澳门镜平学校
A26	马乔恩	女	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A27	周晓渝	女	重庆市渝中职业教育中心
A28	张璇	女	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
A29	李森	男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A30	黄会林	女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
A31	王晓野	女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缸窑镇中心小学
A32	朱国杰	男	香港香岛中学
A33	马超群	男	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
B1	叶德元	男	成都七中育才学校
B2	陈伟武	男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B3	吴佳丽	女	山西省长治市实验学校
B4	徐迅	男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B5	邓小凤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聋哑学校
B6	费祯红	女	山东省栖霞市实验中学
B7	王荣发	男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2.资料分析

在对原始语料的分析中,编码过程严格遵循扎根理论的经典操作规范,依次开展开放式登录、关联式登录与核心式登录 3 个递进阶段,并借助 Nvivo12.0 质性分析软件辅助完成资料碎片化处理、概念提取、范畴归类及关系梳理,确保编码流程的系统性、可追溯性与客观性。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与概念体系的完备性,编码过程严格遵循“持续比较”原则,对 40 份样本资料按序逐份开展编码分析。当编码推进至第 32 份资料时,新提取的表述、现象及隐含的概念内涵已能完全归入此前基于前 31 份资料建立的编码范畴,未出现无法归类的新概念或新类属;编码第 33 份资料时,这一趋势得到进一步验证,所有关键信息均与现有编码体系形成有效适配,无新的维度或类属需要补充,初步判定达到理论饱和临界点。为避免因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饱和性误判,研究者进一步选取剩余 7 份(B1-B7)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样本进行三级编码。经系统分析,这 7 份资料中的所有语料信息均能被已构建的编码体系全面覆盖,未出现新的概念维度、范畴类型或逻辑关联模式,且原有范畴的内涵得到进一步佐证,各范畴间的边界更为清晰。综合上述编码过程与验证结果,可判定本研究的理论饱和度较高。

(1)开放式登录

一级编码主要是开放式登录[13]61-69,96,它要求研究者悬置个人“倾见”和研究界的“定见”,将所有资料按其本身所呈现的状态进行登录,将资料打散,之后赋予概念,然后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14]332,即从资料中发现概念类属,对类属加以命名,确定类属的属性和维度,然后对研究的现象加以命名及类属化。在开放式登录阶段,研究者以“教育家精神万里行”活动的宣讲文本、视频转录资料等为分析对象,打破原始资料的叙事完整性,对其中涉及教师师德修养、育人实践、职业坚守、精神传承等相关的语句和段落进行逐句标注与拆解,剔除冗余信息后提炼初始概念。编码的过程中共识别出 600 个参考点,在此基础上经过多次的整合和归类后,最终形成了本研究的 13 个类属及其属性(详见表 2)。

表 2　开放式登录形成的类属及其属性一览表

序号	类属	属性	序号	类属	属性
1	从教动因	从教缘由 个人经历 教育家精神的号召 国家战略 时代潮流 社会观念	6	实践反思	实践时间 躬耕态度 躬亲实践 实践中反思 个人总结与思考
2	育人使命	教育信念与使命 为国育才 爱国之心 报国之志 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 社会责任感	7	师德情怀	爱岗敬业 甘于奉献 尽职尽责 常怀感恩之心
3	职业认同	自我认同 对个人的意义 对社会的意义 个人成就 个人职业规划 职业展望	8	师生关怀	爱护学生 鼓励学生 将心比心
4	育人理念	坚持素质教育 构建育人体系 教育机会公平 提供机会	9	育人成效	教学成就 从教收获
5	教学实践	执教风格 教学方法创新 学习与实践接轨 教学启发	10	社会认同	家长感谢老师 家长支持工作 学生感恩教师 学生回馈教师 学生对老师教学的反馈 大众认可 他人认可
			11	支持体系	团队协作 社会支持 政策支持
			12	主体韧性	迎接挑战 直面质疑 不惧挫折 自立自强
			13	公共担当	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 致力于公益

(2)关联式登录

关联式登录(Axial Coding)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14]333。本研究遵循扎根理论的关联式分析逻辑,通过梳理教师叙事中的价值导向与发展脉络,围绕“信念—实践—传承”的核心故事线,对开放式编码形成的 13 个类属进行关联性整合、补充与验证,明确类属间的相关关系、递进关系与并列关系[15]11-14,最终形成 6 个初始范畴,并进

一步提炼出3个具有统领性的核心类属。

基于开放式编码的13个类属，通过系统分析类属间的内在关联性，整合形成6个初始范畴："价值召唤""使命内化""主体认同""实践生成""支撑强化"和"精神外化"。在6个初始范畴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系统分析其逻辑关联，提炼形成3个具有统领性的核心类属："初心信念""躬行实践"和"精神传承"，三者共同构成教育家精神生成与传承的完整链条。

其一，"价值召唤"与"使命内化"共同指向教师投身教育事业的价值原点与信念根基："价值召唤"作为外在诱因，涵盖个人经历、教育家精神号召、国家战略等多重驱动因素，为教师入职与坚守提供初始动力；"使命内化"作为内在认同，体现教师对为国育才、社会担当等教育使命的深度接纳，形成稳定的信念内核。二者一外一内、互为支撑，共同构成核心类属"初心信念"，诠释教育家精神形成的价值源头与信念基础。

其二，"主体认同"与"实践生成"聚焦教育家精神在行动层面的发展与深化："主体认同"是教师持续深耕教育的内在心理支撑；"实践生成"则是理念向行动转化的核心环节，涵盖育人理念的践行、教学方法的创新、实践过程的反思以及对学生的关怀互动，是教育家精神在具体教育场景中的具象化表达。二者有机统一，整合为核心类属"躬行实践"，揭示教育家精神在实践层面的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

其三，"支撑强化"与"精神外化"共同构成教育家精神传承的关键维度："支撑强化"从外部支持（团队协作、政策支持）、社会反馈（家长与学生认同、大众认可）与内在素养（主体韧性）3个层面，为教育家精神的坚守与传承提供保障；"精神外化"则通过育人成效的显现与公共担当的践行，将内在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实践成果与社会价值，实现精神的传递与延续。"支撑强化"与"精神外化"二者分别作为"传承保障"与"传承结果"相辅相成，提炼为核心类属"精神传承"，诠释教育家精神从个体坚守到集体弘扬的传承逻辑（详见表3）。

表3　主范畴及其初始范畴和类属一览表

主范畴	初始范畴	类属
初心信念	价值召唤	从教动因
	使命内化	育人使命
躬行实践	主体认同	职业认同
		师德情怀
	实践生成	育人理念
		教学实践
		实践反思
		师生关怀
精神传承	支撑强化	支持体系
		社会认同
		主体韧性
	精神外化	育人成效
		公共担当

（3）核心式登录

核心式登录（又称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的任务是在开放编码与主轴编码的基础上，提炼统领性核心范畴，系统梳理主范畴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最终构建能够完整解释研究现象的理论框架。本研究依托前期编码成

果,对 3 个主范畴及 6 个初始范畴、13 个基础类属开展多轮次系统梳理和交叉比对。结果显示,各主范畴均具备清晰的内涵边界与独立的外延指向:“初心信念”聚焦教育家精神生成的价值原点,“躬行实践”侧重教育家精神落地的行动路径,“精神传承”凸显教育家精神延续的传承逻辑,不存在单一主范畴覆盖其他范畴或多范畴可合并的情况,三者相互独立又紧密关联,共同构成一个动态循环的有机统一体,完整呈现教育者向具备教育家精神的优秀教育工作者进阶的全过程。

在系统解析各主范畴内在关联的基础上,研究明确核心范畴为“文化对教师信念的构建与升华”。围绕这一核心,研究者着力完整还原每位“教育家精神万里行”活动中教师的成长轨迹,系统梳理教育家精神的生成过程,并据此提出以下扎根理论:教育家精神的形成是以“初心信念”为内生起点,经由“躬行实践”实现精神具象化,在“精神传承”中获得持续支撑与价值延续,三者相互交织的上升过程。据此,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初心信念的稳固程度正向影响教师在实践中的反思深度与创新意愿。

H2:躬行实践中所形成的问题解决能力,有助于增强教师在复杂情境中的守正定力。

H3:精神传承的完善程度能够反向强化教师的初心信念与实践动力。

初步搭建理论框架后,研究者带着假设回归原始语料,通过回旋性比较与系统性分析,对框架合理性与适配性进行全面校验。校验过程中,重点核查各主范畴、初始范畴与类属的对应关系是否准确,主范畴间的逻辑关联是否符合教师叙事中的真实成长轨迹,核心范畴是否能完整解释教育家精神的生成与发展。结果表明,原始语料中的教师事迹、实践案例与精神表达均能被该理论框架充分覆盖,各假设均得到语料支撑,框架内涵与逻辑关联具备良好的一致性与说服力。最终,本研究构建起以“初心信念、躬行实践、精神传承”为核心要素、具备内在一致性的动态循环理论模型(详见图 1)。该模型强调:教育家精神的形成不仅依赖个体内在信念与行为的持续互动,也离不开外部生态环境的系统支持,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不断升华的专业成长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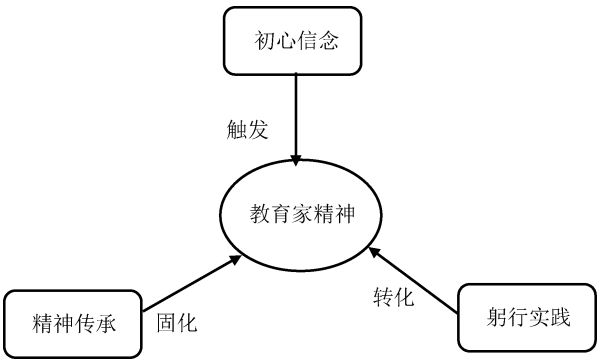

图 1　教育家精神的生成机理

三、教育家精神的生成机理:基于语料的发现

基于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分析,本研究提炼出了教育家精神生成的基本要素及其互动关系。下文将在阐释初心信念、躬行实践以及精神传承三大核心要素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揭示其遵循的“触发—转化—固化”的动态路径,为理解教育家精神的形成过程提供理论依据。

(一)教育家精神生成的核心要素

1.初心信念

初心信念的本质是对教育事业的赤诚坚守,蕴含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以及对学生成长的真挚关怀与对教育本真的执着追求[16]。它既是教师面对教学压力、职业困境时的精神支柱,也是指引其持续深耕专业、优化育人方式、保障育人质量的核心导向,为教师职业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使教师成为优秀教师的,不是他们的知识或方法,而是教师对学生、自己、他人的目的、意图和教学任务所持有的信念。”[17]作为教育家精神生成的内动力,初心信念是主范畴层面的核心要素,是外在价值引领与内在使命认同的有机统一,具体涵盖“价值召唤”与“使命内化”两个相互关联的初始范畴。

价值召唤是教师投身教育事业的初始诱因,其核心是多元外在因素对个体的引领与感召,具体涵盖个人经历、教育家精神的号召、国

家战略、时代潮流、社会观念等属性，共同构成教师选择教育职业的外在影响因素。以教师A27为例，作为一名中职教师，她的职业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她的外公的影响。她以外公为榜样，在职业选择时追随外公的足迹，投身国家的职业教育事业。同时，这也是一种个人志向与社会责任感的展现，回应国家发展的召唤，为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教师A27扎根职业教育一线19年，这一份执着也是最初对教育家精神的感召的一种回应。新时代的教育家精神是传递火种的执着，是唤醒匠心的责任，是汇聚山海的伟力。她始终记得外公的那句“教育是把火种传给最需要光的人”，如今，“火种”从外公传递给她，又从她传递给无数学生。

使命内化是价值召唤向内在信念转化的关键环节，具体体现为教育信念与为国育才、爱国之心、社会责任感等属性的深度融合，最终形成稳定、持久的内在价值认同，成为教师长期深耕教育的精神支撑。例如，教育理想是一种价值认同和价值追求，代表着教师对奋斗目标的不懈追求[18]。这样的理想信念通常源自对教育公平、教育意义的追求以及对育人成才的孜孜以求[19]。教师A4多年从事特殊教育，她希望把这些“折翼天使”当作健全孩子对待，守护着他们的尊严和自信。她因材施教，一点点发掘不同孩子的天赋并针对性地施教，不断抓住机会培养人才，让这些孩子在竞技和拼搏中变得坚强。她致力于通过对特殊孩子的教育改变人们的看法与偏见，并帮助特殊孩子寻找生命的意义。在她的努力下，培养出了4个全国特奥冠军，两个全国残运会冠军、一个亚军。她的这些成就也是对其教育理想的充分彰显。

此外，“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1]。教育与国家、社会具有紧密的联系。中国教育家群体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肩负着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时代使命[20]。有爱，心里才有责任，肩上才有使命[21]。教师A1到哈萨克斯坦担任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正值中哈双方教师换届的关键时期。担负着国家使命的她尽职尽责，一切从零开始，将自身优势发挥到极致。开设各种特色课程，开展多项文化活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成效。即使高强度的工作使她患病，她还是放心不下学生，坚持回到工作岗位，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在她的努力下，两国之间关系更加密切，她的教育热忱在此刻具象化了。

2.躬行实践

作为教育家精神深化的实践路径与具象载体，躬行实践是主范畴层面的关键要素，是将内在初心信念转化为外在教育行动的动态过程，具体涵盖“主体认同”与“实践生成”两个相互支撑的初始范畴。其中，“主体认同”为实践提供内在心理与情感支撑，“实践生成”为精神深化提供行动路径与优化机制，推动教育家精神从抽象信念走向具体实践。教育家精神不是虚无缥缈的，更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在实践中锻造出来的[22]。“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23]134坚守教育一线，能直面真实教学现场与学生发展需求，要“敢入未开化的边疆”[24]113。而实践出真知是推动教育理论落地的关键。“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呈现、表达和传承，需要广大教师在教书育人和社会担当的具体实践中体现出来。”[25]教师A6作为一线物理老师，在进行教学创新的过程中始终亲力亲为，为了保证每次试验的安全可靠，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反复推敲打磨，亲自一次次实践直到完美呈现。这正是马克思所倡导的“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26]127。他还常常走出学校，将精心设计的物理实验带进乡村，给革命老区的孩子们带去同样精彩的体验。8年来，他始终坚持课堂教学，为科技馆义务服务，举办科普讲座和培训活动。这些丰富的一线经验，加之今后始终恪守实践出真知的信念，为他今后持续服务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提供了有力支撑。

3.精神传承

“精神传承”涵盖“支撑强化”与“精神外

化”两个初始范畴。“支撑强化”对应“支持体系”“社会认同”“主体韧性”三类属，构成教师成长的多元支持体系：外部层面包括团队协作、社会支持、政策支持等制度与资源保障，以及家长感谢支持、学生感恩回馈、大众认可等社会反馈；内部层面体现为教师迎接挑战、直面质疑、不惧挫折的主体韧性，内外协同，为教育家精神的坚守提供稳定保障。“为人师，立中国之‘道’，终身弘道不辍。”[27]例如，社会认同对教师来说是一种外部动力，意味着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教育成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这有助于增强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家长认可是指教师的工作获得家长认同，是搭建家校协同育人桥梁的重要基础，能有效消除家校沟通中的认知壁垒，为共同促进学生成长凝聚合力[28]。而一些外部支持，如教学资源供给、政策保障、专业培训等可破除教师教学中的实际障碍，为优化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创造有利条件，助力教师实现专业成长与教学实践的良性推进[29]。教师A11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很多大型公益组织为她提供了帮助，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更多的孩子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政府和爱心人士的帮助使当地的教育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教师A22的职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社会各界的协同支持可以形成育人合力，推动教育实践更加高效落地。

“精神外化”对应“育人成效”与“公共担当”类属，是教育家精神的具象化表达：教师通过教学成就、从教收获等育人成效彰显精神实践成果，再以对国家社会的贡献、致力于公益等公共担当，将个体精神转化为社会价值，实现从个人坚守到社会影响的延伸，推动教育家精神的代际传递与广泛传承。教师B5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将心比心，为听障孩子谋求发展出路。当她收到家长的由衷致谢时，热泪盈眶，深切体悟到教育的价值，这份感动也激励她持续开展教育实践创新。在得到家长的肯定之后，教师B1更加坚定教育信念，体悟到班级活动的意义，这份认可激励他持续开展更为深入的教学探索。

（二）要素互动逻辑

教育家精神的生成并非各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初心信念、躬行实践与精神传承三大核心范畴，依循“触发—转化—固化”的内在逻辑逐步建构而成的完整体系。

从发展路径来看，初心信念是触发起点，承担着从外部传播到初步认同的功能，通过政策解读、榜样宣讲等形式，教育家精神理念被教师群体接收，引发情感共鸣与认知关注，推动教师从知晓精神走向理解共情，完成生成的初始启动。随后，躬行实践构成转化环节，促使外部触动的理念内化为行动自觉，将抽象信念转化为具体的教学行为与专业成长策略，实现从理念认知到行动自觉的跨越。最终，精神传承完成体系的固化与升华。教师将个体认同拓展为群体共识与育人氛围，而环境的反馈又进一步巩固个体的信念与实践，使教育家精神从个人修为升华为集体准则，形成可持续的传承机制。

教育部“教育家精神万里行”活动是促进三要素互动的重要载体。该活动通过中央主流媒体专栏、优秀教师事迹报道、微视频展播、育人故事展演等多元形式，以鲜活的一线案例、真挚的育人叙事让抽象的教育家精神可感可及，既强化了“价值召唤”的感染力，助力初心信念的快速启动，又通过跨区域实践经验分享、典型案例交流等环节，为教师的“实践生成”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同时，活动营造的全国性尊师重教氛围与跨主体对话平台，推动了精神传承从个体层面向社会层面延伸，深化了各要素间的互动，保障了教育家精神弘扬路径的有效运转。

四、教育家精神的实践传播与优化逻辑

在厘清教育家精神生成机理的基础上，如何有效弘扬教育家精神成为亟待探讨的实践命题。下文将聚焦“教育家精神万里行”活动，从传播特征、效果影响及优化路径3个层面分析教育家精神的传播机制。

（一）教育家精神的传播特征

在“教育家精神万里行”活动实施的过程

中,教育家精神的传播具备流动式和互动式两种特征。

流动式传播以跨地域场景的时空延伸为核心。首先,“教育家精神万里行”活动不仅覆盖北京、浙江、广东、陕西等省市,还深入教育薄弱地区和革命老区,如邻水县和雷波县等地区[30],突破了地域限制,同时也形成了优质教育资源向教育薄弱地带的输送通道。其次,该活动借助数字化手段突破了教育家精神宣传的空间限制,教育部专栏与微视频展播的同时,各省份的宣讲也在同步进行。浙江场的巡回宣讲采用“线上+线下”形式举行,千余名在杭大中小学教师代表和师范生代表在现场聆听报告,通过网络直播观看人数超 110 万,直播平台点赞数超 76 万[31]。这种流动式传播既实现了教育家精神在地理空间上的广泛覆盖,又通过对接不同区域教育需求强化了传播的有效性,让时空延伸不再是形式上的覆盖而是实质上的触达。

互动式传播聚焦多元主体的深度参与,从一种单项宣讲变为多元共创。教育部联合中央主流媒体与地方各校开设“教育家精神万里行”专栏,既集中刊发优质宣传成果,又鼓励各地拓展渠道创新形式,形成上下联动的传播矩阵,这种政府主导、学校主体的模式让精神传播不再局限于官方发声,而是融入基层教育实践。各地各校深入挖掘未获省部级以上荣誉的一线教师感人事迹,通过事迹报道、微视频等形式让普通教师成为传播主角,让受众从被动接收转为主动共鸣。“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展演活动以“省级推荐、分片区展演、全国展演”形成“省省讲、校校讲”的互动氛围,教师既是精神践行者也是传播者,在讲述与倾听中实现精神的浸润传承[32]。面向社会的“感人瞬间”短视频征集展播[33],更是打破了传统校园的边界,让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通过镜头记录与分享,在参与中深化对尊师重教的认同,最终推动教育家精神转化为全社会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二)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

主讲者叙事能力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主讲者的实践叙事能力与专业公信力方面。在叙事能力方面,优秀主讲者普遍擅长将抽象的思想与理念转化为具象的故事,教师 A21 讲述与学生一道攻坚克难,完成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 79 次失败中总结经验最终实现突破,在困境中磨炼韧性,传递教育家精神,就是要让学生们在国家需求的熔炉里充分发掘潜力、在科技强国的建设中实现人生价值这一教育信念。这样一种叙事模式,让教育家精神从一种宏大的概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实践样本[34]。在宣讲的过程中,主讲者群体主要包括 3 类人员。第一类是像教师 A3 这样的行业顶尖专家学者,他们拥有深厚的学术素养,从而奠定教育家精神传播的权威基础。第二类是像 A19 这样的教师育人楷模,他们以行业标杆的实践经历彰显教育家精神的实践价值,提供可参照的范本。第三类是像教师 A22 这样扎根基层的普通一线教师,她回乡奋斗半生的坚守经历,以平凡岗位上的责任和担当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这样的主讲者群体形成了一个能够引发公众共鸣的公信力矩阵。

内容具象化程度对传播效果也有重要影响。对理论的讲述若只停留在抽象的解释,教育家精神便会沦为空洞的口号。因此,宣讲传播活动的开展可以通过课程化、课堂化、项目化的转化路径,将教育家精神内涵进一步拆解为具体的教育情怀与实践策略,通过一系列宣讲活动,让教师群体能够清晰感知教育家精神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去实践。唯有贴合地方实际的内容才能避免“水土不服”的问题,让教育家精神与基层教育实践相契合,最大化发挥传播的实践价值。

(三)传播优化的实践路径

首先,在内容层面,要致力于实现教育家精神内涵的具象化传播。通过深入发掘一线教育工作者中真实感人的故事,可将“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等精神内核,转化为乡村教师扎根山区、特教教师关爱学生等具体可感的实践片段。“教育家精神的传播与推广既要利用传统媒体渠道,更要倚重网络传媒。”[33]这些实践片段可借助新媒体进行传播,如教育部

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媒体推出“最美教师”短片、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短视频等融媒体产品，进而形成“文字报道+视听作品”的立体化表达体系。这种转化更加有利于使教育家精神从政策文本中的概念表述，转化为基层工作者可学可鉴的实践样本。

其次，在生态构建上，应持续优化政府、学校与社会多元协同的传播体系。这一体系是实现教育家精神长效传播的核心支撑。政府层面，教育部作为统筹主体，负责顶层设计与平台搭建，通过印发专项通知明确活动框架，并联合中央主流媒体开设全国性专题栏目，同时督导各省教育行政部门落实区域规划与资源协调。学校作为教育实践主阵地，一方面，需深入挖掘本校优秀教师的鲜活事迹，借助校本课程、校内宣讲等方式，实现教育家精神的日常融入[34]；另一方面，应积极响应政府工作部署，组织教师参与区域展演、短视频创作等实践活动，搭建起政策落地与教育实践之间的纽带。社会层面需动员多元主体广泛参与[34]，中央与地方媒体可通过专题报道、平台展播扩大传播覆盖面；家长与学生可通过研学实践、故事分享等方式直接参与；国际组织亦能借助项目合作，助推精神内涵的跨文化传播。该协同体系既强化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联动，又广泛调动了媒体、公众等社会力量，推动教育家精神的传播由教育系统内部的单向宣讲，转变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价值塑造。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揭示了教育家精神“初心信念、躬行实践、精神传承”三大要素协同作用的生成机理。该精神的生成遵循“触发—转化—固化”的逻辑链条，经历从外部传播到内在认同的动态演进，最终形成一个系统连贯的解释模型。在实践传播中，“教育家精神万里行”等活动以其流动式与互动式的鲜明特征，打破了时空限制，并通过多元主体的叙事共鸣，成功将宏大的精神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的实践样本。

面向未来，教育家精神的培育与弘扬是一项需持续推动的系统工程。理论层面，应深入追溯其历史渊源，并借助量化研究与长期跟踪来验证和完善现有模型。实践层面，需进一步推动内容的具象化与传播的精准化，针对不同教师群体设计差异化路径，并将精神内核融入教师专业发展全过程。最终，应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媒体多元协同的长效支持生态[35]，使教育家精神深植于尊师重教的文化土壤，使其真正成为赋能教师、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10(2).

[2]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N].人民日报，2016-09-10(1).

[3]张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1).

[4]新华社.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 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N].人民日报，2021-04-20(1).

[5]新华社.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人民日报，2022-04-26(1).

[6]新华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N].人民日报，2023-09-10(1).

[7]冯建军.“教育家精神”：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标识性概念[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4(2)：1-5.

[8]石中英.中国的师道传统与教育家精神[J].教师发展研究，2024(2)：97-105.

[9]王文静，曾榕清.教育家精神：中华传统师道的时代传承[J].人民教育，2023(21)：48-51.

[10]杜时忠，冯建军，刘铁芳，等.笔谈：中国教育家精神与现代教育[J].现代大学教育，2024(1)：1-13+111.

[11]邬志辉，张帅帅.中国特有教育家精神的生成逻辑[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26-35.

[12]赵云飞，李方安.教育家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基于全国优秀教师“教育家精神”巡

回宣讲语料的质性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25(18):17-26.
[13]STRAUSS A & CORBIN J.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M].Newbury Park: Sage,1990.
[14]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15]GLASER B G. The grounded theory perspective: conceptualisation contrasted with description [M]. Mill Valley: Sociology Press, 2001.
[16]范涌峰.中国共产党育人初心的百年演进[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1(4):1-8.
[17]魏峰.阅读教育经典 养成教育信念[J].教育科学研究,2010(11):77-78.
[18]吴潜涛.正确理解理想信念的科学含义[J].教学与研究,2011(4):5-9.
[19]邬志辉,王苏平.新时代如何弘扬教育家精神[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1-7+14.
[20]于维涛.中国特色教育家精神及其哲学基础[J].教师教育研究,2023(5):1-9.
[21]张福平,邬志辉.论中国教育家精神的时代价值[J].学术探索,2025(5):142-150.
[22]成尚荣.教育家精神蕴含的原理性、规律性探讨[J].课程·教材·教法,2024(2):7-8.
[23]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4]陶行知.第一流的教育家[M]//方明.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25]于维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重要论述: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与实践机理[J].中国教育学刊,2024(9):1-6.
[2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7]朱旭东,胡扬邦.教育家“胸怀天下”精神释析:缘起、内涵及路径[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5(3):9-16+27.
[28]杨茂庆,伍辉燕.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博弈困境与纾解[J].现代教育管理,2025(3):31-42.
[29]赵巍.从教师到教育家:教育家精神的历史演进与培育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25(11):99-106.
[30]人民网.教育家精神万里行|走进“彝乡”[EB/OL].(2025-05-08)[2025-11-28].http://sc.people.com.cn/n2/2025/0508/c345167-41221285.html.
[3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巡回宣讲走进浙江[EB/OL].(2024-03-04)[2025-11-28].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2024/2024_zt06/xhxj/xhxj_gd_55912/202404/t20240424_1127331.html.
[3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启动“教育家精神万里行”活动[EB/OL].(2025-05-20)[2025-11-28].https://hudong.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505/t20250520_1191339.html.
[33]唐庆华.教育家精神对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与传播路径——基于话语分析的视角[J].教育与职业,2024(2):98-104.
[34]岳潇,卢黎歌.教育家精神的生成逻辑与弘扬路径[J].思想教育研究,2023(11):38-43.
[35]李沛丽,郭涛,屈鑫涛.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治理现代化:机理、困境与方略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5(8):43-53.

(责任编辑 师 语)

哲学教育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的价值、困境与对策*

李　骏　郑晓瑞

（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　要]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哲学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石，对确立科学世界观、培育理性思维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至关重要。当前哲学教育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中存在各学段教育目标缺乏有效衔接、小初内容隐形缺位、跨学段师资协同教学能力不足、教学评价机制功利化等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系统观念，构建从感性启蒙到理性自觉的螺旋上升内容体系，探索“理例融合”“导悟契合”“思辨相生”教学实施范式，打造“内修外联”的高哲学素养师资队伍，并建立科学严谨的一体化评价机制。

[关键词]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哲学教育；　价值；　困境；　对策

[中图分类号]　G4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5-0092-08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22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其高质量发展是国家富强的基础支撑。“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既要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也要激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培养其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2]哲学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滋养创新思维与辩证精神的源头活水，其教育价值在育人体系中愈发凸显。

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将其视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手段。在思政课中，哲学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石，承担着培育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本体论功能，因而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当前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存在着学段壁垒森严、内容机械重复、目标层级错位等问题，使哲学教育的大中小学衔接与一体化教育呈现出碎片化、断层化的特点，严重制约了育人实效的提升。产生这一问题的缘由，在于施教者对于哲学教育在不同学段的功能定位等缺乏系统性认知，不能有效厘清哲学思维从感性直观到理性抽象的演进逻辑。

一、哲学教育在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的核心价值

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中，哲学教育并不只是单一的知识模块，而是贯穿育人全过程的逻辑主线与精神内核。

*[基金项目]　南京财经大学改革发展研究重点课题“中华美育精神浸润高校师德建设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XGFB2202502）。

[收稿日期]　2026-03-07

[作者简介]　李　骏，女，江苏张家港人，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
郑晓瑞，女，河南濮阳人，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它不仅承担着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学功能，更在深层次上发挥着确立科学世界观、锻造时代所需理性思维、构建循序渐进育人链条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价值。

（一）铸魂之本：确立科学世界观的“总开关”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而哲学则是讲道理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3]30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推进大中小学哲学教育一体化，将经典理论与前沿问题紧密相结合，为大中小学生准确把握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全方位地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和认识自身提供了新的视角，切实发挥“铸魂”之本[4]的重要作用。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系统化的、理论化的世界观。世界观的形成不是单纯的“自我建构”，而是由感性经验到理性认知不断跃升的结果。青少年时期是思维发展的关键期，如果缺乏系统哲学思维的介入，其对世界的认知极易停留在碎片化、表面化的常识层面，甚至受到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等错误思潮的侵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了这把总钥匙，再来看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误、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作出正确判断、作出正确选择。”[5]173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通过阐释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帮助学生打破狭隘的个人经验视域，从宏观的历史规律和微观的社会存在中定位自我。正是这种从感性直观到理性思维的飞跃，构造出了学生真学、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的前提。

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哲学教育不仅是“解释世界”的学问，更是“改变世界”的工具。在思政课的育人过程中，哲学教育通过矛盾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核心方法，传授给学生认识复杂社会现象的思维工具。当学生面对多元社会思潮的激荡以及人生际遇的起伏时，便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透过现象观其本质，明确主流与支流，从而在复杂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这种将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的过程，也是将“铸魂”由观念形态走向实践形态的关键环节。

（二）时代之唤：应对认知挑战与培养时代新人的内在要求

哲学提供的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它包含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等多种思维方式。这一多元的思维方式为青少年应对认知挑战、培养时代新人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在全媒体时代下，多种文化观念与价值思想在网络空间相互交融，正在隐蔽地消解主流价值观。同时，又因缺乏系统的逻辑训练与批判性思维，部分青少年易陷入盲从、偏激或虚无的认知陷阱之中。哲学教育自身具有批判性与反思性的特质，可以训练学生进行逻辑推演与价值判断，从而帮助学生建立起思想的“防火墙”，使其具备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在多元文化激荡中坚守主流价值阵地。对于这种“免疫”功能的实现，是课堂中单纯的知识灌输所无法替代的。

“积极、正确的思想舆论不发展壮大，消极、错误的言论观点就会肆虐泛滥。”[3]357对于时代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认知问题，必须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和理论的学习与指导。哲学思维本质上是反思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在大中小学各学段，通过循序渐进的哲学训练，可以推动学生以全面、联系、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同时激发其探索未知、质疑现状的勇气与智慧。这种思维能力的培养，不仅关乎思政课的教学质量，更关乎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也是培养具备创新精神时代新人的必然选择。

（三）一体之基：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循序渐进育人链条的“金钥匙”

哲学是学问中的学问，哲学教育是教育中的教育。哲学教育既是一种认知教育，又是一种方法论教育，它是思政课的灵魂与核心。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人的认识过程是“实

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循环,表现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这一规律与青少年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高度契合,二者为思政课一体化内容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心理学与教育学依据。而螺旋上升的过程实际由“概念结构化”与“理解情境化”的交互协同来推动[6],哲学教育要在遵循青少年认知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构建起从生活哲理的感性渗透到基本原理的理性建构、再到立场观点方法实践运用的螺旋上升体系。同时,引导学生在思维从形象向抽象的进阶中,依次解决“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做”的认知课题,实现育人目标的层次性跨越,同时哲学教育天然的层级性,也有效避免了“小学讲太深、大学讲太浅”的目标倒置现象。

二、思政课哲学教育一体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尽管哲学教育在理论层面被赋予了铸魂育人的核心使命,但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现实推进中,其落地实施仍面临深层结构性阻滞。这种阻滞不仅表现为各学段教育目标的断层,更深刻地反映在课程内容的隐性缺失、师资力量的专业局限以及评价体系的导向偏差等方面,极大制约了哲学教育育人功能的有效发挥。

(一)各学段哲学教育目标缺乏梯度与有效衔接

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作为开创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的重要途径,能够保证人才培养的政治方向、推进新时代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进而统整资源形成育人合力[7]。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3]277,这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实践遵循。在遵循认知规律的前提下,构建层次分明、逐级递进的育人目标,本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核心要义。然而,审视当前的课程方案,哲学教育目标的设定呈现出明显的“分层”与“倒置”的特征,与循序渐进的育人初衷相背离。

我国基础教育实行“六三三”学制,既承袭了1922年学制改革的历史积淀,亦契合皮亚杰等人提出的身心发展阶段理论。小初高的学段划分是依据学生不同阶段的身心特征,旨在实施针对性教育以促进学生发展[8]。雅斯贝尔斯认为,一切认知都是在经验与思考的合一中实现的,经验与思考,二者缺一不可[9]89。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感性体验向理性认知升华的过程,而小学与初中阶段本应是学生从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关键时期,理应进入哲学思维启蒙的阶段,从而推进学生完成从感性经验到浅层哲学思考的跃升。但现实情况是,小初阶段的课程目标多侧重于道德规范的行为养成与法律常识的普及,缺乏显性的哲学思维培育指标。这种目标的设定,导致基础教育阶段的哲学教育处于自发、零散状态,错失了思维培育的最佳窗口。

确然,前置目标的缺位必会引发后续学段的连锁反应。高中阶段被迫在“零起点”的状态下承担起构建哲学知识体系的重任,在有限课时内进行高密度的哲学概念灌输,容易造成学生的认知负荷过重;而大学阶段又因学生基础参差不齐,对哲学体系的理解大多容易表层化,往往陷入低水平重复的理论识记,难以深入哲学本身方法论的高阶探讨。各学段目标之间缺乏纵向的贯通与横向的协调,未能形成“感性直观—理性建构—实践运用”的螺旋上升链条,导致哲学教育呈现出“断层式”的结构性矛盾,严重削弱了其整体的育人效能。

(二)小初阶段哲学内容的隐形缺位

小学和初中作为义务教育学段,是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起步时期。小学与初中阶段的教育教学目标各有侧重,即小学阶段的思政课主要以道德法律启蒙和行为习惯养成为主,旨在培养健康人格;初中阶段则侧重于对社会、他人及道德法律的认知,帮助学生理解权利义务并形成社会协作能力[10],但二者在哲学教育内容的实质呈现上,却都陷入了“隐形缺位”的困境。现行教材多以生活叙事为主线,小学阶段多为行为规范的单向规范约束,忽视了规范背后的伦理逻辑;初中段则

局限于社会现象的经验认知,缺乏对权利义务关系的辩证审视。这种课程内容的编排使得辩证思维、矛盾观点等哲学智慧被淹没在具体的道德说教之中,未能转化为显性的思维训练。哲学教育也由此停留于表面的生活常识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深度与思维张力,致使育人链条在关键的基础教育环节失去了坚实的哲学支撑。

依据认知发展阶段理论,教育要以学生认知发展的限度为依据,教材内容的编排也应该呈现螺旋式上升,旨在通过循序渐进的认知过程帮助学生完成认知结构的科学建构,而非单纯增加知识量[11]。然而,哲学教育内容在小初阶段的隐形缺位,打破了这一连续性进程,致使育人链条出现衔接断层。学生在进入高中阶段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由于缺乏前置性的概念铺垫与思维训练,面临较大的认知跨度。这种"断层式"的内容安排,不仅违背了循序渐进的认知规律,也阻碍了学生认知结构的完善,使其极易产生畏难情绪或陷入机械学习的学习困境。同时,这也阻碍了哲学教育对思维产生启蒙作用,进而削弱了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逻辑连贯性与整体育人实效。

(三)跨学段教师的哲学素养匮乏与协同教学能力不足

教师是课程实施的主体,其专业素养直接影响着教育的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2]186然而,当前基础教育阶段的师资构成与哲学教育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的错位。小学与初中思政课教师中,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哲学专业背景的比例相对较低,大量教师多毕业于中文、历史、教育学等非思政专业。这种学科背景的差异虽然丰富了人文素养,却导致了哲学"本体性知识"的匮乏。在面对教材中隐含的辩证法、认识论等哲学命题时,非专业背景的教师往往容易回避深层次的哲学探讨,时常将丰富的哲学意蕴简化为单一的道德训诫。这种因教师专业局限导致的教学"浅表化",易对学生哲学思维的早期萌芽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此外,学段间的体制壁垒也加剧了师资队伍之间的割裂。受制于行政管理体制与分段评价机制的束缚,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之间缺乏常态化的纵向沟通与横向协作,将"守好一段渠"变成了"只守一段渠",迫使学生思想成长过程被割裂[13]。这常表现为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往往对高等教育的理论进阶需求缺乏清晰认知,而高校教师亦普遍不熟悉基础教育的内容基础与学情特点。而这种双向的信息不对称,带来了教学内容的低水平重复与纵向断层的现象,同时也消解了哲学教育应有的逻辑递进性,使得哲学教育难以形成全学段贯通的育人合力。

(四)评价方式的知识化倾向与思维过程考察的缺失

2025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其中做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深化教育评价改革"[14]的重要部署。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的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15],从而影响着教学实施的走向。然而,当前的思政课评价体系仍深受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呈现出鲜明的"知识化"倾向。这种倾向导致评价方式过分依赖量化指标与结果导向,将哲学教育的丰富内涵窄化为概念的记忆、原理的背诵与标准化试题的解答。

各学段并非孤立存在,必须服务于思政教育整体贯通的系统性本质,不能因划分阶段而忽视整体贯通的系统性本质[16]。但在具体实践中,评价手段却陷入"唯学段"的分割怪圈,各学段评价"各自为政",缺乏对思维进阶的一体化考量。小学阶段往往因缺乏科学标准而以主观印象替代思维评价;中学阶段则在唯分数论导向下,将鲜活的哲学思辨异化为僵化的答题模板,过分倚重纸笔测试而忽视了学生深层思想道德的生成。

哲学教育对于学生批判性思维、逻辑推演以及价值辨析能力的培养,往往具有内隐性与动态性,难以通过直观的量化工具进行测量。现行评价体系忽视了学生个体价值的生成发

展,缺乏对思维过程的动态追踪与有效评估。这种“重结果轻过程、重知识轻思维”的评价导向,实质上异化了哲学教育的本质功能,也忽视了学生个体价值的生成发展,并且这种过度依赖直观量化手段,只会使教学评价陷入固化范式之窠臼,使得评价沦为形式化检验的工具[16]。它不仅掩盖了哲学教育在思维培育方面的深层价值,更反向刺激了各学段教学的短期化行为,使得学生习惯于被动接受标准答案,丧失了主动质疑与批判反思的动力,严重背离了一体化建设中循序渐进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初衷。

三、大中小学思政课哲学教育一体化建设的策略

破解当前大中小学思政课中哲学教育面临的多重现实困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内容体系、教学范式、师资队伍与评价机制的一体化协同建设,进而构建全学段贯通、螺旋式上升的哲学教育发展新格局。

(一)构建螺旋上升的一体化内容体系

课程内容是育人目标的载体,解决“教什么”的问题更是实现哲学教育一体化的逻辑起点。缺乏顶层设计的整体规划,也是当前哲学教育存在“断层”与“重复”现象的原因。因此,构建纵向衔接的内容体系,结合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与螺旋式上升的课程理念,打破学段壁垒,从而精准定位各学段教材内容的坐标,实现知识形态从感性经验到理性体系的渐进式跨越。

1.小学阶段:在生活感悟中进行哲学启蒙

任何哲学理论问题都源于社会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任何现实问题也都深层地蕴含着哲学理论问题。儿童时期是智力发展的黄金时期,童年期间如果能够获得良好的知识教育和思维训练,对于未来人生的发展至关重要[17]。该阶段课程内容的构建不应追求显性的概念定义,而应采取“隐性渗透”策略,将哲学元素隐匿于生活叙事之中。以统编教材《道德与法治》为例,一年级上册“我是小学生啦”一课,表面上是入学适应教育,实则隐含了“主观能动性适应环境”的朴素哲理;四年级上册“为父母分担”主题不仅是孝亲教育,更隐含了“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初步启蒙。因此课程内容编排应深挖生活故事蕴含的哲学意蕴,依托对话、研讨等互动形式,引导学生在具象情境中感悟“公平”“诚实”等概念,从而在叙事体验中强化价值判断能力,切实发挥哲学教育的育人功能。

2.初中阶段:在经验体验中积累哲理常识

初中阶段学生抽象逻辑思维开始萌芽,自我意识与社会认知显著增强。内容构建需从小学的“个体生活”拓展至“社会公共生活”,通过经验反思积累哲理常识。例如,七年级下册“青春的证明”单元中,“行己有耻”“止于至善”等内容不仅是道德要求,也涉及“知行关系”的哲学探讨;九年级上册“富强与创新”单元,通过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引导学生初步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发展规律。这一阶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重点在于引导学生透过社会现象看本质,推进“感性直观”到“经验反思”的过渡。

3.高中阶段:在理论常识中搭建哲学知识框架

高中阶段是哲学素养培养的关键期,在内容编排上更应注重摆脱碎片化的常识介绍,承担起“理论深化”的重任。哲学并非人们生活经验的简单总结,若仅停留于讲故事、吟诗词来进行哲学教育,难以支撑起高阶思维的培养[18]。相较于小学的感性启蒙以及初中的体验认知,高中阶段应依托必修四“哲学与文化”,进行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教材通过“探究世界的本质”“思想方法与创新意识”等单元,系统阐释物质与意识、联系与发展等核心范畴,构建起唯物辩证法的逻辑框架。教学重点应转向严谨的逻辑推演,训练学生运用矛盾分析法、联系发展观点剖析现实问题,解决“知其所以然”的问题,从而完成哲学素养培养链条中最为关键的理论升华。

4.大学阶段:在理论深度中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方法

“育人”的根本目标在于“铸魂”,“铸魂”的核心在于坚定理想信念,大学阶段便是哲学

教育的升华期。内容编排依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不应是对高中知识的简单重复，而应聚焦原理的深究与价值上的内化。例如，教材第一章“世界的物质性及发展规律”不再是仅仅停留在“物质定义”的记忆，而是深入探讨物质存在方式的哲学内涵；第二章“实践与认识及其发展规律”中，要多引导学生研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经典文本，深刻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法论意义。大学阶段重点在于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复杂社会问题，实现从“知识体系”向“信仰体系”的跃升。

（二）探索“双结合”的教学实施范式

课程内容的衔接为一体化建设提供了静态基础，而教学实施则是将内容运转为育人效能的关键。应着力改进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与思维路径，从而实现哲学教育的深度育人效果。

1.理与例：抽象原理与生活表征的深度融合

哲学理论有些具有较高的抽象性，教学上应注意将理论与示例相融合，但这并非简单的“举例说明”，而是要在平常生活中挖掘其背后的哲学意蕴。在低学段，侧重“以例说理”，用生活上的直观形象来化解理论的晦涩；在高学段，侧重“以理析例”，用理论深度分析复杂的现实情景。以高中必修四“哲学与文化”为例，在讲解“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难点时，教师不应仅停留在教材定义上，也可引入初中八年级下册“理解权利义务”中“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作为铺垫，引导学生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当下的社会热点。通过“理论生活化”与“生活理论化”的双向互动，破除学生的认知障碍，增强哲学理论的解释力与亲和力。

2.导与悟：教师价值引领与学生主体体悟的契合

哲学教育本质上是对话而非独白，是一个交互性的场域。教师不应以“独角戏”的形式对学生进行单纯的理论灌输，可依托教材的“探究与分享”等栏目，与学生积极进行交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思考力。教科书中的活动设置只有转化为教学的具体环节，才能获得持久的解释力和生命力，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达成共识，即立足实践，通过设置认知冲突来激活学生思维[19]。例如，初中七年级上册“友谊之树常青”单元设有“竞争是否会伤害友谊”的探究话题，教师不应只是简单地给出“是”或“否”的结论，而应该利用教材中的两难情境，组织学生进行辩论，体悟其中“竞争与合作”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进而实现从感性困惑到理性认知的跨越；大学阶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中，应围绕教材中的经典命题组织研讨，如“技术是否导致人的异化”。教师作为价值引领者，通过设置认知冲突，让学生在质疑与辩驳中实现自我建构，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求索”，使哲学教育真正触及个人灵魂。

3.思与辨：从感性直观到理性思辨的思维进阶

教育应该注重培养思维而不是简单的传递知识，将哲学引入基础学校的教育意义在于能够带来更好的思维——更有逻辑、更连贯、更丰富、更成功的思维[20]。思维能力的培育也是哲学教育的本体论使命，教学过程应贯穿思与辨的纵向进阶。哲学教育也应按照认知规律来设计进阶式思维训练：从小学的形象联想，到初中的逻辑初探，再到高中的辩证思维，直至大学的批判性思维。例如，小学二年级“我们不乱扔”主题教学侧重培养规则意识；初中九年级“和谐与梦想”主题教学侧重培养家国情怀与系统思维；高中必修四“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主题教学侧重培养历史思维与批判思维。通过对复杂问题的多维度审视与逻辑论证，引导学生不只是停留于感性体验，而是进一步养成以理性来审视世界的哲学眼光，从而实现思维品质的螺旋上升。

（三）打造高哲学素养的跨学段师资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要用科学理论培养人，遵循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讲清楚、讲透彻……要高

度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21]这一重要论述不仅确立了思政课建设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原则,更为师资素养设定了“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的高位标尺。要达到这一要求,教师不能只是简单地照本宣科,而必须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与宽广的实践眼界[22]。针对当前师资队伍存在的专业背景错位、学段壁垒森严等结构性短板,需坚持“内修外联”策略,破解“本领恐慌”,提升育人实效。

1.坚持“内修”为本,夯实理论根基

教师的理论深度直接影响着哲学教育的高度。针对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哲学背景薄弱、对隐性哲学素材敏感度不足的问题,应构建职前职后一体化培养体系。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教材中蕴藏着丰富的哲学生长点,如三年级“心中的‘110’”主题教学隐含了安全与风险的辩证关系,若教师缺乏哲学视域,极易导致教学停留在表象,忽略其中的辩证理论。因此,必须对教师开展专项研修,通过经典研读与理论辅导,提升教师挖掘教材哲学意蕴的能力,确保教师能“看得到、挖得深、讲得透”,使其可以运用科学分析方法将教材内蕴的学理与哲理以具象的方式传递给学生。

2.坚持“外联”为径,打破学段壁垒

破解“各管一段”的困境,关键在于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共同体。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二者之间,应搭建跨学段“手拉手”的集体备课与研修平台,推动教师之间互听互评、互学互鉴。例如,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课堂,以“发扬斗争精神”为主题开展接力教学研讨:小学教师选取具体人物,讲述革命先烈或时代楷模“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英雄故事,侧重情感启蒙;中学教师聚焦历史事件,也可结合长征、抗美援朝等宏大叙事,分析党在危难时刻化险为夷的奋斗历程,阐明艰苦斗争的历史逻辑;大学教师则回归精神层面,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高度,系统阐释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内涵与实质,升华理论自觉。这种协同教研机制有助于小学教师了解大学的理论高度,大学教师熟悉中小学的实践基础,从而削减学段隔阂,利于实现育人链条的有效衔接。

总之,提升思政课教师的素养,不仅是推进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助力广大教师实现从“教书匠”向“大先生”跨越的必由之路。这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需要我们保持定力、久久为功,以扎实的行动筑牢思政课建设的坚强基石。

(四)建立科学严谨的一体化评价机制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四种评价”方式,即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其目的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坚持问题导向,健全综合评价,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引导教学回归育人本位[15]。

不同学段评价内容应体现螺旋上升的特征,中小学处于义务教育的阶段,此阶段的评价更应注重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以更应改变过去单纯考察概念记忆、原理背诵的知识导向评价,确立以哲学核心素养为导向的评价标准。将哲学理论如批判性思维、逻辑推理能力、价值辨析能力纳入评价范畴,关注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运用哲学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高中阶段评价不应仅限于默写“矛盾的定义”,而更应该注意学生能否运用该原理分析教材中的“中美关系”案例,扩展个人的视野;大学阶段评价更应突出学科特色、学术质量和贡献,在哲学理论上应侧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原著观点的现实迁移能力。

增值评价与过程性评价是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评价改革的重要实践。其中,增值评价通过考量学生思想品德从起点到终点的纵向净增量,激发评价机制的发展性功能[16]。具体实施中,应建立学生思维成长档案袋,记录学生在课堂辩论、社会调研中的表现与思维轨迹,关注哲学素养发展的“增量”而非单纯的知识“存量”。同时,依托小学教

材中的“活动园”、初中教材中的“探究与分享”等栏目引入表现性评价，丰富评价维度。这种多元评价机制不仅可以客观反映学习成果，更为一体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反馈调节，确保哲学教育过程不偏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青少年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21]。因此，更需要持续深化对哲学教育规律的探索，打破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壁垒，凝聚合力，切实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转化为学生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思想武器，使其担负起立德树人的时代使命。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2]习近平.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J].求是，2023(18)：4-9.

[3]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4]程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4(2)：316-327+374.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6]翟贤亮.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生成逻辑与范式转型[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10)：123-131.

[7]李海萍.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内涵、意义与实践路径[J].湖南社会科学，2024(5)：144-150.

[8]杨清.学校贯通课程建设：为何、是何与如何[J].中国教育学刊，2025(12)：81-89.

[9]卡尔·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童可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10]余华，涂雪莲.关于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效衔接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2019(9)：62-67.

[11]金丽，周国宝.认知发展理论与素质教育[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6)：123-127.

[12]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13]于意.基于内容、方法及评价视角的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5(20)：39-42.

[14]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N].人民日报，2025-01-20(1).

[15]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N].人民日报，2020-10-14(1).

[16]张肖，曲方宁，谭皓.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评价改革的价值、问题与实践[J].江苏高教，2026(1)：99-105.

[17]刘学良.儿童何以做哲学——对儿童哲学教育模式的反思[J].教育学报，2023(4)：3-15.

[18]张汉云，刘宏佺.用哲学思维教哲学——反思中学哲学教育[J].课程·教材·教法，2007(8)：55-59.

[19]付有能.普通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的活动设计及其教学实施[J].课程·教材·教法，2021(5)：74-81.

[20]LIPMAN M.Philosophy goes to School[M].Second Edition.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8.

[21]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4-16.

[22]杨晓慧.提升思政课教师素养的主要成就、基本经验和理论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24(6)：14-18.

(责任编辑　陈晓姿)

儒家君子人格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学段目标体系的转化逻辑与实践路径*

王萍萍　马平平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扬州　225000）

[摘　要]　探寻贯通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学段目标体系的核心文化纽带，对于其一体化建设兼具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儒家君子人格具有“可学可致”的普适性、“仁、义、礼”的结构性与“修己安人”的实践性，与《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四个重在”的学段要求高度契合，为破解一体化衔接难题提供文化支撑。转化过程中，需遵循“分层递进、螺旋上升”逻辑理路，恪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原则，确保融合的科学性与价值引领的正确性。实践层面，统筹推进数智赋能激活传统课程资源、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跨学段教研锻造融合型师资等举措，推动君子人格从传统文脉资源向思政课育人实效转化，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可行路径。

[关键词]　君子人格；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学段目标；　转化逻辑；　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G641.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5-0100-08

学段目标体系的构建，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课程目标的核心内容之一[1]，集中回应了“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根本问题在层次性与阶段性上的具体要求。《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的“四个重在”明确提出：小学阶段重在“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初中阶段重在“打牢学生的思想基础”，高中阶段重在“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大学阶段重在“增强学生的使命担当”[2]。审视当前一体化建设的现状，各学段目标之间仍存在衔接断层的隐忧，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缺乏一个贯穿始终、逻辑合理的核心文化纽带与主题线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校思政课建设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3]。学界研究也表明，儒家君子人格所蕴含的“仁智勇”思想内涵，以及“修己安人”等实践品格，对构建“立德树人”新格局、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启示[4][5]。基于此，以君子人格作为贯通四学段的核心文化纽带，深入探究其经由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融入学段目标体系的具体理路，不仅是破解学段目标碎片化难题的可行路径，也是落实“四个重在”改革要求、实现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应有之义。

一、为何融入：君子人格与学段目标的契合基础

君子人格之所以能够深度融入大中小学

*[基金项目]　扬州大学教学改革研究课题“中华儒学经典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案例资源库研究”（项目编号：YZUJX-2025-D1）。

[收稿日期]　2026-05-18

[作者简介]　王萍萍，女，江苏泰州人，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马平平，女，安徽阜阳人，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学段目标体系，核心在于其与“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课程建设规律高度适配，并与各学段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深度契合。这种多维度的契合性，不仅为破解学段目标衔接断层提供了文化资源，更是构建一体化育人体系不可或缺的逻辑纽带。

（一）君子人格的层次定位有效回应全体性育人导向

儒家建构了层次分明、类型多元的理想人格，涵盖“圣人”“君子”“大丈夫”“大人”等核心范畴。其中，“圣人”是最高理想人格，具有鲜明的超越性色彩。孔子对此有明确界定：“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时，孔子直言：“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可见，在孔子看来，圣人是“内圣外王”的典范，即便尧舜这样的上古圣王也难以完全企及。孟荀虽从不同的人性论出发，分别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的乐观论断，但其本质是提出道德主体的内在潜能，而非指现实层面的普遍可达性，尚未能满足思政课“面向全体学生”的全体性育人导向。另外，“大丈夫”“大人”是孟子对理想人格的精神气质补充。“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公下》）。这两个理想人格更侧重在特定情境下君子人格的极致彰显，而非面向日常道德养成的普适性人格范式，而且内涵相对单一，难以适配各学段循序渐进的育人梯度。

相较之下，“君子”是儒家理想人格体系中兼具价值崇高性与现实可达性的中间层次。“君子”一词在西周时期是对贵族阶层的身份称谓，象征着宗法制度下的社会地位。孔子的重要贡献在于将其转变为包含道德品性的人格称谓。自此，用德性、人性而不是身份地位来描述理想人格，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特质，也是儒家将理想人格从贵族走向平民的关键节点。在儒家看来，德性的培养，人格的塑造不是属于少数精英的，也无需天赋异禀或惊天功业。孔子提出“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实现仁德的重要条件在于主观意愿。孟子则进一步将德性根基归于人皆有之的“四端”，提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确认君子之德是内在善端扩而充之的自然结果。荀子虽主“性恶”，但仍将君子作为“化性起伪”的普遍目标，提出“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明确“学”是普通人通向君子的共同路径。这种“可学、可致、可推广”的普适性特征，恰好契合大中小学思政课学段目标“面向全体学生”的育人导向，为“下学上达”提供了现实路径，也为全学段提供了统一且可分层的抓手。

（二）君子人格的内涵结构与“四个重在”的阶段性侧重相对应

君子人格的内涵是具有结构性的，主要涵盖道德情感上的“仁”、价值准则上的“义”，以及行为规范上的“礼”，这种结构恰好可以为“四个重在”各学段的培养目标要求提供参考意义和价值。首先，立德树人作为思政课的根本任务，贯穿大中小学各学段的核心目标始终。在儒家看来，君子就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引领者，是道德生活的表率。儒家将尊崇德性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中庸》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尊崇德性是君子的首要任务。孔子也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这句话奠定了君子人格的基调，即不沉溺于口腹之欲和安逸享乐，而是将精力倾注于勤勉做事与谨言慎行之中。在不同学段，虽对“德”的培育深度、实践广度要求逐层递进，但均可以“君子之德”为共同文化参照。这也正是以“德”为核心的君子之学，能够成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核心文化纽带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仁”是君子内在的德性内核，那么“义”则是君子外在的价值准绳与行事正

路,可以成为贯穿各学段价值引领的核心标尺,与《实施方案》提出的“知对错”“辨善恶”“知荣辱”等价值辨别要求高度契合。对于“义”的内涵,孟子的阐发尤为深刻,他认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心,失去了仁,人便不成其为人;义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大路,偏离了义,人便迷失了方向。作为君子,必须在价值选择上坚定不移地顺从、遵从这条“义”的正路,做合乎理、止于善的事,而绝不能为谋取私利而背弃道义。因此,“义”在行为准则意义上,针对各学段价值认知的深度、实践的要求,不仅规定了“做什么”,更规定了“如何做”,确保了行为的正当性与崇高性,为一体化建设提供了统一的价值坐标。

最后,“礼”在君子人格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维系社会秩序、规范人际行为的根本大法,与《实施方案》提出的“讲规则、尊法治”等要求,以及“初步形成规则意识”“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的学段目标高度契合。“礼”主要具有四重意蕴:一是秩序等级义,二是恭敬庄重义,三是谦让不争义,四是制度规则义[6]102。孔子从君子个体规范意义,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为君子设定了严格的行为边界。荀子则将“礼”提升到了关乎国家治乱、法律本源的高度,提出:“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荀子·王制》)没有君子的倡导与践行,礼义便无从谈起;没有礼义的规范与约束,社会便无法安定。这种以“礼”为遵循的规范体系,恰好适配各学段的培育梯度,从小学侧重“守规矩”的习惯养成,到中学侧重“懂敬畏”“明边界”的理性认知,再到大学侧重“行规范”的社会担当,各学段虽践行要求不同,但均以“礼”为共同行为参照,避免了行为规范培育的碎片化。

(三)君子人格养成规律与学段目标进阶逻辑具有一致性

君子人格的养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层层递进逻辑序列。“修”是君子养成的手段和方法,修养的目的也是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首先是“修己以敬”,通过身心修养来得到别人的尊敬,所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一个有修养的人可化解和消除心中的怨恨,是人际关系和谐的保证;进而推己及人,“修己以安人”则是使周围的人安乐祥和;最终极的目标是“修己以安百姓”,即让天下黎民安身立命。因此,儒家不仅独善其身,还追求兼济天下,个体的“明明德”之后应该指向“亲民”“仁民爱物”。对他人的关怀,社会的责任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旨趣,深刻揭示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路,表明君子的价值追求与政治追求是高度统一的。

这一养成手段和规律与《实施方案》提出的“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学段目标进阶逻辑高度同频。二者在逻辑理路上都以内外修养为基础,遵循从个体完善到社会担当再到国家责任的递进规律,从“修己以敬”的个体道德奠基,到“修己以安人”的社会责任萌发,再到“修己以安百姓”的国家使命担当,并非割裂的层级划分,而是同一人格养成的不同阶段,各学段均需涵盖三阶要素,仅在培育深度、实践广度存在差异,也契合学生从感性认知到理性认同、从自我完善到社会担当的成长规律,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深层的规律性支撑。这种规律层面的内在一致性,正是君子人格能够成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核心文化纽带的关键依据。

二、如何转化:君子人格学段转化的理论逻辑和基本原则

君子人格作为一种历史意义的人格目标,其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教育的培养目标。要实现其从传统资源到现代教育的创造性转化,必须遵循严谨的理论逻辑与价值原则。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搬运,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依据学生认知规律与教育规律进行的科学重构。

（一）转化过程的逻辑遵循

君子人格作为一种结构复杂、内涵丰富的文化资源，其转化逻辑要以学生认知发展规律为基础，对接《实施方案》“四个重在”的学段要求，构建从小学段“君子务本”（《论语·学而》）的道德情感启蒙，到初中段“居仁由义”的道德自觉，再到高中段“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的道德理性，最终达到大学段“修己以安百姓”的使命担当进阶逻辑进路。

1.小学段：“君子务本”的道德情感启蒙

小学阶段“重在启蒙道德情感”。《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课程标准》”）提出“启蒙道德情感，养成基本文明行为习惯，建立爱亲敬长、爱集体、爱家乡的情感”要求[7]14。因此，在具体融入转化过程中，需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为基点，将“务本”的“本”具象化为儿童可感知的日常道德根基，实现君子人格的道德情感启蒙。

小学阶段的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认知需要通过情景转化和直观呈现。君子人格的转化逻辑需生动形象地融入课程内容，通过讲故事的方法，从抽象的理论转向具体的要求，以达到学生的情感触动。比如，在“礼”的层面，教师可以对接一年级上册“我是小学生啦”与“我们的校园”单元，将“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礼者，所以正身也”（《荀子·修身》）转化为“理好红领巾、坐姿端正、礼貌问好”的可操作准则。在“仁”的层面，则可对接一年级上册“我爱我家”单元，以“孝弟为仁本”引导儿童从帮父母递拖鞋、给长辈端水杯的具象行为中萌发对父母的孝敬、长辈的尊重等道德情感。在“义”的层面，则可延伸至二年级上册“我们的班级”与“我们的公共生活”单元，将义利之辨简化为排队不插队、值日生做好值日工作等是非观念的萌芽。

2.初中段：“居仁由义”的道德自觉

初中学段“重在打牢思想基础”，《课程标准》也提出“打牢思想基础，增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强化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认同”要求。因此，对于自我意识显著觉醒，并渴望得到价值归属和情感认同的初中生来说，需从小学的行为规训转向双向的情感互动与道德自觉。

具体来说，在七年级“友谊的天空”单元，以“君子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引导学生辨析哥们义气与君子之交的边界，明确好朋友犯错及时提醒才是真正的“义”；在八年级“勇担社会责任”单元，以“君子成人之美”（《论语·颜渊》）引导学生在集体生活中主动帮扶同伴、参与集体活动，萌发集体荣誉感的价值自觉；在九年级“建设美好生活”单元，结合校园欺凌、网络谣言等现实情境，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明确“守义”是对规则的敬畏、对他人的尊重。

3.高中段：“义之与比”的道德理性

高中学段对应《实施方案》“重在提升政治素养”目标，紧扣《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提升政治素养，理解党的创新理论，增强法治意识，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8]6的要求。高中学生抽象思维趋于成熟，转化逻辑需超越情感层面，进入理性辨析层面。

在具体教学转化中，可依托三门必修课程展开。在“哲学与文化”模块，引导学生运用唯物史观剖析君子人格的双重性，汲取“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的内核，将“君子喻于义”转化为集体主义取向；同时将“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的传统秩序价值转化为现代“明礼诚信”的公德要求。在“经济与社会”模块，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展开议题研讨，辨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当代价值，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义利统一”的逻辑，引导学生认识“合法逐利”与“社会责任”的辩证关系。在“政治与法治”模块，以“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荀子·君道》）切入，阐释“礼法合一”的现代治理意义，引导学生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逻辑，在班

级议事、校园提案中践行理性包容的有序参与。

4.大学段:“修己以安百姓”的使命担当

大学学段对应《实施方案》“重在增强使命担当”目标,是君子人格完成创造性转化的升华阶段与实践落点。大学阶段是学生从“校园人”向“社会人”过渡的关键期,转化逻辑需在前期“认知—认同—思辨”的基础上,进一步落脚于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担当,实现从理论认知到实践践行的质的跃升。因此,大学思政课需要紧扣“时代新人”的培养,从个体修养与家国担当双重维度发力,讲深讲透君子人格与时代新人的内在契合性及转化路径。

在个体修养层面,可对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绪论“担当复兴大任 成就时代新人”,以“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引导学生树立全面发展的成才观,摒弃“重技能轻德行”的功利倾向,立志成长为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在“遵守道德规范 锤炼道德品格”一章,可引用“君子慎独”(《礼记·中庸》),结合网络空间言行规范、学术诚信建设等现实议题,培育学生在无人监督情况下的道德自律。

在家国担当层面,一方面,可对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关内容,明确传统“修己以安百姓”的阶级局限性,其本质是服务于封建统治,当代转化需将其重塑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另一方面,在核心课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中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章节,需以“以人民为中心”为标尺,将君子“安百姓”的使命重塑为“为人民服务”的青年责任。在“建设文化强国”章节中,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重铸君子人格的当代定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安排”专题中,可与“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的家国一体逻辑对接,汲取王阳明“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传习录》)的博大胸怀,从“安百姓”到“安天下”,完成君子人格从封建宗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跃升。这一转化需批判性审视传统天下观中的华夷之辨,赋予其“共商共建共享”的时代内涵。

(二)转化过程中的原则遵循

有学者认为,“今天面对经典我们必须重视典籍文本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9]260。也就是说,教师应引导学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君子人格内涵等进行科学甄别、系统审视、批判继承与时代激活。

1.坚持“第二个结合”的指导原则

儒家君子人格产生于封建社会制度之下,本身具有鲜明的两重性,既有可以传承的优秀基因,同时也必须运用唯物史观开展辩证批判与科学甄别。在实际教学中,不同学段的教师应当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对君子人格中的相关内涵进行辩证分析,在尊重传统的同时,敢于进行质疑和批判。

以君子的“孝”德为例,小学阶段在讲授“黄香温席”“子路负米”等传统孝亲故事时,应着重引导学生感知父母养育之恩,同时明确爱父母不是愚昧顺从,避免将“孝”简化为独立性的消解。初中阶段可结合经典解读,引导学生理解“孝”的层次内涵,但可以将“父母在,不远游”(《论语·里仁》)等不符合时代特征的孝,延伸到对父母的共情、对集体的热爱,完成从家庭到社会的初步过渡。高中阶段对于血缘至上的“差等之爱”文化所导致的“亲亲相隐”问题等,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探讨其在现代社会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大学阶段则要完成从家庭社会到国家的转变,批判性剖析忠孝之间的伦理张力,讲清讲透“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理论内涵,方能引导学生理解“小孝孝于家,大孝忠于国”这一命题,正是对传统“移孝作忠”伦理的马克思主义改造与当代呈现。

2.推动君子人格的创新性发展

儒家文化在经历多次冲击与挑战后,现代社会对于值得汲取的本质精神标准问题有所分歧。有学者指出,若仅以“科学”与“民主”作为唯一标尺来衡量,实际上是片面的[9]66。事实上,君子人格中蕴含的“仁、义、礼”统一结构、“修己以安百姓”等价值追求,它们所蕴含的往往是超越时代与地域的文化智慧。因此,今天我们汲取的,正是君子人格相关理论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10]的文化精髓。因此,在融入过程中,必须避免将后世附会的一些误读看成君子人格的本真精神,同时摒弃以西方话语裁剪中国文化的片面做法,确保教学内容的纯正性与思想性。

具体到教学实践中,需做好君子人格从少数精英到全体学生的现代性转化,回归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的人民立场。《论语》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反映了封建社会将高尚道德追求限定为少数精英特权的历史事实。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立德树人面向全体学生,君子的道德追求应成为全体学生的共同要求。因此,在学段育人目标的设计中,应避免将君子人格异化为学生筛选与分层工具,应充分体现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则与立德树人“一个都不能少”的全体性育人导向。同时,不应将传统道德理想异化为强制性的外在规训,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尊重学生价值追求的多元化趋势,鼓励学生在“仁、义、礼”的核心框架下,结合自身实际,追求独立判断与自由思想,真正让君子人格成为时代新人培育的源头活水。

三、何以实现:学段目标一体化的实践路径

君子人格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学段目标体系的关键在于落地,数智赋能夯实技术支撑,双课联动拓展育人场域,师资贯通强化主体保障,三者互为支撑、缺一不可。唯其如此,君子人格才能从文化资源真正转化为学段目标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新时代思政课内涵式发展提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力支撑。

(一)数智赋能:构建沉浸式教学新范式

数智时代为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转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政课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与吸引力”[11]。君子人格产生于先秦语境,数智技术可以有效帮助学生开展文本阅读与实现情感共鸣。一方面,资源一体化是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基础性工程。针对当前儒学资源融入教学存在的碎片化、随意化问题,亟需构建集原典阐释、现代阐释、教学转化于一体的数字化资源库。在内容架构上,不仅要收录《论语》《孟子》等儒家原典中关于君子的核心论述,建立精准的文献数据库;更要着重建设“现代阐释库”与“教学案例库”,将学术界关于“第二个结合”、君子人格现代转化的前沿成果转化为教学素材,并收录各学段将君子人格融入思政课的成功微课、教学设计及实践案例。在呈现方式上,资源库应支持按学段、按主题进行智能检索与推送,为一线教师提供从文本考证到课堂落地的全链条学术支撑,确保融合教学建立在扎实的学理基础之上。

另一方面,数智赋能要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思维特点定制差异化方案。小学阶段侧重利用 AR 动画、高清短视频等技术手段,将“孔融让梨”“程门立雪”等经典故事可视化、具象化,降低认知门槛,让学生在生动形象的视听体验中萌发对君子品格的亲切感。初中阶段则可以开发交互式绘本与小游戏,让学生在虚拟情境中协助主人公做出符合“义”的选择,并通过即时反馈强化其对价值规范的认同。高中阶段可以利用 AI 技术生成“义利之辩”“群己之辩”等开放性议题的仿真情境,引导学生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多角度分析,培养其理性思辨能力与价值判断能力。大学阶段侧重鼓励学生运用“微短剧”“Vlog”等新媒体形式,对君子人格进行现代化解读与二次创作,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阐释的深度学习跃迁。

（二）双课联动：构建贯通式实践育人机制

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将“新时代实践教育”置于突出位置，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12]，这为儒学经典的融合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实践场域。君子人格本质上就具有实践性品格，其生命力不仅仅在于课堂上的解读，还在于在实践中实现“知行合一”的精神。因此，贯彻“大思政课”理念，构建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贯通式育人体系，实现“学—思—行”的完整闭环，是君子人格融入学段目标体系的关键环节。

总的来说，实践教学的核心任务是将君子人格“仁、义、礼”的内涵具象化为可操作、可感知的序列化实践项目。在小学阶段，实践教学应侧重“礼”的行为规训，依托传统文化主题活动，开展仪式教育，将抽象的“礼”转化为具体的仪表规范与交往礼仪，实现君子人格的初级具象化演绎。进入初中阶段，实践重心应转向“仁”的情感认同，结合志愿服务常态化要求，组织开展社区服务、集体环境维护等活动，让学生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过程中，体悟君子“推己及人”的道德情怀。高中阶段是学生理性思维与公共参与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实践设计应聚焦“义”的理性思辨与制度认同，在真实的公共生活场景中培育理性精神与责任担当。大学阶段作为人才培养的出口，实践路径必须落脚于“行”的深化与使命担当，紧密结合“三下乡”社会实践、大学生“西部计划”及各类基层治理实习项目，组建实践团队。鼓励学生在驻村调研、政策宣讲、技术推广等实干中，直面中国社会现实，将“修己以安百姓”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行动，完成从君子之德到家国担当的飞跃。

同时，要围绕君子人格育人主题，积极开发整合各类优质实践教育资源，进一步拓展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的合作共建，打通文化资源到育人场景的转化路径，在真实场域中形成对君子内涵与君子行为的情感共鸣和思想认同。为切实保障实践育人的实效，要不断完善“导入导学—参与体验—研讨总结”的完整实践环节，以不同学段学生喜闻乐见的多元形式展示实践学习成果，全过程严把实践育人方向，切实避免实践教育出现泛娱乐化、走过场的形式化问题，真正推动君子人格从抽象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学生日用而不觉的行动自觉。

（三）师资贯通：打造融合型教学梯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教师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13]。君子人格融入教学涉及儒学原典甄别、唯物史观批判、学段梯度设计三重专业能力，这对当前主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的思政教师队伍提出了跨学科挑战。因此，必须以大中小学贯通为抓手，重建师资培养机制，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扎实、文化视野开阔的融合型师资梯队。

实现大中小学师资的有效衔接，首要任务是打破学段壁垒，建立纵向手拉手的集体备课常态化机制。这要求深刻把握思政课课程目标纵向相邻关系理论，组建由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初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大学思政课教师以及文史哲专业教师共同参与的跨学段备课联合体，定期开展协同教研活动，重点研讨同一命题在不同学段的梯度呈现方式，精准定位各学段的认知起点与价值目标，有效避免教学内容的简单重复，确保君子人格教育沿着螺旋上升的路径有序推进。

同时，完善融合教学的评价激励制度是激发师资内生动力的根本保障。应将相关教案设计、教学改革与科研成果纳入思政课教师职称评审与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鼓励教师主编或参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教学指导用书，为跨学段教学提供规范性参考。设立相关主题的思政金课培育项目，对入选课程给予专项建设经费与数智资源开发支持，激励教师投身教学改革实践。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与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师开展君子人格融合教学的积极性与创造

性，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综上所述，儒家君子人格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其“仁、义、礼”的结构性内涵与“修己安人”的实践品格，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了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也为破解当前学段目标衔接断层问题提供了文化维度的可借鉴方案。当然，在这一融入转化过程中，尚需进一步细化各学段的教学评价指标，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总之，只有坚持守正创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君子人格进行科学的扬弃与转化，才能真正使其成为涵养时代新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源头活水，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参 考 文 献]

[1]陈大文，张志静.论大中小学思政课课程目标一体化的相邻关系[J].思想教育研究，2026(1)：79-86.

[2]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Z].2020-12-18.

[3]习近平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N].人民日报，2024-05-12(1).

[4]凌海青.中国传统君子人格对培养时代新人的启示[J].思想理论教育，2020(6)：54-58.

[5]王刚，李爽.儒家君子人格理念涵养时代新人培育的三重理路[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2)：14-23.

[6]徐小跃.君子之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

[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 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9]陈来.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10]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 年 9 月 24 日)[N].人民日报，2014-09-25(2).

[11]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6 年 12 月 8 日)[N].人民日报，2016-12-19(1).

[12]吴丹.如何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N].人民日报，2026-01-23(1).

[13]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EB/OL].求是网.(2020-08-31)[2026-04-16].https://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8/31/c_1126430247.htm.

(责任编辑　陈晓姿)

泛终端时代学术期刊品牌传播力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

杨雅婕

（苏州大学期刊中心，江苏苏州　215006）

[摘　要]　泛终端时代学术期刊正经历传播范式和知识生产机制的系统性变革，品牌传播力成为衡量其学术影响与社会价值的重要指标。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整合多重数据资料，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形成品牌传播力的基础理论模型，并结合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构建学术期刊品牌传播评价体系。研究发现，选题策划、刊群协同、活动运营以及媒体融合构成了期刊品牌传播力的核心驱动要素，通过内容引领、资源整合、生态构建和渠道协同作用于品牌传播效能。为了提高学术期刊的品牌传播力，应以学术质量为关键夯实品牌根基，采用差异化策略塑造独特的品牌辨识度，聚焦特色栏目，依靠技术赋能完成内容创新，整合多平台资源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及用户生态模式，同时促进学术共同体开展联合策划活动，实现跨界资源合作与传播效能增长。

[关键词]　学术期刊；　品牌传播力；　评价体系；　媒体融合

[中图分类号]　G23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5-0108-08

在智能终端多元化与学术传播数字化深度融合的泛终端时代，多模态的学术表达冲破传统文本边界，通过移动端、智能屏等终端实现了学术成果的及时触达。泛终端技术的普遍应用，不仅丰富了学术内容的传播载体，而且重构了学术期刊与受众的互动逻辑。202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了《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强调要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探索网络优先出版、数据出版、增强出版、全媒体出版等新型出版模式[1]。学术期刊正经历传播范式与知识生产机制的系统性变革。一方面，多元终端场景要求学术期刊突破“内容生产者”的单一角色，向“学术品牌运营者”转型；另一方面，数字化传播展现出的碎片化属性，促使学术期刊以品牌为核心集聚分散的学术资源。品牌不仅是学术期刊专业性、权威性的体现，更是汇聚学术共同体、强化期刊学术辨识度的关键载体。学术期刊的品牌传播力成为衡量其学术影响力与社会价值的重要指标。

近年来，学术期刊品牌建设的相关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多维度的发展态势，研究内容涉及品牌塑造、品牌定位、品牌影响力等多个范畴，为学术期刊品牌的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学者们大多认同，栏目建设是推动学术期刊品牌影响力提升的重要抓手[2]，依靠创新的品牌视觉呈现、拓展期刊智库内容、营造会议集群、开展品牌社群营销推广活动等途径，可以有效提升学术期刊的品牌价值[3-5]。从实践层面看，学术期刊若想提升期刊的品牌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媒体融合背景下学术期刊品牌价值评估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21SJA1370）。

[收稿日期]　2025-12-11

[作者简介]　杨雅婕，女，山东济南人，苏州大学期刊中心副编审，博士。

效应,必须充分整合学术资源、开展多元化品牌活动,深度融合多媒体渠道[6-7]。精品内容作为品牌价值的关键核心,借助创新的传播矩阵与多元化的品牌活动,可进一步增强其品牌传播效力[8]。此外,在品牌建设中,学术共同体的联合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充分挖掘学术共同体的潜力,凝聚品牌建设的合力,能够助力学术期刊品牌的持续发展与升级[9-10]。另有研究者基于多元化的品牌理论,对学术期刊品牌价值的构成和评估展开了研究。王红君等从活动理论的视角,对学术期刊品牌经营中价值共创者角色、品牌化意识以及期刊质量控制等因素进行了剖析[11]。江波等依托消费者品牌接受模型,从知名度、权威度、认同度、忠诚度四个维度入手,构建了学术期刊品牌价值评估模型[9]。刘婵君等在构建期刊品牌影响力提升策略框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品牌传播力对学术期刊发展的意义[12]。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把重点放在学术期刊品牌建设策略的理论构建层面,缺少结合量化评价的综合考量。这不仅限制了对学术期刊品牌价值的深入分析,也阻碍了对其品牌价值变化的准确认知和有效跟踪。

本研究旨在构建学术期刊品牌传播力的量化评估体系,全面剖析品牌传播力对学术期刊影响力的作用原理,并结合泛终端时代知识的传播特性,构建提升学术期刊品牌传播力的策略框架,为学术期刊品牌的建设提供全新的观察视角和实践参考。

一、学术期刊品牌传播力的理论模型构建

品牌传播力的理论构建以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作为核心方法。扎根理论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强调从经验数据中依靠自下而上的途径构建理论,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性编码层层提取概念与范畴,最终形成基于扎根数据的理论模型。

本研究数据主要取自对学术共同体成员实施的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办刊报告、选题策划方案、媒体融合案例,以及参与式观察学术期刊专题策划全流程中收集的文本资料等。对上述多重数据资料实施逐级编码,厘清概念、范畴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形成学术期刊品牌传播力的基础理论范式。在开放式编码阶段,对原始资料进行逐句拆解,提取了67个初始概念,如“选题前瞻性”“联合策划”等,并通过聚类分析归纳出具体子范畴,如“选题策划”“流程管控”“特色栏目”“学术动态”“名人效应”“意见领袖”“公关活动”“学术交流”“媒体融合”“采编网站”“转载摘编”等17个。运用主轴编码,将这些子范畴连接成6个主范畴,并初步确定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通过持续比较选择性编码确定品牌传播力的3个核心范畴,分别是“内涵建设”“个性特色”和“营销能力”。

基于基础理论模型,我们采用德尔菲法邀请专家对研究设立的框架、维度进行评估和判断。本研究共选取专家12名(包含期刊主编4名,栏目编辑5名,新闻传播学教授3名),各位专家均对学术期刊有较高的熟悉度。专家权威度均值为0.87,大于0.70,符合德尔菲法要求。德尔菲法专家访谈分两部分,一为专家对初设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评估,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法;二为开放作答,请专家对初始指标体系的框架、维度以及在初稿中未能涉及的项目进行修改和补充。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共经历了两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整合专家意见,对部分评价指标做了进一步调整:(1)删除变异系数大于0.25的指标。如“流程管控”是一种标准规范,是刊物基本的,也是所有刊物共性的东西,不属于“内涵建设”,且“流程管控”指标下的“工作标准”与“审校程序”的变异系数均大于0.25,故将其删除。(2)进一步厘清指标边界。例如,“内涵建设”与“个性特色”这两大指标有交叉之处,根据这两个指标的内涵与侧重进行微调,使得“内涵建设”更突出期刊品牌建设时共性和普遍的内在积淀策略,而“个性特色”多偏重于期刊独创性、个性化的维度。(3)对部分指标进行了合并归类。例如,“学术动态”作为“组稿约稿”和“选题策划”的前提,包含在两项活动之中,不必单列,故将其删除。另外,邀请知名专家和学者撰文或让其担任学报编委、顾问或

栏目主持人,可以归到“特色栏目”之中,故将“名人效应”项删除,同时将“名刊名栏”归到“特色栏目”中。(4)扩大了某些指标的内涵。例如,“选题策划”对应的内涵陈述为“针对理论与现实重大的热点、难点问题组织一批观点鲜明、资料翔实的高质量文章,引领学术前沿和实践走向”,根据专家意见,将在陈述中更加强调文章栏目的质量,弱化对于热点追踪之类的陈述,从而减少打分偏差。(5)修改了部分范畴的表述。如,为了更加明晰“活动策划”下的两个子范畴“公关活动”和“学术交流”,对两个范畴的名称和内涵均做了适当调整,将“公关活动”改为“活动运营”,将“学术交流”改为“社群搭建”,相应主范畴的名称改为“渠道策划”;为了避免主范畴用词的重复,将“形象策划”改为“刊物形象”。经过两轮修订,评价指标合适程度的均值得分 $M_{第一轮}=4.33$,$M_{第二轮}=4.43$,均小于 4.50(5 级量表的第 90 百分位数),最终得出的重要性指标均值全部大于 3,变异系数均小于 0.25,满分率超过 50%,显示指标的重要性较高,专家的集中程度较好。

基于专家意见,对学术期刊品牌传播力基础理论模型进行修订,修订后的评估体系包含 3 个核心范畴,6 个主范畴以及 12 个对应范畴,范畴结构及内涵见表 1。

表 1　学术期刊品牌传播力特征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核心范畴	主范畴	对应范畴	范畴内涵
内涵建设（0.404）	内容建构（0.228）	选题策划（0.143）	围绕国家重大问题和当代现实关切,组织观点鲜明、资料翔实的高质量文章,通过精准选题引领学术方向
		行业认知（0.085）	精准把握期刊及相关学术领域信息,明确本期刊的行业定位,为其内容策划提供方向性指导
	学术共建（0.176）	科研合作（0.074）	通过资源共享和联合策划等方式,与本学科重要科研机构搭建合作平台,提升内容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刊群协同（0.102）	联合多家学术期刊与多元学术主体,通过跨界合作组稿、选稿、编辑、刊发,形成内容合力,扩大学术影响力
个性特色（0.267）	办刊理念（0.145）	独特视野（0.039）	关注学科前沿与交叉领域,通过差异化内容吸引特定领域的读者,形成独特的品牌特质
		特色栏目（0.106）	打造主题鲜明、内容聚焦的常设栏目,通过体系化的内容输出,构建专业且具吸引力的内容矩阵,增强读者的阅读黏性
	刊物形象（0.122）	门户载体（0.063）	建立美观、便捷的学术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门户载体,优化用户体验,提升内容的可及性和互动性
		识别系统（0.059）	借助刊名、色彩、标志、封面、版式、字体等视觉元素,构建完整的视觉表达体系,增强品牌辨识度,形成稳定的读者认知
营销能力（0.329）	渠道策划（0.171）	活动运营（0.119）	通过策划学术报告、调研会、专题座谈会、研讨会等活动,聚集核心作者和学者,拓宽内容的辐射范围
		社群搭建（0.052）	打破编辑、学者、作者、评价者和传播者的边界,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如微信群、留言板等),促进信息流动,提升内容的流动性
	学术推广（0.158）	媒体融合（0.137）	通过跨媒介联动,整合纸媒、网站、论坛、微信公众号等多平台资源,扩大内容的覆盖范围
		传播增效（0.021）	利用多媒介、多平台的二次传播效应,吸引更多读者和作者关注,扩大内容影响力,形成持续的学术辐射

二、学术期刊品牌传播力的特征评价指标体系

为了减少评价者对主观经验的依赖，本研究在德尔菲法基础上，结合层次分析法（AHP）进行了分层决策分析。通过设计《学术期刊品牌传播力特征权重指标专家问卷》，邀请参与前期德尔菲法访谈的12位专家对各项指标进行两两比较评价，从而构建层次分析法所需的判断矩阵，并严格进行一致性检验（Consistency Ratio，CR<0.1）。利用层次分析软件yaahp（12.10）进行模型运算，最终计算出学术期刊品牌传播力模型的量化权重指标。品牌传播力评价核心范畴权重为：$W_{核心}=(0.404,0.267,0.329)^T$，即代表内涵建设、个性特色，营销能力对于期刊品牌价值评估的贡献量分别为0.404，0.267，0.329。通过构造判断矩阵可得主范畴和对应范畴的因子权重，如$W_{内涵}=(0.228,0.176)^T$，其他主范畴和对应范畴权重的具体数值见表1。

由表1的数据结果可知，“选题策划”“刊群协同”“活动运营”与“媒体融合”总权重超过整体传播力的50%，是学术期刊品牌传播力提升的四大核心驱动要素。“选题策划”作为“内容建构”的核心环节，占比达62.7%，精准的选题让期刊可以聚焦学术前沿，引领学术发展方向，借助对行业的深度洞察确定期刊定位可明显提升学术水平。“学术共建”中“刊群协同”占比为58.0%，期刊可整合多方面资源，与科研团队、期刊等展开合作，形成强大的学术联合力量，深化科研选题成果，进一步提高学术影响力。“营销能力”中“活动运营”的占比为36.1%，期刊通过举办学术会议、研讨会等，吸引核心作者以及学者参与其中，构建学术生态圈，促进学术互动。“媒体融合”在“营销能力”里的占比为41.6%，多媒体渠道的联通，可促进学术内容的跨平台传播，助力学术成果触达更广泛的受众。基于上述量化数据模型指标的权重，不仅能够识别期刊品牌传播力构建的核心要素，对品牌传播力进行客观评估，还能进一步深化对期刊品牌传播力优化策略的探讨。

三、基于评估模型的学术期刊品牌传播力提升策略

根据学术期刊品牌传播力评估模型中维度的权重分布和作用机制，可以进一步明晰学术期刊品牌传播力提升的可行路径与作用靶点。下文将从如何筑牢学术根基、构建特色化差异识别机制、激活全媒体生态系统及推动学术共同体合作等维度，探索具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期刊品牌传播力提升策略。

（一）通过内涵建设筑牢品牌传播的内容基石

评估模型里权重最高的核心范畴是“内涵建设”（0.404），是期刊品牌传播的内核驱力，决定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及竞争力，需从“内容建构”和“学术共建”两方面考量。

在“内容建构”中，“选题策划”（0.143）是核心抓手。学术期刊需要在选题策划时保持敏锐的洞察力，精准把握学科前沿走向，关注国内外学术热点与新兴领域，诸如人工智能、生态哲学等。这些领域的前沿成果，不仅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焦点，而且对社会经济和人类未来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期刊通过设置专题栏目或创办特刊，集中展示前沿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引起更多学术关注，产生焦点性的学术传播效果。在选题策划阶段，如何精准把握学术热点，可借鉴国际期刊的成功经验。例如，国际学术成果的传播正转向“预印本+专题出版”模式。预印本平台的兴起让研究成果得以迅速发布，而专题出版为这些研究成果提供了深度展示的机会。期刊可借助与预印本平台的合作，结合研究成果的评论数、下载量及被引量等数据，直观把握其受关注度和影响力，从而锁定热点研究方向。预印本平台与数据库、学术搜索引擎的连接（如arXiv与SemanticScholar、DBLP等的关联），也能让期刊更全面地了解同一研究在不同载体上的传播轨迹，为选题策划提供更进一步的参考[13]。此外，通过抓住关键时间点，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与需求策划专题，能够吸引高学术水平专家

独立或深度参与撰稿,显著提升期刊的被引频次、下载量、新媒体阅读量与转载量。如,2020年10月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科技导报》杂志于次月即展开了关于“十四五”规划的专题策划。2021年2月中旬,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后,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布之前,“‘十四五’建言”专题见刊。该专题文章篇均下载量比其前后4期的平均值高出78.96%,微信公众号最高阅读量达14 000余次,并有文章被人民网科技频道等权威媒体转载,还引发多所高校、研究院所及部分省科技厅专门组织学习讨论[14]。在注重选题策划的同时,也需强化“行业认知”(0.085),关注同学科领域期刊的研究热点、学科发展报告等,明确刊物自身在学术生态中的定位,避免内容的同质化。

“学术共建”是增强期刊传播效果的关键手段。首先,期刊可联合同领域或交叉学科的多家期刊,发挥“刊群协同”(0.102)的优势。“刊群协同”促使学术期刊整合学术共同体资源突破单一期刊资源局限,广泛汇聚不同领域、多元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以实现内涵建设与传播效能双重提升。如《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自2014年起与《法学论坛》《求是学刊》《学习与探索》等国内高水平学术期刊共同主办“新兴(新型)权利与法治中国”学术研讨会,多家学术期刊出版机构通过“选题策划—征文审稿—会议研讨—选稿刊发”形成联合策划合作模式,实现刊界与学界的跨界交流。与会专家凭借深厚的学术积累与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围绕前沿学术问题深入研讨,同时也汇集了大量高质量、前瞻性学术论文。从传播推广角度看,联合策划模式整合了各方丰富的传播资源(如利用各个期刊的微信公众号推文、官网主页新闻等)对学术研讨活动进行集中宣传,打破单一期刊传播渠道有限的困境,增加了学术会议现场及其后续论文发布动态的曝光度。另外,与重点实验室、智库等科研机构的“科研合作”(0.074)也不可或缺。期刊通过与学术机构、高校、科研单位等的合作,共同筹划选题、组稿约稿,借助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专题论坛等活动整合高水平学术资源,可以扩大期刊在学术界的影响力。邀请业界权威学者组建编委会及审稿团队,既可保证稿件的学术质量,又能增强期刊的学术声誉。期刊通过与数据平台合作,构建数据存储与共享体系,为学术研究提供服务支持。如与Elsevier、Springer等国际知名出版集团开展合作,借助其全球化的学术资源及传播网络,可提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通过国际联合组稿汇聚更多国际优秀稿件,也是期刊全球学术话语权提升的重要路径。

(二)塑造期刊个性提升学术期刊品牌辨识度

在当前学术期刊数量激增、同质化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个性特色”(0.267)是期刊区别于同类刊物的关键,打造主题鲜明的“特色栏目”(0.106)已成为期刊提升品牌辨识度与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路径。

特色栏目不仅是期刊内容定位的集中体现,更是其吸引特定领域学者、凝聚学术资源、扩大社会影响力的重要载体。通过聚焦特定研究方向,期刊能够形成差异化优势,在众多刊物中脱颖而出,为品牌传播奠定坚实基础。例如,《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通过栏目调整形成“三农”底色,依靠专题策划提升“三农”成色,借助出版专刊凸显“三农”亮点,从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成长为边界清楚、专注“三农”问题研究的特色刊物[15]。这一转型过程生动展现了特色栏目对期刊品牌重塑的推动作用,使期刊的研究领域更加聚焦,学术特色更加鲜明,不仅精准对接了相关研究群体的需求,也在社会层面强化了其在“三农”研究领域的专业形象,从而有效提升了期刊的品牌认知度和学术影响力。另外,经过长期培育的特色栏目能够形成强大的

学术凝聚力,吸引领域内顶尖学者的参与,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进而通过成果的广泛传播扩大期刊的品牌辐射范围。例如,《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重点打造的品牌栏目“明清近代诗文研究”,发端于1984年创建的特色栏目“清诗研究”,始终聚焦明清近代诗文研究的理论前沿,成为海内外明清近代诗文研究的权威学术平台。该栏目先后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中共中央宣传部首次设立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并汇集了一批资深的研究学者,刊发文章备受学界和刊界的关注,并多次被权威二次文摘转载、摘编,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

另外,针对泛终端时代信息多样化的传播途径,可以从多维度强化学术期刊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学术数据库等终端的个性特征,进一步提升期刊的品牌辨识度。目前,绝大多数学术期刊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并通过公众号的推送功能将刊文内容直接送达订阅者的移动端,极大提升了学术内容的传播速度和覆盖范围。但是,学术期刊刊发文章专业的术语和深度的论证,与公众号碎片化阅读场景并不兼容,过长的文章更容易导致读者的阅读疲劳。通过公众号内容形式的创新可以有效凸显期刊的个性,扩宽传播的受众群体。心理学专业期刊《心理学报》鼓励作者将原本晦涩的学术论文,转变成科普性质的公众号推文,用通俗的语言解读心理学的学术成果,并结合社会热点推出。例如,《心理学报》在2023年曾发表一篇题为《命运天定还是逆天改命:探索劣势者成见的“傀儡效应”与“黑马效应”》的论文。该文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深入探讨了劣势者在面对外界成见时所表现出的“傀儡效应”与“黑马效应”,并揭示了个体在这两种效应影响下的职业发展轨迹[16]。2025年初,正值《哪吒》电影广受欢迎之际,《心理学报》公众号以《我命由我不由天:职场人如何以哪吒之志直面不被看好的前景》为题,将原本较为学术性和晦涩的论述,转化为极具感染力和话题性的表达,重新呈现了该论文的内容,从而成功吸引了众多读者的关注,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三)提升营销能力扩大学术期刊品牌辐射范围

“营销能力”范畴中“活动运营”(0.119)与“媒体融合”(0.137)是提升传播效能的关键。数字化时代学术传播方式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单向传播模式无法满足日益多元化的学术需求,构建全媒体矩阵、激活用户参与动能、借助技术创新赋能智能传播成为学术期刊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必然选择。

“活动运营”通过策划并实施一系列学术活动,提升学术期刊的行业知名度,助力期刊品牌建设。如,中国激光杂志社打造的系列学术活动,包含学术会议、交流座谈、行业评选、行业培训四大类别,形成了体系化的活动运营模式,并以“光学前沿”作为品牌形象并成功注册了商标[17]。其中,多层次学术会议体系,涵盖全学科的综合性会议(如全国激光技术与光电子学学术会议)和“刊会融合”的细分领域会议,通过专家深度参与和会务服务优化,扩大行业影响力并吸纳高质量成果。形式多样的交流座谈,通过“走进实验室”、学者座谈会及“光学大家”等访谈栏目,丰富了期刊内容生态。“中国光学十大进展”等标志性行业评选活动,在提升期刊公信力的同时,也为学术人才的发掘与培养提供了助力。行业培训则依托丰富的专家资源,开设光学相关精品课程,在实现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兼顾了经济效益。此类学术活动的系统运营,不仅显著提升了期刊的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还在学科学术交流、人才培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构建学术社区、推动学科发展及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活动运营也可围绕期刊发展的重要节点展开,多方面增加刊物的曝光度,吸引更多的目标受众。例如,2023年《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在创刊十周年之际,开展了一系列多维度、跨领域的学术活动:联合教育和心理学领域专业期刊,召开“教育期刊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和“心理学学

术期刊高质量发展论坛”;聚焦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主办“高等教育青年学者论坛”;汇集创刊十年来的国内外教育学家访谈内容,出版《温故而知新——当代教育学家访谈录》;邀请作者和专家撰写“学缘——我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纪念文章,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陆续推出。以上活动通过内容关联(围绕“创刊十周年”核心主题)、群体覆盖(涵盖作者、专家、同行业期刊等多元学术共同体)、形式互补(线上公众号推文、线下研讨会、出版物等),形成了立体的活动矩阵,既实现了短期内的集中曝光,又通过学术议题的深度研讨和情感联结的强化,持续提升了期刊在相关学科领域及学术共同体中的品牌辨识度与影响力。

实践证明,通过打破媒介壁垒,整合纸媒、网站、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等多平台资源,合理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可以实现学术期刊品牌传播效应提升。但是,泛终端时代的媒体融合不是内容跨平台的简单重复,而是要根据媒体的不同特征对刊发的内容进行差异化呈现。纸本期刊是学术内容传播的传统载体和核心,承担着学术专题组织和深度阅读的功能,通过严格、规范的编校流程为其他平台提供可靠的内容文本,是品牌学术性的基础支撑。网站与数据库是数字化检索的基础设施,其意义体现在内容的便捷获取和效率传播。微信、微博等平台可以适配碎片化阅读场景,通过“热点解读”“论文速递”等板块定期发布图文或视频信息,增强传播活性。抖音、B 站等新兴平台能将专业的内容转化成大众易懂的符号,突破专业圈层,提升期刊的公共影响力。这种多平台差异化传播的实践,也对传统编辑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其从内容加工者到全媒体学术管家的转型。编辑除了要有扎实的文字功底,还需熟练运用各种新媒体技术,掌握图片制作、音视频剪辑等软件,并熟悉不同媒体分发平台特点和操作。学术内容的传播也并非单向信息传递而是多方参与的动态过程,编辑在社群互动中更精准把握读者和作者的需求,通过建立在线社群(如微信公众号的评论区或者微信群)提升用户黏性、激活传播动能。通过参与讨论,读者和作者可以增强对刊发内容的理解和认同,由被动的内容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品牌共建者。

四、 小结

泛终端时代背景下学术期刊品牌传播力建设正经历深刻范式转型,并呈现出系统性、动态性、协同性的多维特征。基于科学评估体系与量化模型的研究显示,学术期刊品牌传播力形成机制具有结构化特征,内涵建设、个性特色和营销能力构成品牌传播力三大核心支柱,他们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共同决定数字化环境中学术期刊的影响力格局。选题策划、刊群协同、活动运营和媒体融合等关键驱动因子通过跨维度、多层次协同联动可产生显著的聚合效应,推动品牌传播力的系统性进阶。当前实践表明,学术期刊实现品牌传播力突破性发展需采用全域协同的战略导向:内涵建设维度着力强化选题策划的学术引领力和联合策划的资源整合力,通过前瞻性议题设置与跨机构协同创新持续提升内容质量;个性特色维度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在视觉识别、内容呈现和用户体验等方面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营销能力维度构建“学术活动+全媒体矩阵”的立体传播生态,实现学术价值多渠道、多形态传播。未来,学术期刊品牌传播力发展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元宇宙、AIGC 等新兴技术崛起正重塑学术传播形态与场景,虚拟学术社区、智能内容生产等创新模式将为品牌传播开辟新的可能性空间。学术期刊品牌建设需在坚守学术质量核心价值基础上,以更开放创新的姿态,在学术共同体协同支持下不断探索品牌传播力提升的新路径,通过技术创新、用户洞察与生态协同实现学术价值与传播效能的最佳平衡。

[参 考 文 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 科技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的通知[EB/OL].(2021-05-18)[2024-10-12].

https://www.nppa.gov.cn/xxgk/fdzdgknr/zcfg_210/gfxwj_215/202106/t20210623_4706.html.
[2]姬建敏.从特色到品牌: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实践路向与追求——以“总编视角”和“编辑学研究”栏目为例[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144-151+156.
[3]白娅娜,代艳玲,武英刚,等.创学术沙龙特色品牌,提升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J].编辑学报,2023(6):635-639.
[4]钱金鑫,冯长根,李生才.打造国际学术会议集群,提升科技期刊品牌影响力——以《安全与环境学报》为例[J].编辑学报,2024(1):103-107.
[5]赵文青,朱妮娜.品牌社群视角下一流学术期刊建设思考[J].中国出版,2023(18):58-62.
[6]龚蕾.传统品牌期刊出版融合发展的三重维度——以《青年文摘》现代纸书项目为例[J].中国编辑,2022(11):72-76+91.
[7]张强,姚辉,张彤.中文科技期刊品牌影响力提升实践——以《中国表面工程》为例[J].编辑学报,2023(Sup.1):102-104.
[8]关平,陆子远.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品牌建设路径[J].出版广角,2023(5):68-71.
[9]江波.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期刊品牌价值评估模型构建[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37-144+156.
[10]黎雪娟.从营销传播到价值共创——社科学术期刊品牌运营的进阶之道[J].传媒,2019(16):29-31.
[11]王红君,张锐,吴朝平,等.活动理论视角下一流学术期刊品牌经营的关键影响因素识别[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1(8):957-965.
[12]刘婵君,付佳豪,金宣谕.科技期刊品牌影响力现状与提升策略分析——以陕西省科技期刊为例[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0(11):1363-1371.
[13]张琳,郭佳宏,王晶晶,等.开放科学背景下中国预印本平台时代特征与发展路径[J].编辑学报,2025(Sup.1):162-166.
[14]王丽娜.科技期刊策划国家重大战略专题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4(3):292-297.
[15]李凌,宋雪飞,刘浩,等.以特色立刊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写在《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20周年之际[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175-182.
[16]马君,朱梦霆.命运天定还是逆天改命:探索劣势者成见的“傀儡效应”与“黑马效应”[J].心理学报,2023(6):1029-1048.
[17]何卓铭,杨悦,吕璇,等.运营学术活动助力科技期刊品牌建设——以中国激光杂志社为例[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4(10):1434-1441.

(责任编辑　陈晓姿)

学术期刊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徐楷森

（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江苏南京　210093）

[摘　要]　党的二十大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党的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亟须学术期刊发挥其学术传播与创新引领功能。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研究阐释中，学术期刊作为理论传播者，需构建“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的转化桥梁；作为实践记录者，需推动“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的良性循环；作为创新引领者，需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共同体。当前，学术期刊刊发的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文章，总体围绕历史逻辑、实践路径、理论建构与国际比较展开，呈现出多维度、深层次、跨学科的基本特点。具体表现为：研究主题覆盖全面，聚焦核心议题；研究热点紧扣时代需求，回应战略关切；研究视角注重多学科交叉，强调本土化与主体性；研究方法注重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突出实践导向；研究价值注重服务国家战略，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落地。然而，学术期刊在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方面，也暴露出办刊理念与机制的深层矛盾，以及知识服务能力与学术生态适应性不足等根本性问题。因此，亟须在办刊理念、评审机制、开放性、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学术共同体支持及国际传播等方面加以改进。尤其是通过选题策划精准化、栏目设置创新化、传播方式融合化、队伍建设专业化等方式，推动学术期刊成为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主阵地与强引擎。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学术期刊；　理论阐释；　实践路径；　传播效能

[中图分类号]　G23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5-0116-08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提出的重要论断，一经提出便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学术期刊也刊发了大量学习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2]。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1]22-23。这既突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历史迷思，也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方案。与此同时，在处理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问题上，需要避免过多

*[基金项目]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编辑学研究一般项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青年编辑学术素养提升与职业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YB2025047）。

[收稿日期]　2026-01-19

[作者简介]　徐楷森，男，江苏扬州人，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博士。

强调特殊性的错误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3]。总而言之,学术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热烈讨论,使得这一话题的讨论热度持续位居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领域的最前列。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核心载体、思想文化的传播阵地、理论创新的重要推手。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中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殷切期望,特别强调“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4]。学习研究宣传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办好学术期刊的应有之义。与此同时,当前学术期刊在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学习研究、宣传阐释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部分期刊选题与国家战略需求脱节;栏目设置局限于传统学科划分;传播方式依赖单一纸质媒介,难以满足理论大众化、国际化的传播要求;编辑队伍相关业务能力不足,等等。如何通过机制创新、路径优化,推动新时代高水平学术期刊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研究高地、传播枢纽与创新引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演进与学术期刊的职能定位

(一)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渊源与核心要义

历史地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缘起和理论建构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实践探索的结晶,其发展脉络可追溯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四个现代化”构想。1957 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5]760。1959 年底至 1960 年初,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概括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其内涵与当初有所不同。1963 年,周恩来在毛泽东提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6]160“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内容由此得以基本成型。1964 年,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7]483 至此,“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正式形成。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既取得了重大成绩,也遭遇了重大挫折。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明确“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小康之家”的目标。1984 年 3 月 25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明确提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8]54这一论述不仅说明“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新概念”已经形成,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道路的认知从“超越论”向“实事求是”的转折。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被称为“新概念”,关键在于其以“小康社会”为载体,将现代化目标从“抽象愿景”拉回“具体可及”的现实轨道。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不仅是一个人均指标的经济概念,更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道路的理性探索与历史自觉。在具体现实层面,中国的现代化正是按照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实践逻辑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并列式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一个不断推进和拓展的过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与本质要求,标志着这一理论的成熟与定型。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其理论演进的核心逻辑和要义就是,立足中国实际回应时代需求。一方面聚焦物质层面的追赶;另一方面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系统性目标。如果说前者以“技术追赶”为导向,那么,后者则是以“文明形态创

新”为追求,这无疑体现了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进一步跃升。在此意义上,有学者指出,作为凝聚了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富强梦想,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财富总量增长、科学技术创造的过程;作为改革开放40余年解放思想、积极探索的奋斗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成熟定型;作为超越了现今现代化理论研究的视野和现代化方案的设定,中国式现代化还是一个深刻的革命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的社会进步过程[9]。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而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则源于其理论根基的双重性。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结构运动理论以及人的自由发展学说,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必须与具体国情相结合”;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文化滋养。例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思想与“天下为公”的思想一脉相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特征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传统生态观具有高度契合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法,使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价值,又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

(二)新时代学术期刊在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的职能定位

学术期刊的职能定位是其进行理论学习研究、宣传阐释的逻辑起点。学术期刊的核心职能包括学术成果发表、学术交流促进、学术规范引领、文化传承创新等。进入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发展深入人心,不过与此同时,各种社会思潮也纷繁复杂,包括民族主义、生态主义、网络民粹主义、泛娱乐主义、消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技术决定论、国家主义,等等。学术期刊作为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在学习研究宣传、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主题宣传的功能越来越受到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的重视[10]。在此意义上,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与党中央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要求相比,与社科理论界的期待相比,学术期刊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还有一定的差距和不小的努力空间。

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研究阐释中,学术期刊需进一步强化以下三重职能:

第一,学术期刊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理论传播者,需要积极构建“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的转化桥梁。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学术圈内的讨论,更在于其能否被大众理解与认同。学术期刊需发挥“专业把关”与“话语转化”功能。一方面,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提炼理论内核;另一方面,通过通俗化表达将学术话语转化为大众话语,推动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需要把握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用学术讲政治。“用学术讲政治”的内在逻辑就是基于学术逻辑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重大决策部署进行理论阐述。用学术讲政治这一原则最早在党校系统被正式提出。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用一章对党校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提出要求。习近平指出,只有把一些重大问题从思想理论上搞清楚、弄明白了,党校教育培训才能真正做好[11]20。换言之,党校教师通过自身科研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对党的思想理论、党和政府的决策部署、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学理阐述,这是引导党员领导干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应有之义。因此,党校教师必须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党委和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此意义上,用学术讲政治更应成为学术期刊学习宣传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根本遵循。2023年,《光明日报·理论版》开设的“中国式现代化大家谈”专栏,既邀请专家学者撰写深度论文,也刊登基层干部、普通群众的实践感悟,实现了“学术性”与“通

俗性”的平衡。

第二,学术期刊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实践记录者,需要积极推动“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的良性循环。中国式现代化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学术期刊需积极引导学术界通过“田野调查”“案例研究”等方式,记录地方实践中的创新经验,例如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探索,等等,并将其升华为理论成果。2021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为浙江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明确了根本任务、标注了实践落点。浙江省努力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培育了以“杭州六小龙”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型、创新型企业,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增添了创新驱动力。学术界结合浙江近年来的探索实践,把握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重大意义、核心内涵、实践路径,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例如,《改革》杂志在 2022 年第 5 期刊发《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实践探索与模式解析》一文;在 2023 年第 2 期刊发《“共富式”金融的生成逻辑与发展取向——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例证》一文,都取得了较好反响。

第三,学术期刊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引领者,需要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深刻的理论复杂性,这表现在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多维度,因此,需要学术研究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学术期刊需通过选题策划、栏目设置、学术活动,整合高校、科研院所、智库、地方政府等多方力量,形成“理论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实践工作者”的协同创新网络,围绕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等重大问题,组织刊发有理论深度和思想穿透力的力作。例如,2022 年,《中国社会科学》聚焦新时代新发展阶段重大理论现实问题,开设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知识体系”“大变局与战略全局”“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等 11 个跨学科重点专题专栏,推出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再比如,同年,《人民论坛》杂志发布《二十大精神精要解读》特刊、《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典型案例两大课题成果。《人民论坛》是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党政类、思政类与现实问题研究类刊物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刊物,在选题上重点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创新成果,从道理、学理、哲理展开深入研究,深入理解和把握党中央提出的重大论断背后的深层逻辑,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论坛近期选题的重点方向,人民论坛从“底层逻辑”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政治逻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现实逻辑是人口规模巨大,理论逻辑是新发展理念,时代逻辑则体现在强国时代背景。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大精神精要解读》特刊广泛邀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知名权威专家学者,从理论层面全方位、多角度对包括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等党的二十大精髓要义进行立体化研究解读,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党政干部群体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等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领会。此外,《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2021—2022 国家治理创新经验典型案例》为 2021、2022 年度人民论坛“国家治理创新经验大型课题调研项目”阶段性成果。入选的《数字中国建设的红色电信创新》《数字化转型的中国一汽创新》《中国地震局定点帮扶的“永靖实践”》等 40 个高质量典型案例,总结了相关单位、部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典型经验[12]。

三、学术期刊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状况与现实挑战

学术期刊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传播与创新的关键载体,其研究阐释的实践成效关系到理论体系的学术化建构与社会化传播。系统审视学术期刊在这一领域的整体表现,既是评估当前研究质量与影响力的必要环节,也是识别深层次障碍、推动优化转型的逻辑起点。基于此,立足已有研究成果,客观呈现学术期

刊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格局，进而辨析其在理念、机制与能力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挑战，可以为后续探索提供问题导向的依据。

（一）学术期刊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状况

根据 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提供的信息，在 2021—2025 年刊发的学术论文中，标题中包含“中国式现代化”一词的论文共计 3909 篇。在学科类型方面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发文期刊包括《人民日报·理论版》（112 篇）、《人民论坛》（79 篇）、《红旗文稿》（76 篇）、《求是》（64 篇）、《马克思主义研究》（62 篇）、《光明日报·理论版》（52 篇）、《思想理论教育》（51 篇）、《思想教育研究》（49 篇）、《理论视野》（49 篇）、《思想理论教育导刊》（46 篇）、《党建》（45 篇）、《社会主义研究》（40 篇）、《贵州社会科学》（35 篇）、《中国社会科学》（30 篇）等。其中，高校学报发文量最多的是《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4 篇）。在发文年份上，2021—2023 年发文量呈迅速上升态势，其中 2021 年为 65 篇、2022 年为 494 篇，2023 年激增至 1586 篇；2024 年回落至 1223 篇，下降趋势出现；2025 年进一步降至 531 篇，相较于 2023 年下降约 66.5%。本文将从研究主题、热点、视角、方法、价值等总结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状况。总的来看，文章呈现出了多维度、深层次、跨学科的基本特点，刊发论文总体紧密围绕理论建构、实践路径、历史逻辑与国际比较展开，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基本状况。

第一，研究主题覆盖全面，聚焦核心议题。研究内容广泛覆盖理论体系、实践路径、历史演进与国际影响四大核心方向。其一，在理论体系建构方面，重点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如新质生产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基础，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主动精神等；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逻辑，如强调公平正义、人民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系统性构建，如总体秩序观的制度—文化逻辑，等等。其二，在实践路径探索方面，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如共同富裕、“双碳”目标、乡村振兴，同时关注地方实践，如西藏勒布沟、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广东制造业升级等，在经济建设方面关注数字经济、民营经济等，在政治建设方面关注全过程人民民主、政府责任伦理等，在文化建设方面关注文旅融合、文化自信等，在社会建设方面关注社区治理、人口结构等，在生态建设方面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多领域。其三，在历史逻辑梳理方面，系统梳理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历史经验及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转化。在国际视野与比较方面，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国际传播、海外话语建构以及西方式现代化的对比等。

第二，研究热点紧扣时代需求，回应战略关切。研究紧密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聚焦“全面深化改革”“新质生产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战略关键词。其中，新质生产力成为研究高频词，探讨其内涵特征、赋能路径及在现代化系统集成中的作用机制；共同富裕研究从理论逻辑到实践路径展开深度分析，强调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特征的价值；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研究关注数字技术对现代化的赋能、数字治理及数字鸿沟应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注重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突出制度优势、治理效能、实践样态以及国际比较，特别是将其与西方模式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第三，研究视角注重多学科交叉，强调本土化与主体性。学术期刊刊发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论文突破单一学科限制，形成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生态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格局，同时突出本土化与主体性。哲学与价值维度从唯物史观、历史合力论、文明观等视角，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文明性质”、对“卡夫丁峡谷”的跨越逻辑及对西方现代性困境的超越。经济学与发展维度聚焦了经济地理格局、产业体系、金融开放等，强调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社会学与治理维度关注社会治理创新、人口问题及特殊群体的现代

化参与。民族与文化维度突出了民族地区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及文化传承。

第四,研究方法注重理论与实证结合,强调实践导向。学术期刊刊发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论文既注重宏观理论阐释,也强化微观案例分析,体现学术研究的实践性与针对性。一方面,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论文以理论分析为主,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是全新人类文明形态”“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区别”等命题展开深度思辨。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论文以实证研究为主,通过田野调查、大数据分析、政策评估等方法,为理论提供实践支撑。此外,跨学科方法融合计量经济学、社会学调查、案例研究等方法。例如,基于31省市的经验证据,开展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影响与提升路径的量化分析;基于拉萨市林周县边交林乡当杰村的个案,开展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西藏乡村产业与人口素质的关系的质性研究。

第五,研究价值注重服务国家战略,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落地。研究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既深化理论认知,又为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其一,政策解读针对《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等文件,分析其对现代化的指导意义。其二,实践建言针对人口结构变动、数字鸿沟、生态治理等现实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其三,话语建构注重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升国际话语权。

(二)学术期刊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现实挑战

尽管学术期刊在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具有独特优势,但其当前实践仍存在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这种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选题策划与国家战略需求的贴合度不足。选题规划未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框架进行系统设计,缺乏对各维度内在联系的整体性分析。第二,栏目设置中传统学科划分的局限性凸显。当前学术期刊的栏目设置仍以学科为导向。这种划分方式虽有利于保持学术深度,但难以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综合性需求。以共同富裕这一选题为例,其涉及收入分配、社会公平、文化认同等多学科的研究主题,但一些期刊缺乏跨学科栏目,导致相关研究分散在不同栏目中,难以形成系统影响力。第三,传播效能中新媒体融合的深度与广度不足。尽管绝大多数学术期刊已开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但内容形式仍以“论文摘要+原文链接”的静态文本为主,缺乏对学术内容的二次加工,如短视频、数据可视化、互动问答等形式。就此而言,数字化工具应用不足,研究成果呈现形式单一,难以吸引年轻研究者和公众关注。即使是尝试过论文转短视频的学术期刊,其播放量也不尽如人意。与此同时,国际传播能力薄弱,仅有少数学术期刊有外文版或与国际期刊合作出版的经历,因而难以向世界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第四,编辑队伍的理论素养与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依赖于高素质编辑队伍。调查发现,编辑队伍中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史党建等相关学科背景或相应素养的人员较少。部分编辑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理解停留在政策的浅层次解读层面,缺乏对理论内涵的深度把握,难以在选题策划、稿件评审中发挥学术引导作用。

以上不匹配的问题直接导致学术期刊在研究阐释中面临现实挑战,不过,如果我们再深度研究就会发现,这些挑战既涉及办刊理念与机制的深层矛盾,也关乎知识服务能力与学术生态的适应性不足,可能这些才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办刊理念、知识服务、评审机制、开放性、数字化转型、资源分布、评价体系、学术共同体支持及国际传播等方面。

首先,办刊理念与知识服务的结构性矛盾。从本质上讲,期刊的办刊理念往往带有根本性的意义。不过,一些期刊在办刊理念上的片面性和短视性导致在选文上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问题,即偏好特定研究视角、范式或方法,限制了多元思想的碰撞。例如,对冷门议题和交叉研究相对忽视,导致理论创新缺乏本土根基,难以回应中国式现代化本身的复杂性。同时,过度追逐热门议题,如新质生产力、

数字经济,使得大量研究停留于现象描述,缺乏对实践的深度理论提炼,对跨学科阐释不足,阻碍了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其次,评审机制与学术生态的协同性不足。一方面,期刊的评审流程与创新需求不匹配,审稿周期长,导致新理论的研究成果延迟发布,削弱了学术时效性。例如,关于数字经济赋能现代化的前沿发现若滞后发表,可能错过政策讨论窗口,影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价值。另一方面,评审标准保守、话语单一。部分审稿人倾向于接受所谓的成熟理论,对概念、范畴、方法、知识创新持审慎态度,抑制了新理论的提出。此外,审稿透明度不足,关系稿、人情稿现象削弱了学术公正性,青年学者难以获得发表机会,影响学术生态的多样性。

再次,评价体系与学术共同体的发展错位。这一错位指的是评价指标与知识价值的偏离,即过度依赖影响因子、引用量等量化指标,忽视对社会政策制定贡献的实践价值以及积累基础理论知识的长期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共同体建设的自身不足与支持缺位,从而造成了对学术伦理的监管不足,抄袭、造假等行为破坏学术诚信,削弱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可信度,由此导致对年轻学者支持不足,特别是知名学者的圈层化发表模式挤压了青年研究者的发声空间,影响学术梯队的可持续发展。近来学界相关舆情已充分暴露这一问题。

最后,理论与实践、学术与大众的话语隔离。学术创新的最大风险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部分研究偏重于概念的推演,忽视对地方实践的深入挖掘,缺乏实证支撑,其解释力也就大打折扣,导致理论难以指导实践。

四、学术期刊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优化路径

针对学术期刊在办刊理念与机制的深层矛盾、知识服务能力与学术生态适应性不足等问题,亟须从办刊全流程入手,系统重构优化路径。选题策划、栏目设置与传播方式是学术期刊内容生产与价值传递的三个核心环节,分别对应着研究方向的引领、学术议题的聚合和理论成果的扩散。因此,有必要以选题策划精准化锚定国家战略需求,以栏目设置创新化打破学科壁垒,以传播方式融合化提升理论触达效能,三者协同发力,推动学术期刊成为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主阵地与强引擎。

(一)选题策划精准化:锚定国家战略,构建选题体系

选题策划是学术期刊引领研究方向的“指挥棒”。学术期刊需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框架,构建“总主题—分领域—细问题”的选题体系,确保选题与国家战略需求同频共振。第一,总主题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核心,需紧扣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义,聚焦理论内涵、实践路径、世界意义三大维度。第二,分领域需覆盖“五大特征”与“九个本质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九个本质要求可以概括为领导力量、社会制度、“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五大建设、对外交往、文明形态,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期探索和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党的现代化理论系统集成的重大创新,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为分领域选题提供了具体方向。学术期刊可根据自身定位选择重点领域推出专题,同时注重结合地方实践,策划机制创新、基层经验等选题。第三,细问题以“小切口”回应“大主题”,需避免空泛,应聚焦具体实践中的难点、痛点。

(二)栏目设置创新化:突破学科壁垒,打造栏目矩阵

栏目是学术期刊的窗口,其设置需从学科逻辑转向问题逻辑,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问题构建“主题式+案例式+对话式”栏目矩阵。其一,主题式栏目集中攻关重大理论问题,需围绕特定理论问题连续多期刊发系列论文,形成研究合力。其二,案例式栏目呈现理论指导实践的全过程,需选取地方典型实践,通过案例描述、经验总结、理论提炼的结构,实现实践对理论的反哺逻辑。其三,对话式栏目促进理论、政策、实践的三方协同,需搭建学

者、政策制定者、实践工作者的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成果向政策转化。

（三）传播方式融合化：构建立体矩阵，提升传播效能

面对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变革，学术期刊需打破纸质出版为主的传统模式，构建传统平台、新媒体矩阵、国际传播相结合的立体传播体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破圈传播。一方面，以内容轻量化适配新媒体平台的阅读习惯。学术期刊需将长文内容进行二次加工，转化为核心观点、关键数据、案例图解、短视频等轻量化形式。例如，微信公众号推送论文摘要、金句提炼、思维导图，满足碎片化阅读需求；抖音、快手制作“3 分钟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系列短视频，用动画、数据图表解读理论要点；小红书发布“学术科普”笔记，结合生活场景阐释理论价值。此外，学术期刊需借助大数据技术分析用户画像，实现分众推送。另一方面，讲好“中国故事”，提升理论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需通过合作出版、国际会议、外文译介等方式，向世界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例如，与国际知名期刊联合推出“中国式现代化”专题，邀请中外学者共同撰写；主办或参与“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海外汉学家、发展中国家学者参与；将优秀论文翻译成英文进行推广。此外，需要树立国际视野、加强对外交流，这既是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应有之义，也是服务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紧迫任务。要加强学术交流合作，有效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的独特作用，为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刘曙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5-17.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2-07-28(1).
[4]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N].人民日报，2021-05-11(1).
[5]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9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陈明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与政治之维[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3(1)：48-57.
[10]魏建，王玲强.主题宣传与学术期刊影响力提升——来自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的经验证据[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1)：176-188.
[11]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2]唐红丽，常嫦.第八届国家治理高峰论坛年会暨人民论坛创刊 30 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EB/OL].（2022-12-04）[2025-12-18].https://www.cssn.cn/skgz/202212/t20221204_5568418.shtml.

（责任编辑　陈晓姿）

Generation Logic, Value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Chines-style Modernization Following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QI Mingming QI Ruqiang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a crucial featur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at follows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draws its wisdom from Marxism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CPC's century-long endeavors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pursuit of dreams in modern times, and takes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in their modernization endeavors by the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today as a historical reference.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a path that wins popular support, which can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advanc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better meet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It is also a path showcasing China's image, helping refute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demonstrate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major country in the new era and provide a new paradigm for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uphold the correct leadership of the CPC, 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national defense capabilities for safeguarding peace, and coordinate efforts to address the principal domestic contradictions and actively guide global governance, so as to provide a more lasting guarantee for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Building 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that Consolidates the Foundation and Forges the Soul: Value, Connotation, and Pathways

SUN Jianhua HE Shuohan
(*School of Marxism,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 China*)

Abstract: The "Outline of Plan for Building China into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2024 - 2035)" places "building 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that consolidates the foundation and forges the soul" at the top of the eight systems for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highlighting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value dimension, building this system is not only a practical requirement for addressing risks and challenges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and building China into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but also an inherent demand for fostering a new generation capable of shoulder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connotation dimension, its core essence consists in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and "forging the soul",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diversity" and "unity", and the interconnected cycle of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From the pathway dimension, constructing this system requires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 and adhering to a systematic approach, enhancing the team build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integrating various resources to break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limitations, and leveraging the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innovate educational methods. The above three dimensions are mutually supportive and organically unified, aiming to continuously open up new horizon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cultivate more talents who follow the Party's guidance and are capable of undertaking the mission of realiz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building China into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Key words: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and forge the soul; new generation

Value, Dilemmas and Countermeasuresfor Philosophy Education in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at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Levels

LI Jun ZHENG Xiaorui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t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levels is the key to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Philosophy education, as the cornerstone of Marxist theory education, has irreplaceable value in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worldview and cultivating rational thinking, which is of vital importance in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t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levels. Currently, philosophy education involved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t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levels faces several challenges such as the lack of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educational goals at different stages, the implicit absence of the corresponding content in prim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the insufficient teacher collaboration across different stages, and the utilitarian-oriented evaluation mechanism.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t is necessary to uphold a systematic perspective, construct a spiral ascending content system from intuitive enlightenment to rational self-awareness, explore some practical teaching models lik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examples", "alignment of guidance and enlightenment", and "mutual growth through critical thinking", cultivate a highly philosophically-literate teaching team with "internal cultivation and external connection", and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rigorous integrated evaluation mechanism as well.

Key words: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t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levels; philosophy education; value; dilemmas; countermeasures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andImprovement Pathways of AcademicJournal Brand Communication Power in the Pan-Terminal Era

YANG Yajie
(*Journal Center,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Pan terminal, academic journals are experiencing a systematic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paradigm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mechanism, and brand communication power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indicator for measuring its academic influence and social value.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this study builds a basic theoretical model for brand communication power through a bottom-up approach with multiple data sources and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academic journal brand communication through Delphi method and 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opic selection and plann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journals, event operation and media convergence constitute the cor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brand communication power of academic journals, which exert their influences on the brand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through content leadership, resource integration, ecosystem construction, and channel collabora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brand communication power of academic journals, it is essential to take academic quality as the key to consolidating the brand foundation, adopt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to shape a distinctive brand identity, focus on featured columns, achieve content innovation via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integrate multi-platform resources to build an all-media communication matrix and a user ecosystem model, and promote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carry out joint planning events, thus achieving cross-border resource cooperation and growth in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academic journals; brand communication power; evaluation system; media convergence